

炎黄春秋

■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

■ 首例村民罢免村官的故事

■ 胡耀邦鼓起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 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

■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第4期
2003年

目 录

特 稿

- 1 民主法制是中国的必然取向
——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杜润生

- 2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关 山

春 秋 笔

- 8 首例村民罢免村官的故事……李昌平 赵 岩

- 13 “北大荒”开垦史……丁履枢

沉 思 录

- 17 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章世鸿

- 24 读《新华日报的回忆》……向继东

亲 历 记

- 26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王金锐

- 33 抢救纳西族文化遗产东巴经书的遭遇……木丽春

人 物 志

- 38 陈独秀最后的生活和政见……丁 弘

- 40 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黎 白

- 43 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傅国涌

- 48 母亲冯慧德的政治生涯……

……齐翔延 齐翔安 齐小慧 齐小鲁 齐翔英

往 事 录

- 56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刘 良

- 59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孕育一代英豪……冷玉健

- 63 我收藏的早期团刊……杨 浪

攀 友 情

- 66 怀念学术界诤友郑惠……陈铁健

古 今 谈

- 68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吴明明

- 71 德治法治古今谈……官伟勋

飞 来 鸿

- 76 过洋年，洋过年……李 岚

文 荟 园

- 77 桃花潭畔寻汪伦……程竞明

编 读 窗

- 78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肖又新

文 配 画

- 80 常态与变态

——精神现象拾零之一……陈四益文 丁 聪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铨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郝爱存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 事 单 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网上书店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80元

民主法制是中国的必然取向

——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 杜润生

—

三个月以前，党的十六大，全面布置了新世纪前期的发展目标和各项具体任务，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可使我国经济更加繁荣，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进步，社会更加和谐，并进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十六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可圈可点的一件大事。过去20年中，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对经济改革缺乏群众性民主监督，从而引起寻租腐败屡禁不止和两极分化开始萌发。这种趋势，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一个时期从南到北都在呼唤政治改革，确立民主法制秩序。民主法制是国家发展的必然取向，应当顺势推进。逆潮流而动，是没有出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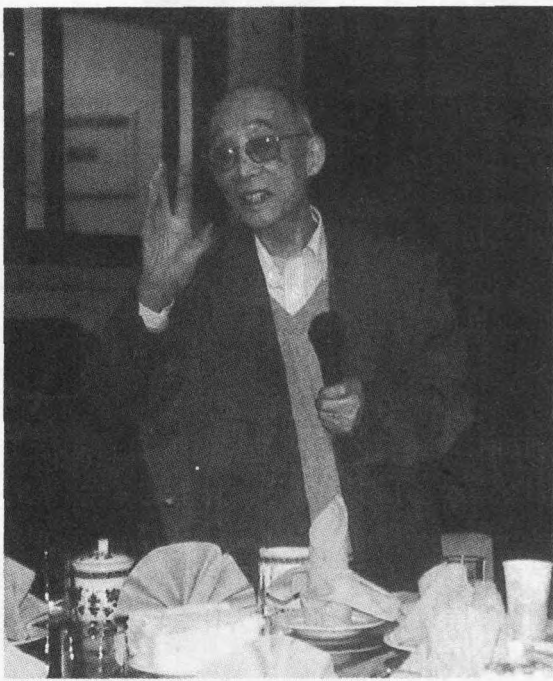
二

《炎黄春秋》近两期先后刊出李锐同志关于政治改革向中央的建议书和钟沛璋同

志《以俄为师得失探讨》，两篇文章都对以党治国制度进行了评论，并就执政党如何改善执政方式提出一些建议。这显示了《炎黄春秋》与时俱进品格，值得称赞。

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项政治保障条件，党和政府既要领导群众，又要接受群众监督，《炎黄春秋》作为媒体是做出贡献的。它介绍一些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及其事迹，把一些被歪曲报道的重大事件，还原它们本来历史面目，并辨明是非正误，通过以史为鉴，体现了监督功效。这正是《炎黄春秋》的宗旨所在。

刊物是文化产品，表现为一篇篇文章。不同于一般刊物，《炎黄春秋》主要是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并团聚了一批掌握史料的撰稿人。二者都是一种稀缺资源，值得格外珍



杜润生在联谊会上

贵。

《炎黄春秋》肩负上述历史使命，社领导要不断改进编审工作，每期要安排一、两篇贴近国家发展形势，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有分量的文章。还必须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独立自主，多谋善断，收集信息，拓宽稿源，为刊物办得更好打下基础。

本人作为刊物顾问之一，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深表歉意。谨祝《炎黄春秋》越办越好。

袁庚谈

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

● 关 山

袁庚,原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深圳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电视连续剧《激情年代》主角欧阳鹏的原形,改革开放中敢闯敢冒的风云人物。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到蛇口视察,对袁庚的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近期,笔者多次拜访袁庚,就中国的改革走向问题向他请教。86岁的袁老头头脑清醒,谈锋甚健,不时有独特深刻的见解。现将蛇口工业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有关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关:我印象中,人们对你在蛇口搞的政治体制改革争议很大,你当初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搞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和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现代化。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特区的实践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目前,随着加入WTO,随着开发西部成为国策,特区在经济上已经享受不到多少优惠政策了,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关键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特区应该为全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示范。特区要大胆地学习国外政治文明,在民主和法治上大胆探索,为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和支持。

胡耀邦说:搞民主选举好!很好!

关:你主政蛇口14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哪些重大举措?

袁:谈不上重大举措,只是进行了些探索,主要有三项:一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二是实行新闻监督,用舆论监督蛇口任何一级干部,制约权力,反腐倡廉。三是创造一个民主的氛围,一种让人说话作事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

关:当时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干?你是怎样想的?上面支持吗?

袁:比如民主选举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经过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意,也得到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蛇口工业区视察。在汇报工作时,我对耀邦同志说: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不是的。他背后恨我当面也会点头微笑,因为是我决定他们的命运。反过来我不怕他,他动不了我半根毫毛,撤不了我的职。我只怕我的顶头上司国家交通部,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官不怕民民怕官,人身依附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习俗。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最为重要。我们这里想搞个改革试点,蛇口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

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

胡耀邦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

1983年4月,我们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我们还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

关:在选举中是否有人落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袁:第一次民选的结果与组织部门的预选人名单基本一致;在第二届管委会民选中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有3人落选;我虽然得票名列榜首,但仍有93人未投我的票,占22.3%。绝大多数群众是支持民主选举的,但也有人因失去职务牢骚满腹。有一位高级干部带话给我: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我的考虑是蛇口在中国只是九牛一毛的小小区,人口不过几万,试验失败也无伤大雅。

关:有一种说法,中国有2亿文盲,广大人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淡薄,直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低,这确是事实。投票人也许讲不出什么是民主,但谁好谁坏,谁能办事,谁能代表他的利益,谁不代表他的利益,他心里是清楚的。比如选村长,平时大家都熟悉,朝见面晚见面,谁行谁不行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这并不需太高文化水平,这点判断力老百姓还是有的。解放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比现在高吧!但共产党就在延安实行民主选举,识字的就写选票,不识字的就投豆子代替选票,效果非常之好。现在都21世纪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比以前高得多,60年前能办得到的事情

现在还办不到吗?我们国家已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都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民主的大潮流。按这一思路搞下去,乡长、县长、甚至市长迟早会让选民直选产生。

民主就是要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

关:你刚才说的“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是什么意思?

袁:就是让人说话,让人敢说真话、说心里话,言论自由。在蛇口,我绝不允许以言治罪,只要不是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一律不许有任何打击报复、穿小鞋。如果说要发表一点政治上的见解,经常都战战兢兢的话,那么很难设想会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关:能不能具体谈谈?

袁:你听说过1988年的“蛇口风波”吗?

关:听说过。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团委还组织了讨论。好像是几个国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到蛇口去演讲,与蛇口青年发生了争论,焦点就是怀着赚钱的目的去深圳找工作对不对?特区欢不欢迎淘金者的问题。



胡耀邦在袁庚陪同下视察蛇口

袁：事情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青年人不同意那几个权威的说教。这是正常的。但权威们却给有关部门写了材料，整份材料充斥着陷人以罪的文风。我知道后明确表态：一、要切实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绝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论治罪的事情。对那些被追问姓名并上了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二、权威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应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没想到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不但国内的《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等报刊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和转载文章，几年之后，有人说，这是八九风波的前奏。

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资”

关：你对新闻监督的作用怎么看？

袁：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以，我在蛇口放开了舆论，实行新闻自由，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由报社自己决定。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关：《蛇口通讯》有否登批评你的文章？

袁：登啦。从第2期开始就登了好几篇指名道姓批评我的文章，开始时他们很慎重，登前三次送给我审批，我三次明确表态照发，并写了“以后不要送审”的批示。1985年2月28日刊登在《蛇口通讯》第2期的批评我的文章《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



邓小平听取袁庚汇报（1984年1月）

奖”。由一个企业办的小报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关：批评得对不对？你心里感觉怎样？

袁：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

关：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舆论监督？

袁：老实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对低级别官员的监督。相比之下，对有权者的监督，对高级别官员的监督，显得相当欠缺。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许多腐败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再到最近韩国金大中总统三个儿子贪污受贿案件，莫不如此。反观我们中国，有哪几个大案要案是率先由传媒曝光而查处的？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坏人有许多空子可钻，逍遥法外，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

关：但传媒是党的喉舌，要唱响主旋律，能允许唱反调？

袁：党报、党刊、电台、广播是党的喉舌，应当与党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传媒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满意的,党一定满意;人民不满意的,党一定不满意。一张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应当是秉笔直书的,一个为人民服务正直无私的党应当是无所畏惧的。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说得好:“革命政党最怕的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过去蒋介石 800 万军队都打不垮我们,难道现在还怕别人骂几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关:在西方,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如何保证媒体不滥用这种新闻监督权?

袁:靠法律、法治。新闻法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法律。据我所知,早在 20 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迟迟出不了台。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意性,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和法治

关:刚才你谈到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我想请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袁:我认为政治文明有两个基本点:民主和法治。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法治就是专制,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邪路。

关:目前中国的政治文明面对的严重问题是腐败问题,这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哪里?

袁: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旦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又缺少民主和监督,或迟或早都会走向腐败,把它的人民引向苦难的深渊。

关:为什么?

袁: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人性之使然。毛主席曾写过一首词《读史》,开头就是“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也就是说人是从猿演变过来的,自然遗传有兽性,都有求生存、求

发展的本能,因而都有自私贪婪的“恶性”。毛主席接着写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为了生存,人类往往是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应该记忆犹新。你看,人连杀人都敢,腐败就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人类也是不断进步的,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人在社会的文明教化下,受到社会的监督,受到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舆论的约束,人“恶”的本性受到制约,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能“随心所欲”了。如果不受任何的监督和约束,人的“恶性”就必然会显露、发展,人就必然会胡作非为,肆无忌惮。领导干部也是人,也存在着自私贪婪、好逸恶劳等人性的弱点,如果缺乏监督,人的恶性就会抬头、膨胀,就会利用权力搞腐败,就像抽鸦片烟一样,越抽越上瘾。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远的如刘青山、张子善,近的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等等,莫不如此。基度山伯爵报复仇人的方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

关:改革开放涌现了不少风云人物,如大邱庄的禹作敏、长江动力集团的于志安,他们都烂掉了。你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为什么你不烂掉?

袁:我之所以没烂掉,关键是我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危害性,常常警醒自己不要为所欲为。同时找到了约束自己权力的有效途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为了避免腐败、为了制约权力,舆论监督是一剂苦口良药。我认为在目前我国法制仍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这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使是封建社会,这也是避免腐败的有效途径,盛唐之世与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不无关系。事实证明,我主政蛇口 14 年,整个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携款私逃、贪污受贿等案件。因为政治生态环境使然。

民主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

关:你说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但不少人都担心“一民主,中国就会乱”,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民主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不断的完善和长期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个

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建设。社会稳定的前提就是要法治,做到宪法至上,维护法律尊严,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动,保护公民的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治下搞民主是不会乱的,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前总统克林顿,闹了那么大的丑闻,他的对立面共和党对他攻击得那么厉害,美国的社会乱了吗?美国在这样众说纷纷的情况下,政局始终保证稳定。民主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早在1945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国家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是真知灼见。

只有民主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关:纵观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取得成功,但在世纪末却蒙受重大挫折,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国家丢掉了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有人说,这是民主的结果。反思历史,你有什么看法?

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是沉重的,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复深入地思考。我认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原因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缺乏民主的结果。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民主的国家机制。政治上缺乏民主,垄断了权力,导致了专制主义,讲人治不讲法治,丢失了民心;经济上缺乏民主,垄断经济,讲计划不讲市场,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缺乏民主,垄断了舆论,文化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样,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垮台是迟早的事情。小平同志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当

然,民主急不得,行动要稳妥,苏联解体与民主化的急躁冒进有很大的关系。民主进程要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这是长期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方向要坚定,持之以恒,更不应无所作为,坐失良机。

“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

关:开放改革,我们非常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如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袁: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不要把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当作中国特色来固守。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提醒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不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加入WTO,不但经济,就是政治、文化都应主动与国际接轨,与世界融合,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甩出全球竞争圈。因此,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高度,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中国特色应该是保持先进的东西。要扬弃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与人类文明潮流相违背的东西,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取长补短、兼容发展

关: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袁:一个是“左”的习惯势力;一个是僵化的思想观念,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小平同志曾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左”,他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

‘左’。”“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僵化的思想观念、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危害也极大。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关: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反“左”已经十年了,现在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防止右了。

袁:这正是“左”的表现。中国“左”的思想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几十年了,可以说已经“溶化在血液中”,变成了我们政治的遗传因子。现在有些人“左”了还不知道自己“左”,这是最危险的。我曾对一些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好好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就有人说我“右”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多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理论、概念。西方的政治经过几百年的进化发展,有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都成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这些具有“左”倾顽症的人还把它们当成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视之为洪水猛兽。

关:为什么“左”的东西如此根深蒂固?

袁:这可能是受以往斗争哲学的思维与观念的影响。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思维和观念对于当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极化的现实世界而言,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它互补、兼容的一面。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段话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突破凡“资”必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确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可以和谐共存、兼容发展

的新理念。

关: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章,是中国一个访问学者写的,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习了不少好的东西,如福利政策,消除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宏观调控的国家干预等等,说美国正溜向“社会主义”。

袁: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有用的就是真理”。虽然它口里说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但实质上只要它认为你的制度有合理的,它就照学照搬不误,不像我们“文革”时期提出的那样:“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只会问姓“社”姓“资”,只会贴标签,而不好好去研究其本质。现在不仅美国,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芬兰、法国、英国等国家左派政党(如法国的社会党,英国的工党等)长期执政,吸取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贫富悬殊、三大差别正在缩小,社会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很有点像社会主义的样子,值得研究。

“与时俱进”的意义

关:最近两年,“与时俱进”这个词在中国家喻户晓,您怎样理解这句话?

袁:我认为,与时俱进的“时”,主要不是说中国过去的辉煌,而是现在世界的文明潮流。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次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强调要“与时俱进”,并把能否做到这一点,提高到“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我相信,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我相信,中国汇入世界文明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责任编辑 致 中)

首例村民罢免村官的故事

● 李昌平 赵 岩

集乐村特殊的记忆

上世纪40年代,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荒滩上来了两拨移民。一拨来自河北,另一拨来自山东,他们发展成了现在的集乐村。即使在“文革”时期,大队干部的配备也要照顾河北帮、山东帮这一基本村情,改革开放后更是如此。由于干部有代表性,也受到监督和约束,几十年间,集乐村虽不富裕,但村民算得是和睦相处,太平无事。

可是进入90年代后,群众负担成倍增加,同时村里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值钱。当干部权力大了,油水足了,村里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河北帮与山东帮之间的矛盾让位于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干部的腐败和对民意的漠视,导致集乐村在短短5年间连续两届村主要领导竟然死于村民的乱刀之下,为此,两位村民被判死刑。

回顾那短暂的5年,70多岁的王老汉连连摇头说:就像鬼使神差,那几年,村干部的私心重得不可思议,村民的火气旺得不可思议。

90年代上半期,留给集乐村人的是永久的伤痕和刻骨铭心的教训。

洪水考验中成长起来的村官却成了贪官

转眼到了1998年,这是集乐村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哈尔滨发生历史上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淹了集乐村,时任村长的董寿永舍小家顾大家,连续40多天过家门而不入,带领村民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把洪水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方圆几十里地的老百姓都羡慕集乐

村出了个好村长。董寿永火线入党,并出任党支部书记。

洪水过后,松花江流域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1998年10月,朱镕基总理视察哈市时指示:灾后的农村建设要逐步走向规范化。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决策者们据此决定:将松花江边的前汲家村移至相对安全的集乐村北部,创建“龙江第一村”。集乐村被征去土地560亩,获征地补偿费1500万元。可是,时任村主任、书记的董寿永却没有向村民公开征地合同,和镇上、区上、市里也是一本糊涂账。仅全国政协向“龙江第一村”捐赠救灾款就有1000多万元,村上到底接了多少钱,村民该得多少钱,大家完全不知情。1998年10月末,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有关方面公开了部分征地补偿款,董寿永家4亩地得款25.17万元,而普通村民连他的零头都得不到,谁都知道征地费应按面积发放,村委会和董寿永却拿出早已作废的文件按地上附着物作价。此外,董家每平方米土地种丁香树2.5墩,董寿永却按7墩收留征地费。

村民们愤怒地说:“他哪还像个共产党员,他贪的都是我们子子孙孙的活命钱。”要求董寿永下台的呼声高了起来,上访此起彼伏。可镇上的领导却认为集乐村没有比董寿永更合适的人,对村民的上访采取了强硬的压制。

不能让悲剧重演

面对日益紧张的干群关系,村里一些比较温和的老人却在想让董寿永和平交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村民杀干部的悲剧一定不能重演!

1998年11月4日晚,村民郝鹤春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村委会组织法》正式实施的新

闻,眼前一亮:揪心的事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那一宿老郝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一想到国家领导人的话:“一定要把权力还给农民”,身上就全是劲儿。

第二天一早,郝鹤春就把自己依法罢免董寿永的想法告诉了青年农民徐国君和魏志龙。

徐、魏二人曾为村主任选举一事吃过亏:

1996年集乐村村委会主任和村妇联主任被村民乱刀扎死后,村上一时没了领头人,镇上于书记指定村民董寿永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此举引起不少村民的不满。

徐国君买到一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后,发现镇里的于书记指定候选人的做法不符合试行法的要求。按照规定,村上至少要推出两名以上候选人来竞选村主任。徐国君和魏志龙便去找于书记说理,谁知于书记劈头一句:“我当官我说了算,老实种你们的地吧……”

就这样,董寿永在于书记操作下当选了。徐、魏不服,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对那次选举提出五条意见,比如唯一候选人就等于任命,不公开唱票就有欺民之嫌等。两人与村民郝良德倡议大家学习试行草案,希望村民“知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对本次镇党委于书记违反程序选举的村主任董寿永不予承认,并重选村主任。徐国君、魏志龙把自己的想法书写成告示,连同相关的法律一起贴在村头的告示板上。这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起极大反响,几百名村民认为于书记强奸法律和民意,准备向区、市讨个说法。

于书记也不敢怠慢,赶忙向区、市作了汇报,说村民故意扰乱社会秩序。

于书记汇报当夜,哈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出动数百警察包围了集乐村。在于书记指挥下砸开了徐国君家门,将睡梦中的徐国君从床上捆起,魏志龙也被抓走。被狗叫声惊醒的郝良德从自家后窗跳出逃出了村子。徐、魏两人被拘押24天后,在无任何手续、任何解释的状况下被放出了看守所。郝良德跑到省外亲属家躲了近半年才回村。

直到今天,徐国君对96年被公安局非法拘押的事还耿耿于怀:“中央政府号召百姓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地方一些官员却对百姓知法用法怕得要死,甚至动用了专政工具,我看普法对

象首先应当是他们。”

虽然曾经吃了苦头,但几个人想到村上两起村民杀村官的惨案,觉得只要避免悲剧发生,即使再拘押24天也认了。于是商量决定,由徐国君、魏志龙两人去市里买《村委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书籍,组织村民学法后再启动罢免程序。几本法律书从此在村民中传来传去。很多人不识字,徐国君等人就读给大家听,听不明白的,徐国君就把大家聚到村委会,由村上学问最多的周学智讲解。村民们自发地组织了近十次的学习班,每次屋里都挤满了男女老少。周学智说:“改革开放以来,村民们如此热情自觉地学习法律还真是头一次。”

村民对几十条法律最感兴趣的是“村务公开”和十六条关于“罢免”的条款。徐国君、周学智就给村民们重点讲解什么是村务公开,什么是依法罢免,罢免的条件及罢免的程序。为慎重起见,徐国君又去黑龙江省民政厅要了一本1998年11月8日颁发的《黑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释义》。

罢免村官第一案

《村委会组织法》第16条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

按法律规定,村民们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认为,董寿永当选是违法当选。而且当选以后村务、财务不公开,本次市里给的征地费被区里、镇里扣下几百万元,他不积极主动去要,还自己私吞所剩不多的钱,上任后大吃大喝,也不搞村政建设,这些理由已足以罢免他村委会主任一职了。几十位在村里有威望的人一商量,干脆罢了他。

一位村民代表说:“这次会不会像上次一样,还没等怎么着就给抓起来?”

郝鹤春说:“不会了,中央态度很坚决,再说上次法律还在试行期间,这次都生效了,哪有把法律定出来当摆设的?”

一连三天,十几个人走了176户,都在罢免书上签了名,摁了红手印,并一再被叮嘱:非常时期,对董家的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郝鹤春说:“我们十几个人天天动脑筋,依法规范行为。”

罢免书交与党支部书记司立冬,司立冬惊呆了,他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十几遍以后说:“这些人的签名都是实签的吗?”

徐国君说:“个个都是实签,你也可以用党支部的名义核实监督嘛。”

司立冬向徐国君借《村委会组织法》研究了一天告诉大家:《村委会组织法》上规定,党支部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法律没有授权给支部可以召开村民大会罢免村长。

司立冬的选择是正确的。

徐国君说:“咱们还是按程序走,镇里新换了个张伟明书记,看一看他啥态度,实在不行再去区里和市里。”

张伟明1998年11月刚从道外区调到松北镇,接到集乐村民的罢免书,他十分意外,董寿永火线入党才几个月,老百姓怎么就反对他?可面对176名百姓的签名,新书记也不敢怠慢,他主动找董寿永谈话,在核实了董寿永确存在罢免书上反映的问题时,张书记希望他主动辞职。可董寿永认为征地费不到位,原镇领导也有责任。因为区里扣了那么多,镇上又截留了70万。“现在因为自己多占点钱,就逼我辞职,我想不通。”

张伟明一时没了办法,只好吩咐镇里的工作人员再核实签名真伪。

1999年1月23日,几名村民去市里购物,回来时见哈市市人大的会场门口,有一群南岗区王岗镇兴隆村的村民手举条幅,坚决要求市人大依法罢免兴隆村村主任梁振志的人大代表资格及村主任职务。兴隆村可是市里的亿元村,梁振志可是全市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啊!这给了集乐村人很大的鼓舞。村民开始不断向区里、市里、省里上访,希望上级领导对村民的民主要求给予重视。

道外区民政局告诉村民,集乐村有选举权的村民1622人,176人的签名不够法定的选民五分之一以上。

既然人数还差,那就补,徐国君等人顶着零下20多度严寒再忙了3天,又有300户500多人签了名,郝鹤春已累得起不来炕了。这两次签名合计已达746人,远远超出了法定人数。

与此同时,张伟明选派的镇党委副书记张岱华调查小组也做了民意调查,小组成员走访了200多户,其中120户坚决要求罢免董寿永,70-80户暂不表态,20户表示不同意罢免。

1999年3月6日,集乐村村民在镇和区领导的支持下召开了村民大会,会场设在离村一里多地的小学操场上。当天,村民用手中的20多台农用柴油车免费拉大家到会场,个体钢窗厂、塑窗厂全部停工,很多进城打工的村民宁可晚走也要去投票。省电视台《今日话题》派出记者现场采访。

主持大会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张岱华,他首先宣读746人联名《强烈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董寿永》的动议书,接着董寿永到前台申辩,随后开始投票,选民拿选民证换选票,继而秘密划票、投票,村民虽然激奋,但秩序井然。

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村民也不回家吃饭,扶老携幼站在零下十几度的操场上等唱票结果。唱票很关键,唱票人身后有两名村民代表监督,监票人身后还有“敌对”双方自愿监票。大家把教室的走廊和窗外挤得水泄不通。当罢免票达到700张,快超过投票数一半时,董寿永的亲属们不再监票了,转身而去。

下午3时唱票结束——同意罢免741票,不同意的400多票。而同意罢免须达到812票时,法律才能认可罢免成功。村民与参加大会的镇、区领导研究决定:封存罢免票,启动流动票箱,让来不了的村民投票。

村民们分成两路,一部分人回家垫口饭又赶到村委会,防止有人做手脚;另一部分跟随流动票箱全程监督。

徐国君和董寿永的儿子等十几人跟着一个票箱,双方一路不说话,每到一户,就都守在村民屋外,透过窗户死死盯住工作人员进屋教村民填选票。

三个流动票箱又收了200多张选票。晚10点半,两路人马返回小学校会场开始唱票。11点,张岱华副书记郑重宣布:同意罢免897票,不

同意罢免 471 票, 13 票弃权, 85 票废票, 罢免法律条件已构成, 罢免成功!

罢免只是一小步

罢免董寿永后, 镇上又指定原副主任童身忠为村长, 村民们认为, 村民自治就是要与过去一切由政府党委说了算有所不同, 否则中央颁布法律干啥。代表门仍然一拨接着一拨的上访。在《南方周末》等媒体的配合下, 全国人大主要领导批示: 中纪委派出专案组调查“龙江第一村”和集乐村征地费使用情况。郝鹤春被接见后不久, 区里占用村上的几百万元被全部返还到村上。

2000 年 3 月 15 日, 在中央高层领导和黑龙江省委的关注下, 集乐村村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选举村长。代理村主任童身忠等 28 名村民竞选村主任, 董寿永也没有放弃权利, 自己报名准备重新竞选村主任。

选举在极其严格的程序下进行, 历时近一个月。三轮投票过后, 童身忠以 960 票当选村长, 徐国君以 868 票当选副主任, 郝良德当选村治保主任, 董寿永落选。村民们拿到应分的钱, 村里又多了 20 几家塑钢窗小厂。

民主的力量是巨大的

集乐村三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

村里不仅建设了农民俱乐部, 还修了公园、老年人健身场, 仅公用厕所就多了十几座, 硬化路也修了好几条。村上建成了漂亮的第一工业园区, 第二工业园区也已规划完毕。村里有了公共汽车, 有了储蓄所, 家家户户盖了新房, 私家小轿车就有 20 多辆。村里再没有刑事案件了, 老百姓再没有上访的了……

现如今, 集乐村人均年收入已达 4500 元, 人均住房面积 44 平方米, 人均厂房面积 5.2 平方米, 年上缴国家税收 400 多万元。村集体由负债转变成有 1000 多万元存款。全村已有 72 家塑钢加工企业, 从业人员 2000 多人, 仅外来打工人员就有 800 多人。产值超 500 万元大户有 4—5 家, 过百万有 20 家, 几十万就更多了。在塑钢加工产

业的带动下, 运输业、型材生产厂、配件生产厂、玻璃加工厂、安装专业队、专业经纪人队伍应运而生。从事第三产业的服务网点已发展到 35 个,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户 384 户。

笔者见到了童身忠、徐国君, 不由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村官, 猜想着他们是怎么合作的呢?

童村长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 主动介绍说: “由镇上指定那一年, 我还不大习惯民主, 觉得自己没私心, 干就行了。后来国君、良德他们一上来, 事事都较真儿, 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村主任用的车卖了, 钱用于给百姓干实事。想一想也对, 外面借着债呢, 摆啥子谱。百姓们为此都竖大拇指。村里每件事大家都得辩出个理来, 就是村官意见一致了, 如果村民们不同意, 咱也不能强行干。就拿办第一工业园区来说吧, 我们几个年轻人都同意干, 可是村民议事大会没通过。钱是全体村民的血汗钱, 所以即便我们是正确的, 也得让大家有个思考的过程。2001 年夏天《新晚报》连续报道集乐村制钢窗技术质量问题多, 记者分析问题出在小作坊、小业主、无远见、图短利等等因素上, 开始我们还有替村民打抱不平的想法, 可是又一想应当抓住这次机遇进行引导教育。于是村上请技术专家和部门领导来给大家讲课, 大家热情高涨, 还主动提出要在村上设质检站, 我和国君等人觉得时候到了, 于是召开村民大会, 再次讨论工业园区的问题。

建工业园区的目标就是使小作坊改成家庭联产——股份制公司。统一技术、质量标准, 条件成熟还要统一标识。村民们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好处, 第一工业园区建成后, 28 个档位被一抢而空, 大家还主动申请创办第二工业园区。

几年前领头上访的徐国君对记者说: “我们虽然原来不是一个体系, 但这正好有利于互相监督。无论是谁当了村官, 都不能只想自家的私事, 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创政绩之上, 才能顺民心、出政绩。这不, 元旦过后我们又同村民们商量, 挣钱了, 还要重建居住区、商服区和休闲区等等。守着松花江这风水宝地, 百姓要是不富, 就是咱村官没能力。今年咱还要招商引资, 联合办企业。城里已有几大集团找过我们, 但能不能合资咱还得同村民商量着来。”

笔者插了一句：“你们的规划和想法都挺正确，当初要是不同村民商量不是干得更快吗？”

徐国君回答：“也许是这样，但那是愉快的，即便大家能够受益。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使最广大的村民共同愉快地富裕起来。”

童身忠补充道：“家长制的管理办法可能眼前解决问题比较快，但将来可能有负效果。民主决策的过程可能慢一点，但群众的思想统一了，决策执行的就会更快，目标也就能比较好地实现。决策不可能没有失误，但村民集体决策就能减少失误。干群团结起来也能克服和弥补决策失误的损失。民主决策的过程是村民互相做思想工作，共同提高的过程。是先进的文化取代落后的文化、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

“民主能产生持久的生产力。因为民主能凝聚全体村民的力量和智慧，少走弯路，及时纠正错误。民主能让百姓都把村里的事当自己的事，事情就更好办，也办得更好。”

“民主还能产生先进的生产力。民主能保证全体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符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很多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实现村民民主政治，被大资本分吃了。而我们村只会越来越壮大，因为民主强化了村民们土地公有的意识，强化了土地权集体垄断经营的意识。用不了几年，我村的集体积累将超过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任何大资本都不会吃掉我们。过去没有民主，村里的土地一块块被人割走，而现在，我们就能靠土地建设工业园，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

“这是谁教给你们的高招。”

“这不是什么人教的，是村民站在村本位立场上议出来的，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

不敢相信坐在我们面前论民主的是农民，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只有当学生的份儿。

民主就能生长政治文明

陪同我们采访的还有新任的刘镇长。我们想知道村长和镇长是如何处理关系的。

童身忠说，“原来村长是镇上任命的，和镇

长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现在村长是村民选举出来的，和镇长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是兄弟关系。过去镇长说要多少地、给什么价，就是指示、就得落实；现在要征用土地，领导只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即使领导还是像过去一样下命令，我们也要看大多数村民是什么意见再说。过去村里的事可以不透明，现在必须透明；过去不让村民参与村里的事，现在不行了。我在被选上村长的第二天，就带领村民代表到区政府要被扣的土地补偿款，要是上级任命的我一定不敢。”

问刘镇长怎么理解童村长的“无情无义”，他的回答挺让我们意外：

“村民自治改变了乡镇政治的生态，推动着镇政府转变职能和作风。乡镇党政工作方式、方法都必须改进，才能适应政治文明的要求。我们过去动不动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做了不少错事。如果我们讲政治文明，集乐村前两任领导就不会死，集乐村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坐牢了。他们的实践证明，只有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生长出政治文明。”

“村民自治约束了镇上很多权力，影不影响镇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发挥呢？”

“三年来，集乐村没有一起刑事犯罪案件和村民上访事件，经济发展也一年一个新台阶，这种效果是我们过去对村里的工作包办代替所无法达到的。我们找到了科学管理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政治制度。镇政府在村里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例如要提高村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村里提供发展战略等。对集乐村，我们下一步将请专家帮助制定发展战略，同时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1000万现金和几千万现存资产，我们建议村里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村民可以用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取得贷款，这样既支持产业升级，集体每年又可增加利息收入100多万元。个体经济升级后，集体的几千万资产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集体经济会更加厚实。”

我们离开集乐村时，村里又充满了换届选举前的紧张选战气氛，我们问村民神圣的一票会投给谁，大多数人这样回答：先听他们演讲再说。我们为集乐村人骄傲。（责任编辑 吴 思）

“北大荒”开垦史

● 丁履枢

我作为农垦一兵,有幸参加了“北大荒”早期开发建设,并在这片土地上连续工作了30年,在耄耋之年,愿将“北大荒”巨变中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搜集的有关资料,加以归纳整理,以飨读者。

一、昔日“北大荒”

祖国东北边疆,黑龙江省有无边无际人迹罕见的大片荒原,自古以来人们称为“北大荒”。人们泛指的“北大荒”范围很大。本文所指“北大荒”,是在黑龙江省兴办国有农场,发展农垦事业所开发的区域,因而又称“黑龙江垦区”。这个区域经有关部门划定,横跨11个经度;纵贯7个纬度,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完达山两麓和小兴安岭南北的大片荒原。

“北大荒”自然环境的突出特点是被称为“寒冷的世界”,“北大荒”是寒冷、荒蛮的代名词。有人对“北大荒”的寒冷如此形容:“呼气为霜,滴水成冰,赤手则指僵,裸头则耳断”。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南部地区仅2.6℃,而北部地区为-3.5℃。冬季最低气温平均-30℃上下,极端最低气温

-46.5℃;全年平均无霜期只有100-130天。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诗人聂绀弩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冬天,他在虎林县一所日本人扔弃的破房子里,目睹“北大荒”景况,饮酒放歌,写下了《北大荒歌》:“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荒草枯草塘……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大烟炮’,谁敢挡?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狗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这是“北大荒”自然景况的真实写照!

“北大荒”虽然自然环境险恶,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带之一,多数土地黑土层厚达1米以上,土质肥沃,有“抓把黑土冒油花,插上筷子也发芽”的美誉。这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分属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的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地、均匀地遍布全区;大气降水充盈,平均年降水量500毫米以上。这里夏季日照时间长,气温高,全年太阳辐射量几乎与长江中下游相同。此种自然条件,非常有

利于农作物成长。“北大荒”的许多地方蕴藏着丰富的多种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水产和野生动物资源。

“北大荒”因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人群在此繁衍、开发。据一些史籍零散记载:夏、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在这里曾与中原频繁往来。战国以后,这里的悒娄人臣服秦、汉。唐、五代时期,渤海王国在这里谱写下200多年的昌盛史。强悍的女真人在这里建立起强盛的金朝,一举灭掉了辽与北宋。元、明时期,在这里曾搞过屯垦,但为数很少。

到了清代,对于开发“北大荒”出现了招垦、封禁和开放三个不同时期。清初为边境地区防务解决军粮供应问题,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实行移民奖励政策,在黑龙江招募移民,推动了屯垦。清王朝害怕汉族人大量移往东北和黑龙江,从康熙八年(1669年)到咸丰七年(1857年)在长达188年的漫长时间里,实行了封禁移民政策,严禁汉族人民流入黑龙江,这就制止了对“北大荒”的开发。从咸丰八年(1858年)以后,清王朝又推行新的“垦政”,实行“移民实边”。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黑龙江制定了《沿边招民垦荒章程》，列出诸多优待办法，吸引垦民。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曾用白银2.25万两，购进火犁，在讷漠尔河南段开荒，为官办垦殖的开端。但从总体上看清朝时期对“北大荒”的开发，并没有多大的实效，光绪十三年（1884年）黑龙江全省人口总共只有25万人。

辛亥革命以来，新军阀、官僚有些人采取到黑龙江占荒霸地办法，企图掠夺“北大荒”丰富的荒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先后兴办了东井、智远、近恩、广信和火犁等五大火犁公司。1912—1925年这五大火犁公司共占荒地130.6万亩，共开垦10.33万亩。这些掠夺者，在随后的开发中，遇到重重困难，都先后垮台。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1934年日本拓务省拟

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要在20年内从日本移民百万户500万人口到“北大荒”开荒。他们组成“开拓团”，分批移民到“北大荒”。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在北大荒的日本“开拓团”有1131个，移民约30万人，但垦荒面积不多。日本投降时，“开拓团”成员狼狈逃窜，土地撂荒，遍地黄茅白骨，人烟罕迹，满目苍凉。

千百年来，对于开发“北大荒”，曾有人断言：“不有天神下界，匠星临凡，天精地力，鬼斧神工，何能稍改其面庞！”

二、共产党人开创的“北大荒精神”使千古荒原巨变

1947年春，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陈云、李富

春明确指出：东北行政委员会及各省都要在国民党难以插足的地方，试办公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生产试验，以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在当时最艰难的岁月里，一批从延安和其他老革命根据地来到东北的干部，带领许多拓荒者，踏上渺无人烟的“北大荒”茫茫荒原，掀开了开发“北大荒”新的一页。

1947年至1949年，是开发“北大荒”建立第一批国有农场的三年。

宁安农场是最早建立的一个农场。1947年初，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李在人，受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派遣，带领16人，于6月间在尚志县一面坡的荒原上开荒建农场。他们搜集日本“开拓团”遗留下的破旧拖拉机和农具，居住在农民的窝铺里，当年开荒1350亩。不久，他们发现当地

没有连片的大片荒原可开，于1948年3月搬迁到延寿县，当年开荒播种8000亩，收获了第一批粮食。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里的荒地多属山坡和洼地，不宜于大面积机械化耕作，于1949年又迁到宁安县开荒建场，这个农场两次迁移、三次开荒建场的曲折道路，反映了建设第一批农场的艰难历程。



在北大荒安营扎寨

通北农场也是1947年第一批建立起来的农场之一。人民解放军原辽北军区司令部作训科长周光亚,受命带领3名通讯员,进入通北大荒原,在日寇遗留的一座碉堡废墟上挂起农场的牌子。他们白天深入白雪皑皑的茫茫荒原,踏查荒地,夜间在碉堡废墟里防范野狼侵袭。这就是电影《老兵新传》创作的生活原型。

宁安、通北农场开荒建场的同期,还建立了赵光、花园、永安、查哈阳等农场。

这一时期,革命残废军人则创建了荣军农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有许多革命军人伤残。这些人被称为“荣誉军人”,需要妥善安置。兴办农场是安置荣军诸多办法中的一种。1949年在“北大荒”上办起了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和松江省伏尔基河荣军农场。伤残的荣军开荒办农场,要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身体伤残的困难,开荒建场的历程更加艰苦。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的创建,反映了荣军开荒建场艰苦创业的概貌。本人曾经在1952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和1952年12月23日的《大公报》先后发表了两篇题为《一个由荣誉军人建造起来的机械化农场》和《记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长篇通讯,记述荣军们开荒建场艰苦创业的主要情况。

这些拓荒者在千古荒原上艰苦创业的作风,被总结为“北大荒精神”。其主要内涵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北大荒精

神”在几代人开发“北大荒”壮丽事业中发挥了神奇的力量。

从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在开发“北大荒”创建国营农场中,出现了新高潮。

1954年6月和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两次到密山和虎林地区,考察了那里无边无际的亘古荒原,提出大批铁道兵复员转业到这里开荒建场,“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设想。当年10月,余友清带领由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组成的先遣队,到密山、虎林的荒原上勘查,选定场址,1955年在那里创建了八五〇农场。这是在“北大荒”上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1955年8月,王震向党中央提出铁道兵储备后备官兵,举办国营农牧企业的报告,建议由铁道兵在密山、虎林、饶河三个县境内,创办综合性半机械化农牧企业。经中央批准,铁道兵有9个师的复员转业官兵到达这里,创建了一批农场。这些官兵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7年开垦出荒地260多万亩,拥有拖拉机近千台,有职工3.2万人,建成房屋32万平方米,办起了商业、邮电、教育以及政法、边防等各项事业,一个崭新的垦区,在千古荒原上创建起来。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时,苏联政府向我国赠送了可供30万亩耕地大型谷物农场使用的全套机械设备,并派出土地规划、农艺、农机、财会等各方面专家当顾问。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省建

立友谊农场,任命王操犁为场长。这个大型谷物农场建立在集贤县的荒原上,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和部门的大力支援下,1954年12月开始建场,1955年当年开荒30.5万亩,在部分土地上当年播种,当年收获,当年经营有利。友谊农场按照苏联国营农场的经验开发建设,有许多办场的好经验,很快地在全国各地农场中得到推广运用。

1954年八、九月间,原在山东省转入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经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8300多名齐鲁儿女移垦“北大荒”,创建了二九〇、二九一和十一等三个农场。

在这一时期,大批支边青年到“北大荒”开发。1955年北京青年杨华率领一批青年,接过胡耀邦代表团中央授予的垦荒大旗,到“北大荒”建立了萝北农场。与此同时,山东省的大批农村青年支边到“北大荒”各农场。

从1958年开始,“北大荒”进入全面大发展时期。1958年全国有大批解放军官兵复员转业投入生产建设,其中进军“北大荒”的号称10万人,实际有7.2万人。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页。1958年3-5月,运送解放军官兵的一列列军车,从大江南北、南海之滨,向“北大荒”汇集。1958年4月,农垦部部长王震到“北大荒”欢迎转业官兵。在密山车站的万人大会上,王震亲笔题写了赠给转业官兵的对联:“完达山下

英雄建国立家园,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粮田。”(“密虎宝饶”指黑龙江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4个县),横联是“艰苦创业”。这7万多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会同农垦战线上的原有职工们,共同在开发北大荒的战斗中,谱写下更多的艰苦创业的壮丽诗篇,推动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空前大发展。

三、今日“北大仓”

到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上已将3000多万亩亘古荒野,开垦成肥沃的良田,安置了近200万人口在农场里安居乐业,每年上交10多万吨商品粮,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荒蛮的“北大荒”已经开发建设成初具规模的“北大仓”。

“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也经历了曲折道路。“大跃进”时期盛行一时的“瞎指挥”,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高征购,对农垦事业曾经造成严重损害;而十年“文革”时期,对“北大荒”农垦事业诸多方面的冲击,其危害更为严重,到“文革”结束之时,“北大荒”农垦的整体经营水平还很低。1978年,黑龙江垦区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200来斤,提供的商品粮只有11.5万吨,垦区人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28.2元。从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推动下,“北大荒”的农垦事业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向高水平发展的新局面,

现在崭新的“北大仓”展现在人们面前。

建设成就体现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运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北大荒”创建国有农场,最早使用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二战”结束时调来的欧美国家的落后机型。随后多年使用原苏联农业机械和仿苏型的国产机型,都不属于先进水平。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之时,各地农垦部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机械和生产技术,开展了多种内容的农业机械化向高水平发展的探索、实验。黑龙江垦区的友谊农场第五分场第二生产队,1978年从美国成套引进先进农业机械,只用20名农业工人,经营2.3万亩耕地,进行粮豆机械化生产实验。当年每个农业工人生产20万斤粮食,获得惊人的高额劳动生产率。到1984年,这个生产队先进农业机械化实验七年间上交利润、缴纳税金和提取折旧基金,累计回收资金443.4万元,占农业机械装备总投资的96.2%。如此高效益的成效,在建设“北大仓”中,发生了轰动效应。现在黑龙江垦区的农业机械,经过多次更新换代,大部分已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机型。到1999年黑龙江垦区的农机总动力已达455.4万千瓦,比1978年增加64.5%;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35万台、大型联合收割机7045台、喷灌机1406台、水稻插秧机1.33万台;还拥有农用飞机25架,农

业机械化程度已达80%以上。

(二)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使粮谷迅速增产。

为了全面提高垦区的科学技术水平,黑龙江垦区逐步建立了完善了科研开发、服务体系。他们以农垦科学院为首,设立了17个科研院(所)、9个技术推广中心、103个技术推广站,拥有各类科技人员10多万人。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已高达63%。黑龙江垦区粮食平均亩产量1978年为204斤,1999年提高到654斤,增长2.2倍。

(三)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黑龙江垦区已组建成18个产业化集团,形成181条大小产业链,把全垦区103个农牧场、22万个家庭农场和23000个农户,紧密联结在一起。一批以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业为主的龙头企业和产业化企业集团不断壮大,年加工能力多达500多万吨。农业产业化经营已创出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以“北大荒”、“完达山”、“兴凯湖”、“北珠”命名的农产品精加工产品,已驰名全国并打入国际市场。1999年,各农场中家庭农场人均年收入已达3227.4元,比1978年的228.2元增长13.1倍。

过去渺无人烟的“北大荒”亘古荒原,不知埋葬了多少想要开发的人们的破碎的梦;今天富饶美丽的“北大仓”展现在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 吴 思)

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 章世鸿

20 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对这段付出极为沉痛代价的历史,至今尚未有科学的总结。比如,对前苏联历史中许多问题,由于斯大林时期对联共党史的篡改,许多是非至今若明若暗。我们这些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对苏联的了解多来自一本教材,那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现在当然已毫无影响可言,在书店和一般图书馆中已不易找到。但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则影响很大,后遗症不能低估。

这本书出版于 1938 年,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大流血而又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时期。正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出版了。这本书名义上是由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而实际上是斯大林亲自修订的,反映的完全是斯大林的观点。因为当时斯大林的领导地位已巩固,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因而由他亲自修订的《教程》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此书一出,其他党史教材一律作废。凡是党史和基本理论方面的一切观点和材料,都以此《教程》为标准,与此书不符的都宣布了死刑。此书在苏联国内成为“必读书”,在中国党内也把它当作经典读物,发行量是空前的。我在青年时期就认真读过这本书,印象极深。可以这样说,我对苏联党史的了解,当时完全是根据这本书,不再有第二本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本书把苏联革命成功只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斯大林。列宁早逝,那就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而且按书中的记载,这个人从来不犯任何错误,是一贯正确的典型。严格地说,这本书有太多的问题,因而要全面核实这本书的内容,那需要写一本厚书,其

篇幅至少不比《教程》的篇幅少。现在要这样做是困难的,我只能有重点地探讨几件事。

到底哪些人领导了十月革命?

到底是哪些人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教程》写的内容很多背离史实。

这本书把十月革命时许多领导人都排斥在外,甚至把许多革命元老,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至布哈林都说成早在十月革命前已是“暗藏的阶级敌人”。于是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十月革命自始至终是由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最多再加上斯大林的几个亲信,其他元老不但没有功劳可言,甚至都在起破坏作用。

有些事完全颠倒是非。如俄国二月革命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在如何对待俄国临时政府提出的护国主义的问题上,《教程》硬说加米涅夫等人维护护国主义,而斯大林则“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立场,并且号召群众进行积极争取和平的斗争”。但实际情况是,二月革命爆发后,恰恰是刚从流放地回来的斯大林支持和赞成临时政府的护国主义的错误立场,这是斯大林也做过检讨的。这本教材中写的却完全相反。

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军事总部。这个总部受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只是这个军事总部五名领导成员之一。起义那一天,主要是由托洛茨基布置了起义的具体事宜,斯大林没有分配到什么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1917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季诺

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 14 人入选大会主席团,其中没有斯大林。这说明当时斯大林并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不高,他对十月革命并没有突出的贡献。

但《教程》中却说,在 10 月 16 日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选出了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并说这个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领导了全部起义。这完全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

恢复托洛茨基的历史地位

在俄国当时革命领导人中,其政治面貌被歪曲得最严重而且长期难以恢复的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托洛茨基被当作最凶恶的敌人,几乎是谈“托”色变。“托派”,不但在苏联党内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被当作敌人。

作为革命元老之一,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内战期间都作过很大的贡献。当时他的地位高于斯大林,这一点,斯大林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托洛茨基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当时列宁在国外,主要是他领导了 1905 年的二月革命;

二、他是十月革命的直接指挥者,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他和斯维尔德洛夫直接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

三、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仍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亲临前线,身先士卒,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英法等国支持的叛军的斗争,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

四、内战结束后,交通瘫痪,托洛茨基又兼任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

有关托洛茨基的事迹,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因而大家对他所知甚少。中国的出版界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才开始客观地谈到托洛茨基,揭示当年苏联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传》。这本自传的译者石翁等写了一篇很长的《译者前言》,对托洛茨基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可以从

中了解不少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情况。1998 年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三大部波兰理论家伊萨克·多伊彻的论著《先知三部曲》,介绍托洛茨基生平。此书在欧洲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是研究托洛茨基重要的参考书籍。

我以为,要真正了解联共党史,需要有多方面的材料,而研究托洛茨基是一个重要方面。托洛茨基 1940 年在墨西哥被暗杀前,把他掌握的材料交给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那里有托氏档案。其中开放部分可以自由借阅,还有“保密部分”,托洛茨基要求保密到 1980 年。现在估计也可以自由借阅了。

列宁逝世前后苏联的党内斗争

列宁病逝前夕,在接班人问题上,形势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列宁并没有指定谁是接班人,更没有明确说斯大林是接班人。而且就当时情况说,列宁同斯大林之间有不少矛盾,列宁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这段历史如何写?《教程》的作者可谓费尽心机。首先,这本书完全掩盖了列宁同斯大林之间的一些观点上的分歧以及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满,把斯大林说成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而据一些权威史料记载,自 1922 年 4 月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后,他的专横独断的作风开始暴露,并采取各种手段争夺接班人的地位。他拉拢一批人,竭力排斥他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面对一些事件上斯大林的专横态度,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尖锐了起来,这主要反映在下列几件事情上:

一、在斯大林任总书记之初,党内就对外贸易要不要由国家垄断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斯大林等人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应放松对外贸易的垄断。列宁则坚决主张对外贸易仍应由国家垄断,不能放松。托洛茨基支持列宁,因而列宁经常同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并要求托洛茨基在外贸问题上同斯大林等人的错误展开坚决的斗争。这件事,最后是列宁取得了胜利,斯大林虽表面上接受列宁的意见,但心怀不满。

二、在如何对待格鲁吉亚这些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严重对立。列宁坚持苏维埃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建立联盟后,苏维埃

俄国应该尊重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对格鲁吉亚也应采取这样的立场。而斯大林则企图剥夺格鲁吉亚的自主权,把它降低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受俄罗斯领导,而且在处理这件事时采取了高压手段,引起格鲁吉亚上下严重不满,使民族矛盾激化。列宁在病中为此特派人去进行调查,结果证实斯大林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行为。列宁对斯大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最后列宁虽取得了胜利,而斯大林在执行中则仍然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三、自从列宁病后,党中央指定斯大林为列宁的“监护人”。斯大林以关怀列宁健康为名,对列宁封锁消息,限制他的通信、会晤的自由。列宁在病床上了解到斯大林当总书记后种种不正常的表现,引起了警惕。他看到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两人的对立,担心党内领导不和,造成分裂。列宁经反复考虑后,于1922年12月24日口述了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指出,党内领导人不和,使党有分裂的危险,他希望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至100人,这是避免分裂的一种方法。他在信中接着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对上述信件作了补充,他指出:“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较少任性等等。”(引自《列宁全集》43卷中文版340页)

四、也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令列宁十分不愉快的事。斯大林有一次在同列宁夫人克鲁斯卡娅通电话时,破口骂人,态度粗野。斯大林所以动怒是因为列宁当时口授一信给托洛茨基,此信由列宁夫人笔录。斯大林指责她这样做“违反”医生规定,对列宁病体不利,扬言要告到监委会。而列宁夫人说,她这样做,是得到医生同意的。其实斯大林是对列宁不满,是对列宁同托洛茨基联系太多不满,不过借此发泄自己的怨气。

列宁夫人没有把此事告诉列宁。列宁在间接听到这件事后十分生气。1923年3月5日,列宁给斯大林一信,严厉批评斯大林的粗暴作风,并要斯大林向他的夫人道歉,否则宁愿断绝两人关系。结果是斯大林向列宁夫人表面上表示了道歉。(参见《列宁全集》43卷569页)

由于存在着以上一系列问题,可以想见,列宁逝世前一年左右,在接班人问题上,形势是复杂的。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列宁的撤换总书记的信件如果在1924年5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为列宁的“遗嘱”宣读,那么,对斯大林十分不利。这个时候,斯大林十分紧张,积极进行幕后活动,拉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希望他们助他一臂之力。而当时季诺维也夫也想当接班人,他的主要对手也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错误地认为斯大林地位不高,不必怕,他就暂时支持斯大林。于是由他出面,在党代会召开前的中央全会上,违背列宁意愿,支持斯大林继续当总书记,并且由全会多数人通过,不再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样,列宁的这份“遗嘱”就被打入了冷宫。斯大林继续当总书记。

那么,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态度怎样呢?他的态度十分软弱,在列宁同斯大林发生冲突时,他不想让人感到他在同斯大林争权,他也担心此事处理不好党可能要分裂。但他又认为即使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也未必就能当上接班人,因为当时“总书记”这个职务,地位并不高,实权掌握在政治局。因而,他顾全大局,同意斯大林在改正列宁指出的缺点和错误后可以继续留任。这样他就把列宁提供的一颗“重磅炸弹”轻易地给放弃了。

应该说,托洛茨基最终所以失败并非是他在理论上革命实践上不如斯大林,在许多方面,托洛茨基是强者,是英雄,但在权力斗争中,他却是一个弱者。而斯大林却是权力斗争的“高手”,他充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扩大自己的权力,特别是把人事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借此拉拢许多人,在党内领导层形成了多数。他又具有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能力”。他为了除掉托洛茨基,千方百计拉拢季诺维也夫为他服务,等到托洛茨基失败,他再来收拾季诺维也夫一伙。如果说,在理论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比斯大

林强得多,那么,在权力斗争的谋略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四个人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斯大林。他们在权术斗争中都败于斯大林,最终都被斯大林一个个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掉了。

布哈林比斯大林高明

本来党内有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应该用民主讨论的方式来解决,但《教程》却把对斯大林有不同意见者称为“反对派”,并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实际上“反对派”的意见很多是正确的。比如,在如何对待农业和农民一系列问题上,布哈林就比斯大林高明得多。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反省农业问题上“左”的错误时,重新研究了布哈林的理论,曾出现过“布哈林热”。

布哈林同斯大林对经济问题的分歧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一、斯大林强调工业化,特别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而布哈林认为首先要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二、斯大林强调要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而布哈林则强调要同时允许个体农业经济存在,反对全盘集体化。

三、斯大林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布哈林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认为,群众的消费的增长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四、斯大林要结束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而布哈林主张应按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

五、斯大林提出“贡税论”,要农民多交税多作出牺牲,为国家工业化出力,布哈林则认为不能损害农民利益,要提高农产品价格,要在经济上处理好工农联盟。

现在看得很清楚,按中国农业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教训,证明布哈林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斯大林的做法背离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结果导致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受挫,大批农民离开农场,大量牲畜被屠宰,粮食严重减产。据最近俄国新编教科书揭示,1932年至1933年,由于粮食歉收加上干部强行收购粮食,苏联农村

发生严重饥荒,500万人丧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个问题上则完全美化农业集体化运动,似乎只是地方工作人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生一些过火行动。在纠正这些错误后,集体农庄巩固了,增产了。而布哈林则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炮制者,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最后竟说他早已是国外派来的间谍。

为大清洗制造理论

《教程》发表在1938年,当时斯大林已经在党内和社会各阶层相当大的范围内错杀了一大批人,整个社会充满恐怖氛围。为什么要如此多地错杀人,《教程》花很多篇幅,阐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的新论据:

其论据之一是说“阶级敌人越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越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越加尖锐的形式。”

其论点之二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这种理论被利用来作为党内打击异己的根据。

《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还插入了斯大林亲自撰写的一篇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点的哲学论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哲学家们都围绕着这篇文章转,视为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能有丝毫怀疑。斯大林之所以要修正马恩的哲学观点,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首先,斯大林否定唯物辩证法的第一条根本规律,即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规律。这条规律认为,自然和社会一切事物都包含内在的矛盾。矛盾存在于事物内部,既统一又有斗争。事物即在矛盾的统一和斗争中发展。而斯大林则只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而不谈事物的辩证的统一,不承认事物内部的对立面具有内在联系并且相互依存,当然也就更不承认对立面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相互转化。这正好犯了恩格斯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也背离列宁对辩证法的正确理解。

斯大林所以不提事物的矛盾的统一性，无非是说，对阶级敌人，对党内反对派，只能无情地加以消灭，而没有任何同一性和统一性可言。同时，斯大林还把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擅自改为四个“基本特征”，同时又把否定之否定这条基本规律取消了。为什么要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无非是说，新生的苏联否定了旧俄国，我斯大林否定了党内反对派，绝对不可能再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苏联不可能再一次被否定，我斯大林也绝对不可能再被否定。但事实是无情的，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规律不可能凭个人意志而消失。现在来看，前苏联确实被否定了，斯大林的错误也被揭发了，这正是否定之否定的基本规律在俄国历史进程中活生生的体现。

斯大林为大清洗的需要，制造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理论，硬说这是“列宁的著名原则”。其实列宁只讲过十月革命时期、内战时期阶级斗争激烈，并没有说过和平建设时期也要大搞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

决不是个人暴政。显然，这是斯大林借列宁的名义制造出来进行自相残杀的理论。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把斯大林这种理论视为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使党内和人民内部斗争越来越激烈，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斯大林清洗了哪些人？

自基洛夫 1934 年 12 月 1 日在列宁格勒被暗杀后，斯大林就借机开始了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洗大流血。《教程》一书对此写得杀气腾腾，充满血腥味。

那么，被斯大林称为间谍、特务、白匪、法西斯主义奴仆的是些什么人呢？

我手头有一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内部发行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一书，作者是美国籍鲍里斯·列维茨基。这本书在长达 600 多页的篇幅中罗列了一份 30 年代苏联大清洗中牺牲者的名单及其传记。我读完这本厚厚的书，真感到触目惊心。

此书一开始首先介绍基洛夫案件。1934 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在办公楼被暗杀。本书认为基洛夫是反对斯大林的带头人，也是最早一个受害



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

者。基洛夫死后,斯大林乘机铲除了基洛夫手下的许多干部,包括列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市的州委书记和市委书记达 100 多人。

接着这本书提供苏联军队受摧残的材料,为首的是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他被控告为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同图哈切夫斯基一起被害的军官有 83 人,他们都是红军中富有经验的中坚力量。后来查明,这完全是希特勒特务机关设下的圈套。他们伪造了一批图哈切夫斯基暗中同德国军方勾结的信件,自有“蒋干式”的人物将这些假情报献给斯大林。斯大林中计,难怪希特勒听到一大批苏联军官被害的消息大为兴奋,于是下定了要进攻苏联的决心。军队的大清洗持续到 1940 年,被清洗的军官总数达 3.5 万人,这是德军向苏联发动进攻初期苏军节节败退的直接原因。

除军官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的苏共领导人、苏联各民族共产党的领导人及许多杰出的外交官、工业界人士、科技和经济界人才。正因为如此,大清洗后苏联工业受到严重打击。

1934 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们的命运最惨。中央委员 139 人中 98 人在 1938 年被处决和逮捕。1916 名代表中有 1108 人被捕。

当然,这本书提供的材料只是一部分,大清洗的范围还要大。

不但对苏联国内,甚至对外国共产党,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也施行粗暴干涉,最严重的是在 1938 年解散了波兰共产党,并把波兰共产党视为间谍组织,逮捕和处决了波共创始人瓦爾斯基等多人。当时在苏联留学或工作的各国共产党人和学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对苏联老百姓的迫害也是严重的。克格勃后来设置第五总局就是专门用来对付苏联居民中不满现状者,苏联当时监狱、集中营、疯人院遍及全国。

30 年代被镇压的受害者共有多少人,至今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在《让历史审判》一书中揭示:1936 年——1939 年受到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人。1937 年——1938 年镇压和枪决活动是如此猖狂,仅莫斯科市当时根据法院判决书枪决

的,一天就有上千人。

斯大林残酷无情的性格也给他的家庭带来悲剧。他的夫人阿利卢耶娃,也是一个革命干部,因不堪虐待在 1932 年 11 月自杀身亡,而社会流传的说法是被斯大林杀死的。他有二子一女,命运也很悲惨。他的女儿在斯大林死后给友人写信说,她在为斯大林遗体守灵时曾冒出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解放,它对所有的人说,对我也是一样,是摆脱一种共同的压迫,这样压迫像一块巨石,压在一切心灵、精神和思想上。”

从政治体制中找原因

面对可怕的历史图景,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革命领导人为什么最终会蜕化为一个绝对的、野蛮的专制主义者?人类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这里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有的,我们应该从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中去找。

十月革命时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队伍需要有集中的意志,需要高度的权力集中,这样才能有一支铁的队伍。在当时条件下,当然谈不上什么民主与自由,一切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强大的复辟势力,也不得不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应该说,这种体制在战争时期产生一种凝聚力,也确使当时革命政权在危急中免于被摧毁。

但列宁在内战结束后已经看到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他力求进行政治改革,而且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可惜列宁早逝,他的计划没有实现。

列宁在病逝前一年,在病床上已经看到斯大林的致命的缺点,并认定他不适合当一国之领袖,现在看来,不能不说列宁确是十分敏锐,比当时任何人都看得准确,也说明他痛恨粗暴和专制。但在接班人问题上,列宁不想一个人说了算,他对斯大林虽极不放心,但他只是提交给党代表大会去解决。可惜的是当时列宁病重,后来完全丧失说话能力。这就使斯大林的夺权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列宁在晚年力图扩大党内民主,采用加强监察机构、取消干部委任制、进行民主选举等办法改变党内的不正常状况。为加强对党委的监督,

1920年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委不属同级党委领导，而是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提交联席会议或代表大会解决。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列宁不早逝，如果按列宁的原则和设想进行努力，那么，苏联的政治体制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

斯大林上台后，虽然《教程》中吹捧他“高举列宁主义大旗”，实际上他没有按列宁确立的原则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却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丢掉民主与法制、党政不分、官僚主义严重、个人崇拜盛行的政治体制，最终是由中央集权变为个人独裁。并且把这种个人独裁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种下了苏联最终灭亡的祸根，也毒害了其他国家的党。

十月革命经验的局限性

十月革命离开现在有80多年了。我们已进入新世纪，站在历史的新的起点，回头再来看当时俄国革命，我们的评价肯定会更实事求是一些。现在，中国不少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武装暴动的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十月革命胜利得太快了，当时许多俄国革命者都感到意外，包括上层领导内部。当时联共党内不少人并不主张立即举行工人武装暴动，结果攻打冬宫胜利了。但这是非常脆弱的胜利。如果说有必然性，那也是非常脆弱的必然性。其原因是当时的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更加脆弱，而革命者的意志，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些领导人的顽强斗志和领导艺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场革命的胜利所花的时间和代价是不多的。革命胜利后，各种内外困难极大，也完全可以导致革命的失败。但这些难关也靠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人的因素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各国革命共有的规律，似乎别的国家也非要采取十月革命的方式取得胜利，那就未必如此。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强调城市暴动等一套“左”的做法，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这就是采用十月革命方式失败的一例。中国革命走的是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农民战争的道路，走这条道路侥幸因素很少，靠的是实力的较量，使革命队伍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但斯大林对中国这条革命道路一直心存怀疑，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他仍然没有充分肯定，只是勉强地承认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在许多事情上，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仍不改当年列宁早已批判过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

显然，《教程》一书中推荐的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模式被斯大林凝固化美化了。而这种模式在苏联解体以后，更清楚地证明了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中国在革命阶段，正因为摆脱了十月革命模式才取得全国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则因为受到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边倒”，走了20多年弯路，损失惨重。而我们于上世纪80年代始最终能跳出困境，正是在按邓小平理论摆脱苏联那套模式之后。当然，要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仍需作艰苦的努力。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学术界对苏联问题和斯大林问题的认识有了更大的透明度，不再以貌若公正来美化斯大林，而是力求无保留地恢复斯大林的本来面目。如中央党校姜长斌、左凤荣写的《读懂斯大林》一书，就给读者画龙点睛的印象。

最后我想借用这本新书的作者的观点来结束我的文章：

我们说斯大林——苏联模式坑害了几代共产党人，并不为过。

我们曾错误地把斯大林亲自修改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加以学习，贻害无穷。

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应该是一种解脱、解放。

我国改革开放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要较为彻底地清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任务还很艰巨，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林 耀）



读《新华日报的回忆》

● 向继东



1942年,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整风学习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前,创办的报纸,影响力最大的恐怕要算《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两种了。《解放日报》在延安,自然好办;但《新华日报》办在重庆,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一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眼皮下办的共产党报纸,既要坚持说真话,又要对付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就是当年参与办报的老报人的回忆录,说的都是办报人的种种艰难。我今读之,竟也兴味盎然。

上世纪80年代曾做过《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先生回忆说:“蒋介石国民党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就是:让你办报,但是又不让你讲话。一句话,就是不让《新华日报》有言论自由。”(《新华日报的回忆》112页,以下只注明页码)中共“党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周恩来同志写的专论,《解放日报》社论,通常都是不许登载

的。几次反共高潮时期,甚至‘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名词都不准见报。”(113页)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要审查,送上去的稿子,经常被打上“免登”或“删登”等字样。但办报人很智慧,或开“天窗”,或打“××”,或注明“以下奉令删登”,弄得新闻官们很是“感冒”,却又无可奈何。“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当年1月18日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但又不让《新华

日报》发表披露事实真相的报道。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国民党不让发表。那几天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亲临报馆审稿,办报人则机智地制作了两块版,一块是周恩来的题词,一块是给检查官们看的。就这样,在检查官们一字一句审稿的时候,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已经印出来了。印出来以后怎样?熊复先生文章没说受到何种处罚,但读此书知道,国民党的处罚一般就是“警告”或勒令“停刊”几天等。

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回忆说:“《新华日报》对国民党统治区一切黑暗的现象,无不尽情加以暴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则代他们发出沉痛的呼声。”(44页)报纸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对特务、党棍以及土豪恶霸、保甲长的种种不法行径,都进行了揭露,使人民看清了痛苦的根源在哪里。1946年4月,国

民党借口《新华日报》登了《驳蒋介石》一文,说“侮辱了元首”,叫嚷着要封闭报馆。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捏造了一些团体,在柳州、开封等地方法院控告《新华日报》。柳州法院把这一控案转到重庆,企图打压《新华日报》。但是,在《新华日报》严词驳斥和律师界朋友的帮助下,重庆法院不得不批曰:“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毁谤,须本人起诉。”(45页)大概蒋不会直接上告,所以就搁置了。

国共谈判破裂后,内战打起来了。1946年7月,中共军队在苏中七战七捷,消灭蒋军5万多人;1947年1月,中共军队在鲁南枣庄、峄县地区消灭蒋军5万多人;2月,又在鲁中莱芜地区消灭蒋军6万多人……这些消息,《新华日报》都设法登了出去,并登出被俘军官的名单,号召家属和他们联系,弄得国民党很是尴尬。当时曾有人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45页)不久,《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派重兵包围了,安据点,筑工事,甚至设置机关枪阵地,如临大敌一般;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更加严厉了。国民党明确规定: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准登,国统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的消息不准登……《新华日报》却采取变通的办法,常常只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就登了。更多的时候是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使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毫无办法”。于是,国民党就质问《新华日报》,“究竟重庆是谁管?真是无法无天了!”(47页)但正是这样,《新华日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两年前,有人编了本当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社评论论集,我统计了一下,全书收文92篇,其中从《新华日报》选入的就有68篇!《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茅盾)、《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

人民的歪风》(陆定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潘梓年)、《言论自由与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为笔的解放而斗争》……读读这些社评的篇目,就可知当年《新华日报》的追求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与人民“共患难、同呼吸”的。

如今读着这些老新华报人的回忆,我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新闻界前辈们在国民党专制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顽强,令我敬佩万分。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羡慕他们!他们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告诉了人民——尽管国民党经常派特务或流氓骚扰报馆,或捣毁房子,或破坏设备,或打伤人、抓走人,但报纸还是照常出。该说的话,说了;想发的文章,发了。使《新华日报》的期发量最高达6万份——而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行仅一万多份。这说明了什么?人民在听不到真话的时候,《新华日报》说了真话。

老报人袁鹰在《同舟共进》(2002年第12期)上撰文说:“顶重要的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这话说得多好啊!(责任编辑 吴思)

《中华老年光彩人生》征稿启事

《中华老年光彩人生》是一部生动记录我国广大老年朋友闪光足迹的大型纪实文学图书,由中国老教授协会和北京五洲华夏文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纂,《中国老年报》副总编辑邱锋、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毕风、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必俊共同担任主编。该书以回忆录的方式深入反映社会各界老同志难忘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等,将作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留传给子孙后代。现全面征稿,有关事宜如下:

一、**征稿栏目:**难忘经历、峥嵘岁月、美好回忆,献给爱人、怀念父母、纪念朋友、创业历程、老有所为、作品成果、成功经验、康寿之道、人生感悟,涉老企业精选。(可附珍贵照片)

二、**文稿体裁:**限人物通讯、回忆录、散文、诗歌、个人传记及非文字作品的照片等。

三、**撰稿要求:**作者根据所选栏目,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自拟题目深入描写。内容事迹要求主题鲜明、真实生动、有代表性。篇幅控制在2000字左右,并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历。来稿请注明投稿栏目。

四、**截稿日期:**2003年4月30日。入编者颁发荣誉证书,欢迎参加出版座谈会和颁奖仪式。

来稿请寄:北京西客站邮局 100055—1041 信箱

邮编:100055 联系人:谢德高 电话/传真:(010)68179369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 王金锐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而耀邦同志却不幸辞世已11年了。我想把我和耀邦同志接触的这点亲身经历写出来,作为对他这么一位好共产党员、好领导同志的永远怀念。

我17岁即参加公安工作,一夜之间忽然成了“专政对象”

我17岁念高中时参加了地下组织“民联”,1949年初即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1949年10月参加保卫国庆大典后就入了党,直到“文革”。这十几年,虽没什么建树,但日日夜夜地奋战,勤勤恳恳地工作,在老领导主持下,尽职尽责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但在“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好多局、处级领导及干部遭到了残酷迫害。眼见好多领导同志明明是努力工作,“保卫毛主席”的,却变成了“蓄谋陷害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我思想上不通,不能理解。于是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我想不通的看法。我想,一个党员干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表达自己意见,这应当是正当的权利。我没有涉及整个运动,只谈了对北京市公安工作的意见。这信,是我署了真名,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中央办公厅信访室的。过了几日,我去信访室问,得到的答复是:信已由办公厅汪东兴主

任让转交公安部长谢富治及市局军管会刘传新主任处理了。

这封信转下来不久,单位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就以“现行反革命”、“写信死保冯(基平)邢(××)大特务集团”、“特务集团黑干将”等罪名,把我拉到公安局内操场上批判。有人对我拳打脚踢,头被打破,血流不止。局内操场满是批判我“恶毒攻击”之类的大字报。遭毒打后,紧接着就是被抄家。从此,我就被关押在公安局地下室内。后来又被装上卡车,押送到良乡监狱看守所,无休无止地写检查、“请罪”、批判。

在良乡监狱押禁三年,看来真要以我给毛主席写信定罪“反革命”,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但刘传新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于是又另给我定了一个“罪名”。我家有八间自住房,是我七岁时父母买下的,当时我母亲在房产契继承人上写了我的名字。现在就以此定我为“吃剥削”的“阶级异己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且勒令退职还乡。我从小生长在北京,一家老小均在北京,哪里有“乡”可回?然而还是限期将我押送到我父亲十几岁即离开的原籍——河北省静海县靳官屯。从此,我就成了不是党员、不是干部、连北京市民也够不上的“贱民”,成了农村的“四类分子”与“专政对象”,连起码的工资与养家生活费都没有了。这样的难熬岁月,又是七年。三年的监禁加上七年的轰赶,就这样熬过了十年。

在荒郊野地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千里骑车回京过除夕竟被赶走

公安局的造反派把我送到农村,介绍了我的“身份”就走了。我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房里,干农

活糊口。我本想当个农民了此余生,没想到当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不久,县里的工作队进村,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他们批判完几个地富分子后,就大声喊:“王金锐站起来!”然后说:“他是北京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同农村地富反坏一样的剥削分子”,接着喊起:“打倒剥削分子王金锐!”“王金锐,必须老实接受改造,不然,死路一条!”等口号。

于是,我又被赶到村外,在一片荒郊野地,看守几十个孤坟和盐碱地里长的枸杞子树。我在荒坡一间屋内,与孤坟为伴。

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近一年,到腊月二十几了,村里人忙着赶集过年,村干部觉得我一个人在那里孤单单的,就给了个临时证明,让我回家看看。我如获大赦,骑了辆又旧又笨的自行车,带了点鲜肉和给孩子买的花布,从沧县、静海,经四、五个县界,顶着西北风,骑了两天两夜,兴冲冲地回到了北京的家。

可那个年月真是人性扭曲,世态炎凉。过去住同院又是军属的好邻居,“文革”中成了“治保委员”。就在我赶回去想一家团聚的时候,她将我叫到居委会,板着脸孔训斥说:“不成,你现在是农村的地富反坏,不准在北京过春节。”我拿出村里开的临时证明,也不成。

腊月二十九日晨,我万般无奈地告别了爱人、孩子,离开了北京的家,连夜骑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农村。除夕之夜,我在荒地、枯树、坟头边的凄凉小屋独自一个人默想,这难言的冷漠和屈辱,何时算是个头呢?!

当我感到失去生的希望时,耀邦同志鼓励我:“要挺过来,坚持下去!”

后来环境略为宽松,农闲时允许我回来在家照看孩子。朋友帮忙,在街道找点剪摘羊绒衫上杂毛的活,协助爱人养家糊口。我内心有难言的痛楚,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当我深感失去生的意念的悲哀时刻,竟使我在近于绝望中,出现了转机,获得了活下去的动力!

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一打听胡耀邦

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我进到了小院,走进了一间房间,屋内书橱里放满了书,横着一个小写字桌、一把椅子。耀邦同志正聚精会神地看书。

我怕搅了他看书,轻声地说:“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我说:“我是一个学生,17岁参加了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也没工作了。我想和您谈谈心。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我从没见过耀邦,心里比较紧张。我也顺便提了一下我有个亲戚叫张黎群,他正在四川挨批判,我也没有经过他就找您来了。耀邦同志说:“他的事我知道,用不着说。你不用慌,坐下来一起谈谈你的事。”

耀邦同志拉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他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又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我怕打搅他看书,他说:“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谈,也知道点外面事;没人我就看书。”还打趣地说:“我现在不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耀邦同志与我的身份、地位相距甚远,但他这样平易地待我,一下子憋在内心要倾诉的话涌上心头。我说:“耀邦同志,我现在很痛苦,有时真不想活下去了,可又有几个年幼的女儿,心里很委屈,不知该向谁说。”随即简要谈了我的遭遇。耀邦同志耐心地听我说,也不打断我,不嫌烦。他听后沉默了良久,那清瘦的脸上,眼神炯炯闪着坚定智慧之光。他郑重严肃地说:“金锐同志,我与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没有工作的接触,具体事我不好表态。但我可以相信你,你1949年是个17岁青年,刚出来的学生,对党和毛主席哪会来那么大的仇恨?那剥削的面也太宽了。我相信你不会说瞎话。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

耀邦同志充满深情,加重语气地说:“就是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地活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有力地说:“一定要挺过来,顽强地活下去!”

他说:“我劝你要挺住,要顽强地活,是指你还得有遭最坏打击的准备。不管打击多重,也得挺住,也得顽强地坚持。”他又解释:“只有顶住,

顽强地活,也才有到最后弄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结果。”他说:“我不问你那些具体的事,只要你自己相信自己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自己一个学生没有剥削,那么这样定的‘敌人’,这样的‘专政’,到最后都得烟消云散。时间多么长,熬多久,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坚信。没有坚定与坚信,没有做最坏的准备,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耀邦同志还劝我:“一时别人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什么,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没做坏事,别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扰吗?”

他还痛心地说,不少同志,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运动中自杀死去了,这是难以挽回的沉痛损失。以后即使问题弄清了,也是难以弥补的。

断续的谈话近两个小时,他还问农村的情况:收成如何?农民生活如何?当我说了有好多孩子不上学,学校也不上课时,耀邦同志心情沉重地说:“那么多孩子不念书,不学习,不求知识,我们国家的人才哪里来?靠白纸一张连文化知识都没了,就算革命了吗?这样革命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耀邦同志劝我眼界放宽些,“想事想得宽些”。说到农村,接触农民,了解情况,他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让我去团中央上班工作了,干校也下放完了,给了我时间,我就读马列书,想天下事。”啊,这就是胡耀邦,他胸怀开阔,志气高远;他尽力关怀别人,从政治思想和方向上给以启发;他发愤读书,思考着天下大事,党和人民的大事。

临近中午,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吧。”我不愿意打搅,耀邦同志就招呼屋外李昭同志,让我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饭后,耀邦同志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中午我要休息一下,就不留你了。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随时开着,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不会把你看成敌人,我相信我的直觉。顺便问候黎群,说我关念他。”我紧握着他那有力温暖的手,这第一次就这么信任我,不把我当成

“反革命”对待,且他纯真的、质朴的、出自内心的关怀和热诚,使我流下了热泪。我说:“耀邦同志,我感激您,也感谢李昭同志,你们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说的,不管多大难处,也一定挺过来。如果我遇到挫折,实在想不通时就来找您。”耀邦同志爽朗地说:“我的门对你敞开着,李昭你说对吗?”李昭同志也热情点点头,就这样我带着耀邦同志真诚的劝告和鼓励,离开了他的家门。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我想起往事,想起那富强胡同后院的北屋,想起他并不把我当做专政对象,而且拉椅子、沏茶水、小桌上同吃便餐,这样来招待一个备受人间冷漠心已冰凉的小干部、打入另册的农民,我的内心无法平静。这种内心里的感激与思念,再无情的岁月也割不断。

三女儿病危需住院,耀邦夫妇慨然解囊相助,“救孩子命要紧”

村里农闲,我就在北京的家照看孩子和做些家务。农村工分有限,全家只靠爱人下放在大兴天堂河农场劳动的工资,生活艰难。

一次,六岁多的三女儿突然高烧,咳喘很重,服感冒药不见效。我背着她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诊断为急性肺炎,必须住院治疗,约需准备几百元。当时难坏了我。回来的路上,在瑟瑟的西北寒风中,犯愁地往前走着。东单三条离富强胡同不远,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看耀邦同志,当时我并非想向他求援,只是心里烦,想看老人家,回家去再想办法。天色渐晚,跨进了他的小院。耀邦同志招呼我,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了。我说:“有时踏实不下心来,学不下去。”耀邦同志说:“有什么事可以不踏实的呢?学习得下狠心,得抢时间。”我问候了几句,即告辞要走,耀邦同志让李昭同志招呼我吃晚饭,我推辞不吃,说家中有事。等他们听我说了三女儿急病住院,回去安排家里的两个孩子,晚上还要赶回医院去守护时,耀邦同志说:“这孩子住院,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干农活没工作,哪儿来那么多钱,我们支援一下。”我道了谢,说不必了,我自己去想办法。李昭同志很快就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你拿去,我们现在也不富裕,但一定支援一下。”我还想推辞,耀邦同

志说：“你赶快走，救孩子命要紧，急性肺炎有危险的。”我谢了耀邦夫妇，出来我打开信封见内装有四百元。当时的四百元可是个不小的数额，孩子几天住院的诊治费就够了。更可贵的是这份心意，这份情意。“救孩子命要紧”，这句话一直萦回在我耳旁。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的热泪滚滚。

到了春天，我带着这孩子去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她几岁了，识多少字，拿糖果给孩子吃。我让孩子叫“爷爷”、“奶奶”，我说“这是你们帮助治好病的孩子”。耀邦同志当即打断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可惜的是我当时也没个照相机将耀邦同志对孩子的抚爱拍张照片，留作永生的存念。到耀邦同志去世后，有一次春节除夕前，我带女儿去看李昭同志，让她在胡爷爷遗像前三鞠躬，和李奶奶合影照了一张，我又动情地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也许你会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昭同志又打断我说：“不要再说这些，只要孩子长大成人，有出息上进，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这就是真情真诚无私的耀邦和李昭同志。

耀邦同志说：“为你的事，我尽力说说话。”

“文革”后期，政策越来越清楚，我的问题明显是个错案，我多次去公安局申诉，请求复查，但始终拖着，不明确答复。

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讲了去申诉他们不理且态度冷漠，耀邦同志深表同情地说：“做组织工作对干部上访，一定要热情耐心，尽快去查给人以答复。对申诉干部，要体谅他们，给予温暖。这些好传统作风现在都弄乱了，好像态度越横越生硬越好，问题越拖着越好，这哪里是做干部工作，做组织工作，不是衙门作风又是什么！”他又对我说：可以去找管你的负责人直接谈。我说连自己常出常进几十年的公安局大门都不准进了，更别说见什么负责人了。耀邦同志动情地说：“你一个十几岁学生出来就工作，问题有什么复杂的，查一查，不是敌我问题，按干部政策解

决就完了嘛！”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诉说后，让我写一封申诉信交给他，他说：“我现在说话也不一定有用，你交给我，我转给北京市委试一试。”过了一段时间，耀邦同志对我说：“你的信我转给北京市委吴德，请按政策解决，市委办公厅来电话告称，你的事得等着刘传新研究答复，现在刘不表态，还得等着。”他又劝慰我，现在好多人的问题不是都拖着不解决吗？比你问题大的人也不少嘛！没解决，就是拖着不办。拖就拖吧，个人着急也没有用。他还说：“我现在只是人家找来诉诉苦我听，耐心劝劝，有的替他转转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你说话人家不听，着急也无法，无有回天之力。”他劝我这期间好好学习。在当时形势下，耀邦同志肯为我转申诉信，就是在替我讲话，我已感谢不尽了。我从耀邦同志的劝告，也不再去求人，不频繁上访，就暂时安心做家务，读书学习。

顶住“四人帮”压力，关心众多受迫害的同志

当时，耀邦同志身居斗室，一心读书，思考问题。来访的老少同志推门就进，他都热情接待，诚恳谈心；有的老人拄着拐杖被人扶着来找他，有的年轻子女哭诉父母及家庭的遭遇，他耐心听，诚恳劝告；有的写申诉请他转送，他带着花镜认真看，及时转。在那时，他说自己没有工作是个“闲人”，可他何时闲过？就在那年月，他温暖了多少同志的心，为多少受委屈的同志办了有益的事，有谁能说得清？仅就我联系与他见面的人就有好几位。有一位舒光升同志，当时曾遭受过批判、毒打、关押，后又下放。他是一位在公安工作上做得很出色的同志，对刘传新“彻底砸烂公检法”思想感情上不通。我约他见了耀邦同志，耀邦与他热情谈心，诚恳劝这位同志要看得远些，要有信心，现在好好学习，冷静思考。这位同志深受教益，下放在一个纺织机械厂后他深入车间，做出了成绩，不久“四人帮”倒台，他重返分局，以后又到市局领导岗位。谈起往事，他深深感激耀邦同志的帮助和教诲。

由于耀邦同志对众多同志的关心，“四人

帮”及其打手就放出风来,说耀邦同志家里是“黑据点”,是牛鬼蛇神聚会的“黑后台”,一时社会上沸沸扬扬,流传很广。我从老同志处听到风声,就去告诉耀邦同志,他听后一笑置之,说:“我现在无权,说话没人听,我算得上什么后台,也没资格做谁的后台。连你那不算问题的事,我转封信都解决不了,有一次我见了吴德也说过,不解决,有什么用?人家来找我反映一下情况也不允许吗?不要理社会上刮的风和怪论。”这就是耀邦同志敢说敢做的为人,自己做得正,就不怕说影子歪。他与同志谈心,都是从党的原则上启发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从不搞阴谋,不谋私利,他也就敢于顶着狂风逆流。

耀邦同志与我坐在小板凳上语重心长谈学习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形势趋于缓和。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可能对待他也宽松了些,中间院的北房已腾出,家中正忙着从后院往中院搬东西,打扫收拾北房。见搬过来很多的书,我跟着搬了一些,就与耀邦同志坐在廊檐下小板凳上休息。我说:“您的书这么多,且多是全卷的,整套的。”他说:“我的钱大部分用于买书了,没办法,看书是我一生惟一的爱好和愿望。现在闲下来,更是想抓空补补课多看看。”我问:“整卷的马列书、史记等您都看过了吗?”他说:“我过去断断续续地看过,现在有时间集中系统全面地看,再通读它一遍。你现在没有事,机会更多,就更应抓紧多看。”我说:“现在干完活儿,就记点流传的陈老总的诗词,整卷看书引不起我的兴趣,看书对我已无所谓,没有什么用了。”耀邦同志严肃地说:“为什么?怎么连对读书都无所谓了?”我解释道:“以后我的生活都不知如何过,有今天不知道明天,凑合着过,读书,不也无用吗?”耀邦同志加重口气说:“这种看法不对头啊,是近视、短见的看法。生活上越迷茫,方向、道路看不清,越要多看书,多思索。方向一时看不清,越要看书思辨,不能适得其反。方向错了,会栽大跟头。我理解你的苦恼和难处,但只能等待,只能耐心,形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永久不变,自己决不能糊涂着过,凑合着过。”我又请教他该如

何学习,他再三讲“要吃透精神”,“首先要钻进去认真反复学,要学习其精神,领会其精神。还要认真思考。结合实际,结合自己实践和生活,结合发生的一切,对照理解其精神,要提出问题,要问为什么,然后得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与非,对与错,真理与谬误,实情与谎言。”耀邦同志还针对已发生的林彪事件,和我情绪上的悲观,讲了他对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观与事物的辩证法的认识。他又讲了革命中的困难与挫折,经过努力又可转化为胜利前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有来向我诉说的同志,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和苦痛,但这点难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党的大批干部,连参加红军、走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敌人上面轰炸、不知明日死活时,都没有动摇过,没有丧失信心,眼前的苦头又算什么。”他坚定地说:“要相信党,要相信事物的转化,假的早晚会戳穿。林彪猖獗一时不可一世,不也被戳穿了吗?”耀邦动情地说:“我现在常劝找我谈心的同志,我最大的担心,深感最大的悲哀,是自己对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像你连学习都感到无所谓了,这样的混日子是糊涂的,不清醒的,一定要尽快改。”

这近一个多小时坐在小板凳上的谈心,对于我是一次真正幸运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这样机会了。我当时只是觉得耀邦同志讲得诚恳、深刻、透彻,促使我改变了消极混日子的情绪。直到“文革”结束后,耀邦同志出来主持党中央工作,特别是在拨乱反正艰难时刻,他以非凡的决心与勇气,果断与智谋,带头组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禁区,闯过一道道难关,这时我才深刻认识到他在小板凳上谈的那一番话,表明他早已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他在实践上的果断和魄力,正是源于他对真理的坚定追求和对事业的坚定信心。

平反后,送给耀邦同志一盒巧克力糖,永生难忘与耀邦共度除夕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炸响的春雷,为我们这些受迫害者带来了第二次解放。不久,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原来“阶级异己分子”定性的结论不能成立,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户口

从外地迁回,补发工资。我提出希望调外单位工作,得到允许。

我去公安局领了工资,当时百感交集,想起这十年种种磨难,想起了真诚帮助鼓励过我、平等对待我、告诉我要挺住坚持活下来的胡耀邦同志。我在东安市场买了一盒巧克力糖和一盒点心,骑车到富强胡同耀邦同志家中。时近中午,他已坐在外院东房要吃饭,我将一盒巧克力糖送给他。他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给我送吃的?”我说:“耀邦同志,我的事彻底解决了。您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送您一盒巧克力糖,这是我和孩子一点心意,不是给您送礼。”说完我就哭了。我哽咽着说:“您在我最困难时,感到绝望时,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是一盒糖能报答得了的吗?”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啊!这是好事,你的事解决了该好好工作了,为你,为孩子们高兴,这糖我吃了。”我打开盒,他吃了一块。李昭同志进来,听了也很高兴,我再三表达我和孩子的情意,李昭同志说:“我为你全家高兴,这礼破例收下,也算是祝贺。”老两口再三让我吃饭,我说要赶回家去,收拾一下,一两天回农村迁回户口,以后再来看你们,即告辞离开。临走前,耀邦同志又嘱咐:“把家安顿好,回来好好工作,你已不再年轻了,不能再耽误了。”他还说:“对过去整过你的同志,要会理解、宽容,不要记嫌记仇,要争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我告诉耀邦同志我会这样做的。

后来,耀邦同志出山主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工作,参与中央领导工作。我工作快一年了,正赶上农历除夕,我想去看望耀邦同志。好多老同志称赞他出来大刀阔斧工作的政绩,还传闻他要到中南海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我想他进了中南海,见他就难了,想趁现在再去看看他。我买了只热烤鸭,加快骑车赶到富强胡同。当

时,天色已黑,家家在忙年夜饭。我去了那里,正赶上耀邦和李昭同志在前院餐室。家人出去了。做饭的大嫂也不在,我把片好的烤鸭等现成食品放在桌上。耀邦同志就问:“为什么又带吃的?”我说:“想和您一起过个除夕夜。”耀邦同志仍不高兴地说:“过年可以,为什么还带吃的?”我说:“这不是打倒‘四人帮’后有意义的春节吗?以后想给您带,也不一定能见到您了。”我又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带鸭子,带四个螃蟹来请您,您也得与我一起吃了不是吗?”耀邦同志也笑了,说:“祝贺你的平反,回北京工作,我们聚会一下。”请李昭同志拿出瓶茅台酒,愉快地说:“现在刚好没什么事,我们一起喝一杯。”我举杯祝耀邦、李昭同志春节愉快,身体健康。边喝酒,边畅叙,他不问我的具体工作,也不谈他主持的工作,只是高兴地畅论天下大事。

他说道,现在要做的事太多,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心情舒畅地为党工作。还劝导我不要有任何埋怨情绪,全党和个人都要总结教训,往前看,好好工作,不能再耽误时间,也耽误不起。我说您在困难时那么系统地读书,也教育我去做,现在又工作了,证明读书不是无用,您有预见和远见。他说:“那时我不管他们怎样,无论多忙我必抽空读书,把马列的书系统读了一遍,这对分析思考问题,对研究国内外大事大有益。”



本文作者随李昭为胡耀邦扫墓

他又问我去农村没有,我说办迁回手续时,回村告别了乡亲,乡亲热情欢送我。我说农村太苦了,不停地斗争,生产没人抓,自留地不许种,就靠着几只鸡下蛋换点钱做零花,何时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呢?耀邦同志为之动情,他说:“我们党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现在的建设也可能先从农村抓起,让农民摆脱困苦,先富起来,也许是又一次从农村到城市。”他还谈了农村建设和发展,说:“不要忘记农村,中国幅员广阔之处在农村,中国的大舞台在农村。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但要经很长的时间,经过不断的摸索和调研论证,我只是即兴有感而言。”他还说:“好多干部,好多同志不必要光留恋城市,在农村,在城镇必是大有可为的。”我被他动情的畅叙所打动,为他描绘的农村大好发展前景所吸引。我想,他心里装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与未来,装着十亿人民,特别是众多的农民,就在他欢度除夕的时候,他心绪稍为悠闲的时刻,他心里所想,他的有感而言,又何尝离开过人民,他心里装的是曾深受苦难的人民。他,心中没有半点掺假的私心,这就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感受到的耀邦同志身上的可贵品质!

后来话题又回到我的平反上,耀邦突然把端起的酒杯放下,面色凝重地说:“你们单位平反落实政策是快的,从全国来看,该有多少万需要平反的同志啊!可是,这其中的阻力和难处有多大,谁人知晓啊?这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今夜的除夕,他们家能欢快起来吗?这个问题,不论难处有多大,靠党中央的支持,靠全党的努力,必须要下决心解决且必须尽快地解决,不解决,我的心也不安,酒也喝不下去啊!”

我们畅叙近两个小时,时间已经不早,我请耀邦同志休息,他说还要给几位老同志去打电话祝贺春节。我起身告辞,恋恋不舍地说:“听说您可能搬进中南海,以后要见您可就难了,机会也少了。”耀邦说:“以后也许见面少了,但不管搬到哪里,不管多忙,我还是我。如有事,可让李昭

同志告诉我。”“我还是我”,这不正是耀邦同志那种平易朴实的本色吗?

中南海,与总书记匆匆晤面

约有几年时间,没有见到耀邦同志。这时他身为党的总书记,日理万机,为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倾注了全部心血。

这期间,我曾调到煤炭部外事局从事联络接待工作。当时,第一个投资上亿元与中国合作搞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开发项目的美国石油富商哈默博士,两次会见邓小平同志,我有幸参加联络接待。邓小平让我联络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与哈默博士会见。我是陪同联络接待的处长,坐在远处,见胡耀邦同志谈笑风生。会见结束,安排一起照相合影。照完相,耀邦与友人握手告别后,他老远认出了我,挥手招呼我,我赶紧上前与他紧紧握手。他的音容笑貌依然,亲切之情依然,职位那么高,还是那么没有架子,反倒是我有些紧张。我说:“好长时间见不到您,您工作很忙吧?”我告诉他我在做煤炭外事联络工作后,在忙哈默博士的接待,还应邀去了一次美国。他听后笑了笑说:“好好学习,还出国见识一下,不然什么也看不到了吧。”还问孩子们现在都好吧?我说您一定要注意身体。他说我现在睁开眼睛就是文件,就是会议,一天到晚地工作,我的责任只能如此吧!几分钟的谈话,在陪同警卫的催促下,就此热情地握手告别。

这短短的中南海晤见,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竟是他最后的一次相见!我总期望着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万万没想到,我再见到耀邦同志竟是灵堂前的遗像,不是爽朗可亲的声音与笑容,而是灵堂前吊唁人群的失声痛哭。

从此以后,我只是在春节时去看望一下李昭同志。我每次去,她都像以前一样热情接待我,询问孩子现在如何。在客厅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仰望鲜花簇拥着的耀邦同志的遗像,觉得他仿佛也在凝视我,使我心灵震颤。他为了党,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我身受过他的恩泽,此时真是千言万语道不尽哀思。最大的慰藉在于我深信,耀邦同志是活在人民心里,直到永远。

(责任编辑 吴 思)

抢救纳西族文化遗产东巴经书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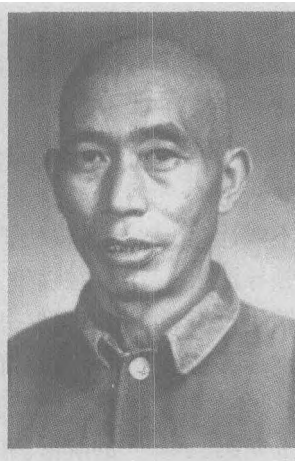
● 木丽春

东巴经书是纳西族东巴祭司以自制的土纸、竹笔、松明烟炷墨，用一种称“斯究鲁究”的象形文字书写的经卷，“斯究鲁究”意为木石上的痕迹。根据我多年的田野调查，各种内容不同的东巴经书大约有 1500 多卷本，有的研究者把它分为八大类，有的分为九大类，我认为分六大类较为合适：一、丧葬类，二、术库类，三、禳解类，四、求福求寿类，五、占卜类，六、舞蹈绘画类。

1958 年 5 月，我在云南省丽江县文化馆工作有一年半了，当时正值如火如荼的大跃进的年代，丽江县委向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下乡工作队，我也从县文化馆抽调出来了，分配到石鼓区红岩大队岩头村工作。

岩头村是坐落在红岩顶头的一个小山村，30 多户人家中，有 7 户是东巴祭司。我到岩头村的当天晚上，村干部召开春耕动员大会，按惯例，得抓一个活靶子，通过批判斗争使村民提高革命觉悟。活靶子抓了一个 60 多岁的东巴祭司。记得这个活靶子，是个瘦高个子，脖子上撑一个奇大的脑壳，满脸布着刀刻一般的皱纹，瘦长的脖子上挂着东巴法器摆铃、螺号、五佛冠，身上披着“神路图”，面前还堆放着一大堆被烟火薰黄了的东巴经书。年轻人捋着袖子，指责他暗地里搞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原来村里有一老人病了，这老人的家属就去请这个东巴占卜驱鬼。东巴祭司撕破不了乡邻的人情债，应了聘请，结果招来这场批判的厄难，从他家里抄出的这堆经书，也在这批斗会上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当我看到这个情况，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是 1956 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与牛相奎同志合作的《玉龙第三国》叙事长诗发表了。说起这长



木丽春

诗的创作，那是 1955 年春假时，我们怀着撒尼族有《阿诗玛》，纳西族也有《鲁般弄饶》的想法，来到我的故乡拉市乡美泉村，找到老东巴和光释读《鲁般弄饶》经典。我和牛相奎回到学校后，利用课余时间，根据《鲁般弄饶》和“游悲”等资料，创作了《玉龙第三国》长篇叙事诗。从历次接触东巴文化的亲身经历中，我逐渐认识到东巴经书的宝贵价值，它载录了纳西先民的原始文化，给人类留下了早期社会的宝贵遗迹。我看着这一大堆东巴经书被烧毁，

暗忖这是毁灭人类文明遗产的错误举动。可是在那极左思潮当头的关口，我又是一个下派的工作队员，怎能“不分敌我”呢？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了 1956 年 2 月间，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认识了中央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孙剑冰和刘超同志，当时他们想到丽江收集民间文学，我们随同他们深入丽江县的山区收集民间故事。当时我们接触了著名老东巴和芳先生，和芳是几代著名的东巴世家了，但是他的东巴经书和法器却没有。据说从他曾祖父传承下来的东巴经书，因家庭经济拮据，又得供他的儿子上学堂，在困难的情况下，一部分卖给了美国学者洛克，一部分卖给了北京学者傅懋绩先生。当时和芳还谈到贵峰村的著名东巴和文灿先生的几代人的家藏经书，也卖给了云南省图书馆的事情。孙剑冰和刘超如此关切地询问东巴经书的情况，是也想买一批经书带回北京去保存。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于是孙先生向和芳先生提出采用原始土纸书写经书，一个月抄写三卷本，每月付酬 32 元工本费用。和芳答应了孙先生的要求，三年的时间里，为中央民族文学研究所书写了近 300

册左右的东巴经书。我从这些国内外有识之士不辞万里辛苦购买复制东巴经书的行动中,看出了东巴经书的宝贵价值,而现在村里原件的东巴经书却让人一把火烧毁了,我作为一个纳西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能眼睁睁看着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被烧毁而无动于衷吗?!此时我心里感到肩膀上似放着一座山一样的沉重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产生了抢救东巴经书的念头。

1958年7月,县委把工作队收回县上,在工作队的生活暂告一个段落,我回到了县文化馆。馆里的赵继先同志跟我谈到鲁甸大队附近的新主(阿时主)大队,有一个叫和文质的大东巴家里,藏着一屋子东巴经书的事。此信息像一声震碎冰峡的春雷声,深深地拨动着我的心弦:得想法把这一屋子的藏书收集到县文化馆里保存,不能让它被烧毁了。我马上把这一想法向馆里的领导汇报了,领导怕被说成搞封建迷信复辟,借口馆里没有收集经费,把这事推脱了,我满腔的热情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

我考虑了很久。当时我还有一笔《玉龙第三国》的稿费存在银行里,我就取出这笔钱,向领导假说家里有事请假,而自己背地里却悄悄地上新主去收集东巴经书了。

我从丽江坐车到巨甸,第二天步行一天赶到了新主。我站在村口思谋了一下:和文质家是地主成分,他在土改时寻短见死了。若我直接投宿到他的家里,会落个敌我不分的罪名。我又想到和文质有个弟弟叫和正才,他年轻时曾同和文质一道学过东巴经,是新主仅次于和文质的东巴祭司,而和正才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这样,我就决定到和正才家里投宿了。我东问西问,直到黄昏填满新主峡谷的时候,才摸到了和正才的家门。

和正才在火塘边接待了我。他60多岁了,浑身透着一股不知疲倦的扑人气息。我说明来意后,和正才的一双饱经世事的眼睛,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厚道地说:“木先生,煨茶吧。”他的粗大的手递过一只土茶罐。

我边喝着茶,边把这次的来意又进一步说了一下,和正才沉吟了良久,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不如收走了的好,收走了才能躲逃过迟早被人焚毁的劫难。”他顿了一下,摇着花白的头发,很无奈地说:“流传了千年的经书,看来要破败在这

一代了。”后来他转过话头,说起了堂哥和文质的身世。

原来和文质和和正才都是1883年出生的,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分时,和文质被划为地主,阿五得是和文质的私生子,被区别对待,划为中农。和文质就在土改运动中寻短见死了。和文质死后,他的全部家产都划给了私生子阿五得。这样,这个经营了八九代的东巴世家的传世经书,才免遭没收毁坏,在中农阿五得家保存了下来。

我在草楼上睡醒的时候,天已大亮了,我起床下楼,走进母房,看见正才老爹坐在火塘边喝早茶,火塘的屋地上,有个小姑娘在一旁揉着面,她是正才的小女儿,名叫阿命。小姑娘长得非常秀气,有一双灵敏的会说话的眼睛,她以娴熟的速度,很快把粑粑煎熟了,粑粑煎得又软又香又酥,放在嘴里不用牙齿嚼就融化了。饭后我跟随和正才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木楞楼前面。跨进大门,是一座宽大的四合院,房屋都是古老的木楞楼,屋顶覆有泛着灰色的木板瓦,是一座典型的大山主住的院落。和正才在门口咳嗽了一声,一个身着毛布衣衫的青年汉子,从母房里走了出来,和正才跟这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耳语了一阵,他仄过头来,朝着我的身上打量了几眼,然后抓抹了几下脑壳,又转身走进屋里,从屋里取出一只锈蚀斑驳的铁钥匙,在他的手上掂了一下,略微迟疑了一阵,又朝着我这个陌生人审慎地看了几眼,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左侧厢房的一间小屋门口,开了锁。我们跟了进去,啊呀!偌大一间内室,四壁的木楞墙上搭架着一层层的手工很粗糙的书架,架上层叠层地擦满用夹板夹着的经书,书架上堆满了很厚的灰尘。我简直被这么多的藏书惊呆了。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火塘边,创造了象形文字的文明,用它载录了纳西先民的智慧、人类童年文化的足迹,它是一个民族的心血结晶。“哎哟,伟大,太伟大了!”我激动得转过身子,一把紧紧抓住和正才老爹的手说:“老爹,这屋子里的经书,该有多少卷本啊?”

“我也摸不清这有多少卷本了,我只知道这是我的祖上……”他神情哀伤地掐着指头,嗓音低沉地说:“这些经书是从我祖父的祖父手里传延到和文质这一代手里的,少说也有八九代人的辛苦经营了,估摸也有八九驮的东巴经书了。”

此时，我又激动地转过身，发现阿五得神情哀然地呆站在门口，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这个著名的东巴世家啊，此回我收走了它全部的经书，不是说明一个闻名九山十八寨的东巴世家没落消亡了吗？我对承传不了世家智慧的末代东巴阿五得，该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我走过去，双手紧握阿五得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阿五得缩回了粗大的手掌，抹了一下眼眶，颤着声说：“木同志，我的祖先的心血交给您了，不要叫它丢失了……”

第二天，天麻麻亮的时辰，我就悄悄地跑到供销社，买了八对包装药材用的竹篮，喊了和正才大爹，去到和文质家里，很快地把东巴经书分装成驮。在我整理屋子里经书时，从书堆中发现了一本李霖灿先生编写的石印的《么些象形文字谱》，我粗略地翻了一下，心中不禁又生出感慨。原来，李霖灿先生在丽江逗留的四年中，曾在这个东巴文化之乡住了八个月的时间，那时他住在和文质的家里，请和文质作他的释读东巴经典的老师，所以李先生与和文质有深厚交情。后来，李霖灿编著了《么些象形文字谱》，就寄来一本向和文质征求意见，现在手中的这本象形文字谱就是李霖灿先生寄来征求意见的了。我如获至宝，赶忙一起收罗起来（后来此书一直留在我身边，随时翻读，在我受到政治冲击的时候，才被人抄走了）。这时我想，我是做着与李先生一样有价值有意义的光明正大的事情，这不是对不起祖宗的事情，我是问心无愧的……想到这里，我对我的行动更有信心了。

次日，当我们把驮子抬上马背，跨出和文质家大门的时候，那高大魁梧的汉子阿五得慌慌地追出大门，拉着我的手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地哭泣起来，我一下子愣住了。只见他咬断了哭声，哽咽着说：“木同志，这是我们东巴世家的福泽宝贝，都交给你了！我也没有收一文钱，若是为钱我就不会给你带走了。”



阿五得

他狠狠地抹了一下眼眶里的泪水，又说：“我父亲和文质在世的时候，李霖灿先生以高价向他购买这份祖传的经书，我父亲不同意。看在与李先生的情谊上，我父亲喊拢他的一大班师兄和徒弟，日赶夜赶照原样复抄了一套东巴经书送给李先生，而祖传的宝物没有失去一根毫毛。现在，我把经典托付给你了，请你好好地保管，我死后，回归祖源故地的时候，见到先祖们也好有个明白的交待……”

他的言语再次使我的灵魂受到震撼：一个东巴祭司的子孙，他考虑的不是一户

一人的得失，他想的是祖先留传下的文化宝物是否能躲避毁灭，他的行为是否对得起祖源故地的祖先？我本来有些口吃，此时激动得更加口吃了：“我——一定好——好——好好保存。”这时我想到驮马已经走远了，生怕路上又遇到什么不测，赶紧告别阿五得，转身走了。当我走到拐弯岔口回头看的时候，只见阿五得仍像一截木头一样呆立在原地，高举着一只沉重的大手，向我粗笨地招着。我双眼满含泪水，脱下帽子，激动地边走边向他摇晃，表示同是一个纳西儿子的道别和问候。

经过数日奔忙，我终于把八驮经书运回了县文化馆。

我怀着满腔热情向馆里汇报，满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可哪里想到我的辛苦和付出换来的不但不是赞许和肯定，反而是冷酷的斥责和吓人的政治帽子，说我是为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张目。他们不但不给我报销驮运东巴经书的驮运费，反而勒令我检查交待自己的罪恶用心，几天的时间里对我批判斗争，把我的“罪行”上纲上线说成是复辟封建迷信的反革命勾当，最后把我划为内定的反动分子。记得那天，是当时的馆长周霖先生（纳西族画家）找我谈话的，他把处分通知递给我，摇着满头的白发，叹了一口气说：“小木，木丽春，别乱想了，人间不会没有走的道路。”我呆呆

地看着这一纸通知,冒出了一身冷汗,感到从未有过的浑身散了骨架似的乏力。

我被划成了内定反动分子,开除回家,监督生产劳动。面对这残酷无情的打击,这置我于死地的“通知”,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毫无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解放时我才是十来岁的孩童,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一夜间竟变成了反革命,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回拉市老家吗?家里是富农成分,我的爹妈吃这富农成分的苦还吃不够吗?他们把自己纯嫩如笋的儿子送出门,也就是希望儿子有一个好的前程,如今开除回家,还戴着一顶比富农成分还严重的反动分子的帽子,他们能受得住吗?我能在爹妈心口的伤疤上再撒上辣子盐巴吗?!

我朝着拉市老家的方向呆望,拉市大山的背后,就是通往石鼓的山路……石鼓!绝望中的我顿时想起,那坐落在长江第一湾的石鼓,1957年我在那儿参加扫盲时不是结识过一个姑娘吗?我到过她家,她上无兄长,下无弟弟,就两姐妹,我们之间也曾有过一种朦胧的感情,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我何不干脆就奔她家上门去呢?我心头豁亮了,咬咬牙,就决定上石鼓。

可问题是,在当时没有户口关系是寸步难行的。按规定,我被开除回家,我的户口只能转回拉市老家,我得随着户口走,这不是上石鼓的希望要破灭了么?!在急迫中猛然想起了一个人,我赶忙奔派出所而去。到了大研镇派出所,把头探进办户口手续的那个窗口,工作人员认出了我,客气地招呼:“啊,小木,你来办什么事情?”我立即按路上想好的一套谎言哄他说:“老和同志,上面批准了我自愿下放到石鼓落户锻炼改造的要求,我是来办理户口转移手续的,请你给我办一下吧!”老和冲我笑了笑,说了两句鼓励的话,很快就给我办完了手续。我心里这个高兴啊!我这下尝到了什么是绝路逢生的滋味了。

进了石鼓镇保夫落村我心中向往的那位姑娘的家门,我直言了来意。听了她简要的陈说,善良的姑娘和她心地宽厚的父母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无奈,但他们没有把我赶出家门,他们最终接纳了我,接纳了这个厄难中无家可归、有家难归的小伙子。我真不敢想像,如果这次求助失败,我还能走到哪里去?我的生命承受力还能坚持多久?所

以,我对这位姑娘——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所给予我的恩情,是终生地刻骨铭心!

我被内定为“反动分子”的通知发到我老家所在地的乡政府,又从乡政府打回县文教局,文教局探知我到了石鼓上了门,便又很快地把通知转到了石鼓。石鼓方面得知我是一个应当进行监督生产劳动的“反动分子”,村里领导就通知我到“四类分子”(地、富、反、坏)集训的“学好队”里接受改造,村上的亲戚劝说我的妻子莫找反革命男人,动员她跟我离婚,我的妻子不肯。他们就把我的妻子推荐出去参加了教师工作,而把我支派到丽华公路的工地去挖公路。我在石鼓好景不长,妻子走了,我也无奈地卷着行李向丽华公路的工地走去。

人在劫难中,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我走在路上,止不住地挂念起我的妈妈,在上公路工地之前一定要去看望一下我的劳苦一生的妈妈。

天黑了,我轻轻地挪开门栓,进到院坝里,见厨房亮着,我对着厨房喊了一声“妈”,没有回应,我又连续喊了几声,房里不但没有回声,反而发出一种压抑的凄惨的抽泣声,我走进厨房,见妈拢着弟和妹蜷缩在灶门前,我又说了一句“妈,我回来了。”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撇下弟妹,冲上来一把抱住我,左摸摸右捏捏,知我是个活人时突然“哇”地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过了一会儿,妈抽噎着说:“儿啊,只听说你是遭开除了,你骑青马(指江水)走了……”原来,村里谣传说我被开除后跳金沙江死了,刚才我进屋喊妈时,妈妈以为是她的阴魂回家了,所以吓得他们又恐惧又伤心。

到了丽华公路工地,我找见了我的父亲,父亲见到了我,噙着满眶的热泪说:“村里传来消息,说你丢失了,还说你跳金沙江了……”父亲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儿,越是碰到厄难越要往前看,前面有长着绿树的路,不要老是看自己的影子……”

人生就是祸福难测,祸福相依。正当我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是1959年3月间,当时省委宣传部长袁勃同志带着高登智、梁凡生二同志来丽江考察工作。他们到来后,因我和牛相奎是20岁发表《玉龙第三国》的青年作者,他们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了解到两位

作者中,一个在街道修缮队里卖工度日,一个被开除公职,在铜厂劳动改造。他们到丽江县委了解调查,问我是为何开除,当事人回答说我是富农,当时高登智问是不是富农分子,他们说是富农子女,说我的思想反动,为封建迷信复辟鸣锣开道。后经省、地委宣传部门反复调查,认为我抢救东巴经没有错,更不能说是思想反动,责令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元瑞同志落实我的政策。但是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当时在县委宣传部搞肃反工作的人,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故意刁难我。张元瑞同志气愤地说,既然你们县里不收回他,那地区就要他!这样张元瑞同志就把牛相奎和我的工作落实到地区歌舞团了。

我到地委宣传部报到,一个姓杨的干事接待了我,叫我先暂去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协助工作。我到了那里,省调查队有一个东巴经典翻译小组,他们叫我到这个组工作。我在东巴经翻译组里,又是料想不到的遇见了和正才老东巴祭司!他一见我就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噙满了热泪,哽咽着说:“木同志,你为抢救我们纳西族的东巴经罹难了,受苦了……”

原来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来到丽江后,成立了一个东巴经翻译小组,询问文化馆里有没有东巴经的藏书,这一问,就有人从文化馆的保管室里,从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翻出了我驮运回来的八驮经书。从这时起,八驮经书获得了新的生命,它的价值又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省调查队沿着八驮经书的来历线索找到了新主中村和正才的家里,这样才把博学的老东巴和正才请到了调查队,作为释读东巴经典的教师。和正才把这些情况慢慢地向我说着,说着,不知怎的,这个年逾70的老人,突然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他哽咽着说:“木同志,你走后,我也为这八驮经书的事吃尽了苦头,连我的小女阿命……也被逼死了……”

原来,我从新主中村和文质的家里收走了他家的八驮经书以后,村里那伙极左的人,诬说和正才串通我,把和文质的东巴经书拿出去高价出售了,诬说他收了不义之财,为这封建迷信的毒品泛滥成灾鸣锣开道……给和正才加了这些罪名后,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正才老实交待了八驮经书的实情,他们仍不相信他的交待,最后还

把他的小女儿阿命也抓去进行轮番逼供。一个十七八岁的山村小姑娘,她的脸皮薄如嫩芽,怎受得了这般残酷的黑霜蹂躏?她经受不了别人的无中生有的侮辱,负气地拿了一根麻索,在一棵比她年龄还小的树上寻短见了。我心里自责道:阿命,如果不为经书的事,你何至于冤死?阿命,我对不住你了,为抢救东巴经书把你也株连死了,你死得好可怜,好可惜呀……从那时起,我总觉我的心像缺了一角似的,心在滴血珠,隐隐作痛。

我参加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的工作以后,在鲁甸大队下乡期间,又零散地收集到300多卷东巴经书,还有两匹神路图。那次工作告一个段落,在1963年,中共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同志拨款一万元,叫我们县文化馆组织力量翻译东巴经典。工作开展以后,馆领导说我年轻力壮,分工我到乡下请东巴祭司,同时收集东巴经书。那次我跑了大东、南溪、天红、龙山、鸣音、塔城等地,一边寻访博学的东巴祭司,一边设法搜集经书。但我所到之处,民间收藏经书,经过几次“运动”的洗劫,所剩无几了,先后仅只收集到500余册。

在丽江市图书馆里收藏的3500多卷东巴经书中,有1700多卷是1958年从和文质家驮运来的那批经书。这批经书,科目系类齐全,经卷足数,是丽江所藏经书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套了。

新时期以来,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得到重视,特别是对纳西族的东巴经文化遗产,在国际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980年,丽江地区召开东巴会议的时候,和文质的儿子阿五得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里留住了几天,他在研究室里看到研究人员释读所用的经典,都是他家的东巴经书。一天,我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东巴世家和文质的儿子阿五得,提着两瓶清酒,找到我的住处来了。他一看见我,一把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红着眼睛激动地说:“木同志,我又看到我家的经书了!全都在着哩!我死了也好跟我的东巴祖先交待清楚了。过去我还怀疑过木同志,真是不该有的误解疙瘩啊!”

阿五得心情平静了些后,不无感慨地说:“遮山的云雾被风吹走,大山在着哩,常绿的树木也在长着哩……”

(仲禄整理)

(责任编辑 吴 思)

陈独秀最后的生活和政见

● 丁 弘

鹤山坪在四川江津县乡间的群山环抱之中，远望山峰如仙鹤挺立，林木葱葱，人迹罕至。1939年5月底，陈独秀在战乱中流亡至此，这是他生命的终点。

当时，陈在病中，他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有血压高，“日来头晕耳轰”。来此没有平坦的路，他是坐唯一的交通工具“滑竿”来的，说这儿是一个“极静、凉、可靠”的地方。

陈寄居杨氏山庄的石墙院，这是一个有20多间房的大宅子，是前清一个进士所置房产，此人和三个儿子都已过世，有一孙辈杨学渊在外地工作。他听说陈到达鹤山坪，立即致书家人：“腾出最好的房子，妥为招待。”杨所以如此热情，可能是受到过一些“五四”运动的熏陶，别的找不到理由。陈是一年前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共党要犯”呀！

陈和妻子潘兰珍借住一间上房，两间厢房。房内陈设原极简单，堆满书籍和箱笼旧物。最醒目是墙上有岳飞的“还我河山”草书拓片。这个院子闭塞极了，门前的路也是陡峭坎坷的。

陈独秀过去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什么地方，家里都是群英荟萃，就是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也是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现在他感到来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一天，地方忽接到通知，要求各家打扫卫生，特别是清理场上（集市），是新上任的县太爷罗宗文要来此山村。他是一个年轻人，原来是专程拜会陈独秀的。他对陈的礼貌恭敬态度，惊动了这个山村。

生活极清苦，物价又飞涨。陈独秀为了糊口，把朋友送给他的灰鼠袍子也“当”了。他晚年的诗句有：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可见他的处境和心情了。

尽管如此，他不吃“嗟来之食”，对此认真之极。一个被捕之后，背叛共产党的任卓宣（叶青），给陈寄了200元，他立即退回。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朱家骅，他的学生，赠5000元，他立即拒绝。朱又托张国焘转赠，他再次退回，并写信斥责：“请你以后不要多事！”张感慨地说：“仲甫总是如此！”

一些北大的毕业生，陈独秀的学生，成了国民党政要的，如罗家伦、傅斯年等等，到四川重庆来时，都专程来此山村看望老师。看到他如此贫困，不免资助。陈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一些人说：“恩师之情，铭刻在心，不能忘也！”他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他对人说：“收了，王明、康生对我的攻击更有理由了。”

蒋介石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叫国库局拨一笔钱给他。国库局派大员亲去处理，江津县银行办事处主任也陪同登门，希望落实此事。陈更是坚决拒绝，“原封退回！”

此真所谓“贫士无财有傲骨，愈穷傲骨愈突兀！”在贫病交加之中，他还有一种“使命感”。1939年5月致友人信中说：“血压高，两耳几于半聋。长久如此，百事俱废矣！心所欲著之书未成，诚堪浩叹！”

这时他要写的书是《小学识字教本》。他认为，“学童识字是盲记如符咒，严重戕残孩子，急待改良。”这是语言学的大工程。上卷书成，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陈独秀函，称“大著斟酌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意多精辟，自宜付梓，

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如何？”陈坚持己见，认为名实相符，是不可改动的。

为出版事，陈独秀和编译局书信往来达70多次，终未能印刷。最后在1942年油印50份，梁实秋得到一份。到1971年，梁实秋在台湾影印出版。他说：“实在写得好！观点源于唯物论，精详、通达、是生平杰作，最能展示他的旧学根底……在我有生之年，总算了一桩心事。”

在这最后的日子，他只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加上当时写给朋友的信，1949年6月，香港出版《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胡适作序）。他虽身居偏僻山野，以其睿智、敏感和博学的基础，仍把握着时势的脉搏，对焦点的问题有更上一层楼的见解。

他说自己“深思熟虑六七年”，始有今天的见解，他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而说“民主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的政权或无产阶级政权，必然流为史大林个人的格柏乌（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还是在1935年，他被押于南京监狱中时，他就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斯大林政权只是有名义上的存在。”托洛茨基被杀之前，仍认为苏联“本质上仍是工人的国家”，只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陈独秀是走得更远了。

他在鹤山坪得知，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波兰，依照秘密协定和德国瓜分波兰时，怒火中烧，愤怒疾书长诗一首，中有“……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



陈独秀

烹。黄金握在手，利箭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他激愤的情绪是无以复加的了。

1942年5月，陈病重了，17日至25日，三度昏厥，并非猝然而逝，当时没有良好的抢救条件。27日晚，9时40分逝世。慷慨解囊办理后事的竟是相识不久的江津人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两人，墓地也是在邓家的鼎山山麓的康庄，背靠郁郁葱葱的山林，面对日夜奔腾的长江。

葬礼之事安排好之后，忽然县里派专人送来8000大洋，说是蒋介石先生资助料理后事的。这给治丧者一个棘手的难题，经反复研

究，当时还是未敢退回。此事发人深思，他是刚刚放出来的阶下囚，何需如此！想来，陈面对蒋介石始终是一个强者，道义上更居于绝对优势。在法庭上，他力陈建党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正义性，毫无惧色！蒋介石在其死后，以巨款资助，虽是政治姿态，是否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崇敬之意呢。难道他不是还想在陈独秀身上沾一点光吗？

陈独秀死非其时，身后寂寞。如果早死一二十年，将会如何轰动！“中央社”只说三句话，连他和“五四”的关系也没提。《申报》提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著名学者，文学革命的先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对陈的去世未做报道。

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即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的时候。”

要到什么时候，可以宣传陈独秀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坊间和报刊上果然渐渐多了陈独秀的消息。在21世纪，当中华民族可以客观地梳理20世纪的历史时，他当会更加凸现出来。

（责任编辑 吴思）

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

● 黎 白

堪称当代第一人

重走当年红军跋涉万水千山的长征路,难!

走遍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及红军西路军走过的所有长征路就更难。

以古稀之年走长达 70000 多里所有长征路,可谓难上加难。而年已古稀的老红军陈靖却历时近两年,完成了这一难上加难的壮举。陈靖重走长征路与所到之处的党政部门领导座谈,访问民情,讨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脱贫致富的现实问题,还沿途为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学生作报告,敬谒先烈陵墓,访问流散红军,落实优抚政策,并通过组织,为左倾路线时期被诬害的烈士平反,等等。这一切说明,陈靖重走长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忆旧,是一个老红军怀着对国家对党强烈的责任心,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体现当年的长征精神,传播当年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这种毅力,这种胸怀和耄耋之年完成的这一代人难以想像的壮举恐是当代第一人了。

简况统计惊人也感人

这里有一个陈靖重走长征路的简况统计表,很惊人,也很感人。

一、行期、行程和途经省区

行期:1986年9月4日——1988年6月4日,跨三个年头,历21个月,行期640天。

行程:36261公里。

途径:江西、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新疆、青海、宁夏等15个省、区406个县、市、乡。

二、通过雪山、草地、河流、山川等记要:

翻越八座雪山,海拔4000公尺以上,15座次。

计有扎浪雪山,4600公尺;折多雪山,4296公尺;高尔士雪山,4312公尺;剪子湾山,4296公尺;卡子拉山,4486公尺;理塘东山,4100公尺;海子雪山,4876公尺;阿坝雷达站,4176公尺。

穿越草地计有红原草地320公里;阿坝草地410公里;毛尔盖草地210公里;若尔盖草地250公里。

途经山川、河流

经过海拔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40座;河流1096条次,其中流程300公里以上的名江大河41条。穿越戈壁1166公里。

三、座谈、报告,传递信息

与当地党政部门领导座谈273次,计2884人次。共同讨论长征的历史问题和脱贫致富的现实问题;

为老区传递矿产资源、种植养殖、干果加工、畜牧、劳务输出、运输等方面经济信息914条次。

沿途为各地大中专学校、部队、工厂、机关作报告97场,听众达48500人次。

敬谒与祭扫

敬谒革命先驱、先烈和战友邓恩铭、向警予、周逸群、林伯渠、董必武、王维舟、甘祖昌等的故乡、故里、故居等290处。

祭扫红军烈士王尔琢、段德昌、贺英、贺满姑、王炳南等坟墓约3850多座。

四、访问与平反

在地方组织的支持下,为历史上被诬害的同志平反与正名

冉少波,1934年任红三军黔东南苏区独立师师长,长征前夕被左倾路线的领导所错杀。冉少波同志之子所写的999封上诉书信,多年来未获落实。1959年到1962年,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在调阅档案、资料,并经慎重讨论,曾有明确认定冉少波同志确系被诬杀应予改正的结论,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并未落实。此次陈靖协同铜川地委、印江县委经过一周的调阅档案,认真研究、核

实,终于在三方面(上级地委、重证小组和冉少波家属)参加的会议上,为冉少波同志正式平反。此冤案经过40余年,终于昭雪。

席大民,1936年红军第二、第六军团长征中在贵州建立苏区,组成中华苏维埃川滇黔革命委员会,委任席大民同志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副司令。红军长征离开此地区后,席大民率领坚持斗争的红军武装与强敌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因叛徒告密不幸被俘,在国民党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而遭杀害,但被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乱写报告材料和文章,并载入军事博物馆和中华书局的档案和史册,而成为反革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改正”,但未予公布。此次,经陈靖与毕节地区党史部门一起进一步上询下调,弄清真相,撰文公诸于世。

麻孜阿布(汉名马俊),藏族独立第二师师长。长征前遭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执行中央左倾肃反路线予以诬杀。多年来,原红军及地方的知情同志皆表示应予以平反,但一直未获批准。陈靖到现地区作了专门调查,撰文呼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才获得平反。

安登榜,羌族,曾任红军“松潘番民游击大队”大队长。在红军过草地前,为红军筹粮,遭坏人杀害,却长期被错认是反革命分子。陈靖协同地方政府弄清了事实真相,撰文发表,为烈士安登榜同志正名。

一位古稀之年的老红军重走长征路,即使是单纯怀念往昔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而陈靖重走长征路,却为国、为党为民,为受诬害沉沦几十年的烈士做出了如此大量而艰辛的工作,在重走之前陈靖就作了各方面的资料、科普和市场信息等等准备,因地实施,卓有成效,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重走长征路的意义。应该受到尊敬,名标青史的。

沿途写下的诗歌和文学作品充满激情又独具特色

陈靖同志在红军时期及以后历次革命战争时期大都是做政治领导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是与陈毅元帅同时于195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红军作家。因此,几万里



陈靖重走长征路途中

的重走长征路途中,他带着浓烈的感情和革命情操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诗歌、通讯报告,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90多篇文章,在《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74篇,反映强烈。他是诗人,沿途每到一个县,都写几首短诗,全部是满怀激情即兴地写在当地特有的树叶上,共有400余首,并且出版成集,可谓真正的草叶集。据我所知,至少先后出版了诗集(配照片)、文集《重走长征路》、诗文集《诗言史》、《长征路上》等四本,近百万字。

重走长征路,陈靖受到很多真诚而热情的款待。但也遇到过令他愤慨的不如意的的事情。他曾亲自和我谈过一件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陈靖的品格和个性。

重走途中,路过当年苏区一个重要县,县领导对耄耋之年老红军重走长征路由衷地敬佩,进行了热情的接待。摆上一桌山珍佳肴是习俗和一种很难讲明白对与错的传统。贫困的老区县份也很难例外。有宴席自当有酒,于是席上摆了著名的茅台酒。没有料到的是,陈靖对人对事,是讲原则不管情面的。当县领导拿起茅台向陈靖敬酒时,陈靖按捺不住了,拿起那瓶茅台酒,一下摔到地上,酒瓶粉碎,满屋酒香。赴宴的县领导大惊失措。陈靖气愤地说:“你们和我出去看看!”他率先走出宾馆,来到离县城十几里路的山脚下,指着一些岩石山洞,说:“进来,你们看看吧!”

山洞里住着老百姓,没有桌椅家具,没有存粮,一张破床铺着稻草,一床被子千疮百孔,食具是破旧的陶器,

几乎是原始人——陕西半坡村出土的几千年前居民生活的模样。石洞里的一家老小全都衣不蔽体,严冬季节,洞里烧着一棵树根,烟气熏人,使人难以睁眼,难以呼吸,一家老小惊慌地挤在洞中一角,看着进来的这么多位“青天大老爷”,不敢出声。

陈靖十分激动地说:“看看,离你们衙门不远的地方,群众过的是什么生活?这里是1927年就创建起来的老苏区革命根据地,几十年过去了,群众的生活比过去还不如,你们当县领导的就这么问心无愧?就有钱摆席喝茅台酒?你们是共产党员吗?”

重走长征路的真实记录

陈靖所谈的这桩真实的故事到此为止,他谈时仍面红耳赤很为愤慨,“故事”却没有结尾。

陈靖重走长征路当然不可能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的步行,一样的吃糠、吃野菜,甚至吃皮带。他的行动得到了徐向前元帅的支持。给他写了“重走长征路”、“温故而知新,老马当识途”,“实事求是写史,任重道远而前”的题词,并且亲自在家中接见了陈靖,给予亲切的支持。也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批准和支持。更得到了他的老战友,有关地区的军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沿途省市县领导的热情支持。他是配备了汽车并携妻子和在部队工作的子女和三四位同行的工作人员一起踏上征途的。做了充分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有周密计划。

但是,尽管重走长征路非比当年红军的长征,而实际上艰险仍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陈靖本人在他的著作中所讲的一些情况,应是真实的记录:

……这72000里的道路,绝大部分都是十分偏僻而闭塞的地方。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老、少、边、山、穷占全了。这些地区的关键部分,是“世界屋脊”东部,充满离奇的色彩,到处是怪石嶙峋,洪荒神秘,雪山草地,戈壁荒滩,同内地“人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这里人迹罕见,鸟雀难飞,气候变化莫测,道路在险恶的岭壑间缠来绕去。历史上传留下来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在这里却成通达而繁华的坦途了。是的,不少地方已有了地区级、县级公路。但路况很不好,弯急坡陡,曲如盘肠,车子常常在悬崖陡壁间爬行。头上是严酷冷面的雪山,脚下是奔腾咆哮的激流。青年人开玩笑地说:要是从这里掉下去,就像一粒砂子落进大瓮里,什么反响也没有。这一

点不夸大。一次,车子爬上海拔4200米的巴塘东山(海子山),突然陷入雪沼里达一个多小时。高山缺氧,每个人的脸上成了猪肝色,终于等到一辆去西藏的车,才帮助我们安全离开这座雪山。又一次,在离草原两三百里的甘孚路上,车子在一段不过百米的沼泽滞入污泥之中。折腾了三个小时才“拔”出来。在秦岭南麓的一次北行中,突然被塌方拦住了去路,我们只好把行李背过去。在大巴山南访问老后,需要抢时间过一条河。我们安全到达旺苍城后,县政府的同志说,他们刚接到电话,我们刚过不久,一辆卡车就被泥石流打翻了。640天,我们走了406个地、市、县、乡,每地平均不到两天。不少老同志关心地问我,这样的长途生活,别说风险,如何“适应水土”这一点,对于一个70岁的人来说,就很难设想。事后,我自己也这样想过。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两句话:“长征精神水土服,一路人家是我家”。这“一路人家”就是沿途的党、政、军、民。

由江西进入湖南,总想抓紧时间锻炼适应山区的能力。不料,在武陵县却摔伤了左脚。经土医折腾了几个小时,入夜发高烧,到大庸县医院检查,结果是粉碎性骨折。院方主张送我去长沙或常德治疗。但“重征”不能顺延,否则就要推迟一年。县委采纳了我的意见,只好连夜打石膏,找街道木工赶制双拐。不到48小时,继续上路。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当进入湖北恩施地区时,病情有反复,急需换石膏,可是当地无此材料。为此,恩施专区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派专人到来凤、宣恩和鹤峰三县寻找。虽然寻遍了整个地区都没有此物,但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胜过任何灵丹妙药。后来的路上,经湘西再入黔东南,改制双拐,再换夹板,涂药消肿等等,伤病渐渐好转了。150天所遇到的那种“扶伤”精神,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感人肺腑。这种意外如果不是发生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路上,说不定会中途而废。

……重征路上,还有几位相继同我并肩而行的同志……大家为了协助我工作,600多天只休过一个星期天。每到一地,收集材料,日夜走访,现地勘察,进行多方面座谈调查,反复研究,整理成文。与此同时,还拍摄1000多张照片,几十个小时的录像等等。在生活上,大家付出很大的劳动,非常辛苦。我们不仅带了不少资料和器物,每个人还必须带着四季衣服和用品,大小包共38个,重达两三百公斤。每到一地搬上搬下,还要防止失落和损坏等等,每个人都非常艰辛……

陈靖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是他重走长征路的最恰当的写照。
(责任编辑 致 中)

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

● 傅国涌

在中国大陆,对王云五这个名字人们陌生已久。然而,半个多世纪前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凡是读过书的人又有谁未曾读过“王云五主编”的书籍呢?仅仅是他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就有4000余册,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学科知识领域;《王云五大字典》曾经是学生和家庭的必备工具书;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工具书编排、索引编制、档案管理、图书馆卡片排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他只受过不足5年的学校教育,完全依靠自学成才,却做过胡适的英文老师。他没有任何学历,1955年到1969年的15年间却在台湾政治大学指导了23篇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培养了金耀基等杰出英才(大陆自己培养第一批博士是在80年代初)。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91年人生中,20世纪20到40年代主持商务印书馆的25年,无疑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创造了出版史上让后人难以企及的一个个高峰,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正如金耀基说的,“先生出身平凡的学徒,自强不息,以牛马骆驼之精神,苦斗不懈,终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学术文化政治教育上独特之贡献皆已化为时代共有的资产。惟千百年后,先生仍将被记得他是《万有文库》的主编者;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之先驱;云五图书馆之缔造人;商务印书馆的伟大斗士与化身。王云五三个字已成为一空无依傍的人,凭一己之努力攀登社会巅峰的象征。”



出任国民政府副院长时期的王云五

村人,出生于上海租界,正名之瑞,小名日祥,14岁取别字“云五”,“日下现五色祥云”之意。17岁开始发表译作,笔名“出岫”,意为“云无心而出岫”,并由此化出常用的别号“岫庐”。

他3岁回故乡度过了童年时代,6岁开始随大哥日华读《三字经》、《千字文》。他个头矮小,脑袋奇大,体质很弱,性格羞怯,加上母亲对他管教甚严,平日很少走出家门。7岁时父亲让他大哥带他去上海,随后他大哥回乡应试,并顺利地通过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患足疾逝于乡下。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由于这一缘故,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之路,送他进私塾,本意只是多识几个字,为日后经商准备条件。14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英文,开始他的半工半读生涯。因为他上班看书,被老板炒了鱿鱼。1904年,16岁的王

王云五(1888—1979),广东省香山县泮沙

云五进一家同文馆修业,并在一家英文夜校当助教,自谋生计。在同文馆一年,他博览英文原著,建立起“天下没有读不通的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自信心。不久,他又成了益智书室唯一的教师,组织振群学社,自任社长。他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只断断续续上过几年学,全凭自学,即使在辍学经商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学习英语。他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35卷《大英百科全书》,并在三年中通读一遍,成为“他一生中最有传奇色彩的读书佳话”,也因此他才得以执鞭从教。

在经历了十多年艰辛曲折的求学与刻苦的自学道路之后,1908年10月,才20出头的王云五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成为胡适的老师。当时的他留着辫子,土气十足,但凭着学识和口才,终于取得了学生的信任。1911年的12月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王云五幸运地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旅居上海的香山县人氏设宴欢送孙中山,他们公推王云五为主席,他致词后就坐在孙中山的旁边。孙中山对这位小同乡极为欣赏,当即邀请他到总统府担任秘书。在这以前,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针对清末学制流弊提出三点改革意见,很快就得到蔡的回信,对他的方案大加肯定,希望他能到教育部“相助为理”。孙中山同意他上午在总统府接待处工作,下午至教育部供职。不久,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王云五随教育部北迁北京。在此期间,他曾为《民主日报》撰写社论,在国民大学(后改名中国大学)教授英文。

1914年,他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他对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让人刮目相看。他晚年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五时起,夜间仅睡二小时,迄次日午后三时,计实际工作二十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1917年秋天,他担任三省禁烟特派员时,卷入收购外商鸦片的存土案,因“合法”拿回扣而被迫辞职,告别了他近6年的官场生活。

此后3年,他在上海闭门读书,并从事著译,研究过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广泛涉猎西方新著作,学习法文和德文,翻译了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学识大有长进。1920年他应邀为公民书

局主编一套“公民丛书”,这是他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涉足出版业仅有的经验。

二

王云五有幸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文化转型的大时代,1921年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最重要的年头,他登上中国出版和文化界的大舞台,从此揭开了他一生事业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创办于1897年、有了24年筚路蓝缕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冲刷之后正面临着新的转折,急于物色一位懂外语、学贯中西的新人来主持编辑出版事务。最初,张元济、高梦旦目光所关注的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当胡适举荐他的老师王云五自代时,他们惊诧不已,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王云五其人。1921年7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评价王云五:

他曾教我英文。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34岁,每日必要读一百页的外国书。

9月1日胡适日记中说:“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

胡适的极力推荐,使商务接纳了当时汲汲无名的王云五,一个没有文凭的自学成才者,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元济、高梦旦——这些创造了商务第一轮辉煌的出版巨人们的气度、胸怀和眼光。这个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王云五果然不负所托,以他出色的管理才华和他过人的胆识,让商务始终站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沿。

1921年9月16日,也是传统的中秋节,王云五正式跨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不到两个月(11月13日),他就系统地提出《改进编译所意见书》。1922年1月他接任编译所长要职,开始他一生的出版生涯,成为中国出版现代化卓有成效的探索者。他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量起用学有专长的新人,扩大机构,以现代学科分类重新改组编译所,提高工作效率,革新《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期刊,致力于传播新知识、新思

想,介绍新学科,使商务印书馆形象一新。

在他主持下,短短几年内就出版了 50 多种大型丛书,包括百科小丛书、农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国学小丛书等,为他以后编《万有文库》奠定了基础。他计划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虽然没有成功,但 1928 年起他主编的《万有文库》,统一版式排印出版中外名著,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可惜出了两集 1700 种、4000 册之后,由于战乱而未能全部完成。这已经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盛事,出版规模可谓空前未有,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只要购买《万有文库》,就等于建立了一所小型图书馆。王云五当年策划《万有文库》,其雄心就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他的这一雄心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在战火纷飞的岁月,王云五忠诚于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乃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恩泽惠及无数读书人。

进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的知识大量涌入,工具书的编纂是当务之急。然而,传统的部首检索法却十分繁琐不便。王云五总结前人的改革设想,苦思半年,决定从号码检字寻找出路。他把笔划分为五类,一是横和挑,二是直和直钩,三是撇,四是点和捺,五是曲折,分别用数码表示,进行编码,终于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那就是“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并以此法编了《王

云五大字典》和《王云五小字典》等不少工具书,曾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此外,他兼任东方图书馆馆长,首创民营企业藏书向社会开放的先例。他举办图书馆学习班,对外培训图书管理专业人才,还推介和完善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商务印书馆在他手上达到鼎盛时期,其规模和组织的庞大齐全,现在也没有多少出版社可与之比肩。

王云五以勤奋、博学、务实、进取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成为名垂史册的出版巨子,对中国 20 世纪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长文,公开批评租界当局,并同意《东方》编印“五卅事件特辑”,受到起诉,在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最终只是以罚款 200 元了事。叶圣陶、茅盾、郑振铎等商务编辑出版《公理日报》,他也没有干预。二是在当时激烈的工潮中,虽然作为管理者,他代表资方,但当军阀要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王云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前排右起:王云五、王世杰、胡霖

手工潮时他的表现却让人不无吃惊。据茅盾回忆录,1925年6月,商务印书馆职工大罢工,劳、资双方代表正在举行第二次谈判,突然一个凶煞似的军官带着几个士兵闯了进来,称“本营长奉淞沪镇守使之命,前来给你们调解。你们双方各坐一边,给我坐好!”在看了罢工委员会的《复工条件》和资方表示能接受的答复条件后宣布:“你们工人不是要加工钱么?我说可以。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嘛。你们工人又说要成立工会么?那不成。联帅(孙传芳)命令取缔一切工会。几千人罢工,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我限你们双方今天立即签字复工!”并威胁道:“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说着就往外走。王云五突然快步向前,拉住他,扑的跪在地下哀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两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劳您派兵来。”营长不置可否就走了。王云五回身对大家痛哭说:“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人来干涉。”工潮最后以“商务”资方的让步而告终。

三

1929年秋王云五一度离开商务印书馆,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法制组主任,但他仍然心系商务。1930年春,当商务印书馆聘请他出任总经理时,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二是允许他出国考察半年。他随即出访欧美、亚洲九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之后他回到上海,“拟订全面改革计划草案,明确各岗位职责,严定工作标准,以薪金为调节手段。”他推行的“科学管理法”虽然受到抵制,但其中闪耀着“现代企业制度的火花”(郭汾阳语)。

他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炮火炸毁,损失极为惨重,这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大的劫难。面对大灾难,王云五曾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很快以其文化良知,坚定地负起了责任,开始他出版事业中新一轮的跋涉。他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响亮口号,同时宣布“日出新书一种”。为振兴文运所系的商务印书馆,他不辞劳苦,不惜生命,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商务

往日的繁荣和兴旺。到1933年,他复兴了东方图书馆,编印了《万有文库》续编、《小学生文库》,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千余万册,各种字典数十万本,重要参考书数百种。商务印书馆在30年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可用一个统计数字说明,仅仅1934至1936年的三年间就出新书12024册,占全国同期新书出版数的48%,占有全国图书市场52%的份额,规模之大、业务之广、技术之高,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业中都绝无仅有,曾被誉为“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达到了商务百年史上的鼎盛时期。特别是王云五组织出版的“大学丛书”,为此建立了由蔡元培领衔、包括了56名各学科一流专家的编辑委员会,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共出书200多种,结束了外国人编写的外文教科书垄断中国高等教育的旧时代,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他主持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用现代科学眼光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不少著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是20世纪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他领导下,商务印书馆不仅完成了“日出新书一种”的目标,而且与文化界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商务作者群中不乏权威的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培养了很多文化史上杰出的英才。

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的废墟上迅速复兴,创造了商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出书品种、规模和实际资产都超过了“一·二八”前,这是“世界出版史和文化史的一个奇迹”(王建辉语)。这一切都是与王云五的努力分不开的。书虽然是有形的,但“其中蕴涵着一种无形的精神,这些丛书大多是在大劫之后进行的,体现了他不辞艰辛不屈不挠的文化精神”,也就是绵延不绝的“书局精神”。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王云五主持重建的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时再度惨遭日机轰炸。战争迫使商务印书馆几度迁移,最终迁到重庆,王云五以“复兴中华”为号召,他的“科学管理法”也收到了很大效果,使商务在艰难的环境下仍持续得到发展,推出了《中学文库》、《王云五新辞典》等广受欢迎的出版物。

从1938年起,王云五虽然担任国民参政员,但是从上海到长沙,从香港到重庆,在国难当头

的岁月里,他一直与商务印书馆共患难,以致身心憔悴。到1946年5月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职,他主持商务的编辑工作和馆务共计25年,其中任编译所长9年、总经理16年,在20年代到40年代,凡是读书识字的人,几乎都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物,几乎人人都知道王云五其人,正是他继张元济之后将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念发扬光大。

四

1938年王云五被国民党当局选为参政员时曾说过一番话——

我向来是主张本位救国的,所以近十年来,专就自己主持的出版事业努力,认为直接有益于社会,便是间接为国家致力,因此,对于政治不愿直接参与。假使平时被选为参政员,我必定辞谢不就。目前却不然了,国家到了这个严重的时期,全国人民的智能、资力和生命,都有随时受国家征发的义务。我这次被选任参政员,正如一个壮丁被征入伍。新入伍的壮丁只能说:“我当努力尽职”!

这一时期他虽然参与政治,但主要还是经营商务的出版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他作为38位政协代表、9位无党无派代表之一参加了政协会议。5月,他以“社会贤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终于踏上弃文从政、弃商从政之路,这一年他58岁。

王云五早年有过从政的经历,1912年曾在北京参加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但1927年就退党了。他是以无党无派的身份,以主持商务印书馆成功而名动一时,并因此受到各方注目。

随后的两年半时间,他先后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等职。1948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前夕,蒋介石起用“社会贤达”,王云五在翁文灏内阁出任财政部长要职,以霹雳手段主持币制改革,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金圆券风潮。王云五因此声名狼藉,也因此他虽然已辞职。但中共中央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王云五还是名列第15名“罪大恶极,是国人皆曰可杀者”。1949年后他去了香港、台湾,继续从

政,曾官至“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

1963年12月,77岁高龄的王云五辞去一切政府职务,重操旧业,就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直至92岁去世,15年间他再度开创了新的出版事业,推出大量优秀著作,弘扬中华文化。他主持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中正科技大辞典》都对汉语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一生前后主持商务印书馆达40年之久,是中国出版史上无法回避的巨人,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中国的文明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他去世前七年多,他预立遗嘱,把全部藏书和钱款捐出,建立王云五图书馆。此外,他还主持了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工作。淡出政坛后,他潜心著书立说,写下了《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岫庐最后十年自述》、《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等著作,尤其是前面三部长达百万字回忆为后人研究中国百年史和商务印书馆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因心脏病发作逝世。逝世前几天还奋力执笔为商务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为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史料。

在海峡的此岸,因为王云五1946年后的这段从政经历,长期以来他被刻意地遗忘了。即使在纪念商务百年时也鲜有人提及他当年的贡献,出版界、史学界对他都是讳莫如深。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沉寂之后,1997年1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关鸿、魏平主编),作为“海外学者文丛”的一本,包括忆旧、论学、杂述三部分,大多数是王云五到台湾后发表的文章。这是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王云五的著作。1999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王云五评传》(郭太风著)。2000年7月,王建辉的博士论文《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王云五这位曾经在中国出版、文化等领域名声煊赫、影响至大的历史人物终于重新浮出水面。拨开历史的灰尘,后世的人们将长久地记得商务印书馆,记得王云五这个名字。

(责任编辑 吴思)

母亲冯慧德的政治生涯

● 齐翔延 齐翔安 齐小慧 齐小鲁 齐翔英

只身北上,大学深造

我们的母亲于1905年7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农村的一个殷实家庭。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孩,也是最小的,难免娇生惯养,也因此少受许多封建束缚。外祖母本来要给她缠足,经她一哭一闹就罢了。她的童年可以算是快乐的,可惜好景不长。她13岁那年外祖母辞世,外祖父和舅舅们都出外谋生,她从此失去了母爱,也少有人来关怀照顾她。几年后她随外祖父到了上海。那时,她有个姨表兄,名叫章光明,在上海永安公司任职,是中共地下党员,常给她讲些革命的道理,介绍她读一些进步书籍,并且时不时地带回一些传单等宣传品藏在她那里,对她影响挺大。但是姨婆家比较贫困,只想找个身强力壮的媳妇当劳动力。为了割断他们表兄妹之间的感情,姨婆不久就为表舅讨来一个童养媳。

1923年,在母亲快满1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跨进正规学校的大门,即上海爱国女子中学,那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同班同学当中,母亲的年龄偏大,学习相当吃力,但她还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无论募捐还是宣传都走在前列。老师们经常夸她作文写得好,校长也喜欢她,常把一些工作交给她去做,从多方面帮助她鼓励她,于是她成了这所学校一个小有名气的学生。

1926年,母亲完成了高中的学业,这时候她已经21岁了,家里人打算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



30年代的冯慧德

了。

从此她脱离了旧家庭,接触到北方新鲜的政治空气,受到新思潮的熏陶,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四年同窗,情投意合

母亲到北平以后,报考了中国大学国学系。该系系主任吴承仕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四大弟子之一,著名的经学家,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母亲感到自己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所以终日埋头于书案间。她与我们的父亲齐燕铭同班,渐渐发现父亲为人谦和,处世谨慎,不露锋芒,而熟知经史子集,国学基础深厚,因此常常向父亲请教。他俩天天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母亲在北平举目无亲,父亲就常把母亲请到自己家里去。父亲的祖母、父母亲以及他的弟弟妹妹都很喜欢母亲,

可是母亲一心想到北平去上大学。全家人一致反对,她与家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外祖父已重病在身,对她说:“我病成这个样子,来日无多,你去北平我就再看不见你了。”母亲仍然坚持要北上,外祖父威胁说:“你要去就自谋生路,我可 not 给你寄钱!”舅舅们则说:“她哪儿是去上大学,无非是想找个男人嫁了好享福!”母亲坚定地回答说:“钱不用给我寄,我自己勤工俭学。大学我一定要上,而且决不半途而废。不毕业决不结婚!”母亲就这样只身到北平上大学去

母亲对父亲也从仰慕到爱慕。但是在校的几年间他们只是用功读书,互相帮助,老师和同学们对他俩的印象很好,但都没想到他俩是一对恋人。直到1930年他们毕业了,这一对恋人宣布结婚的时候,大家才不胜惊喜。老师做证婚人,同学和朋友一致认为这是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

母亲结识父亲,不仅使她在大学期间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而且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终生伴侣。后来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艰难曲折,严峻考验,丝毫都没能动摇他们相互间的信任与忠诚。

毅然决断,投身革命

父亲毕业后立即应聘为本校国学系讲师,成为吴承仕教授的得力助手,父母事业家庭双辉。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局动荡打乱他们平静的生活,父母亲订阅许多报纸杂志,密切注视日寇侵华事态的发展。

中国大学是当时北平革命力量最强的学校之一,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在那里十分活跃,许多知名的革命家都出自该校。父亲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关心苏联的革命与建设,频频参与进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创办进步刊物《文史》、《盍旦》,发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反对不抵抗主义、呼吁全民奋起抗日救国的文章,并且在教师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尽量团结大学教授和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共同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父亲还把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介绍给吴承仕教授,每周约请吴承仕教授和其他几位朋友到家里来讨论时局,研究对策。母亲作为女主人,除了热情接待客人以外,也常常参与他们的讨论。在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中,中国大学的进步团体都站在前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经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批准,成立了中共特别小组,父亲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还有张致祥等同志,由陈伯达负责与北方局直接联系。

母亲当时对共产党员非常敬佩,把父亲请到家里来聚会的人都视为亲人。他们经常谈到大半夜,母亲除了热情款待他们,还为他们看门。那个时候陈伯达生活很贫困,母亲常常资助他。有一次

陈伯达被特务盯梢,母亲送他到朋友罗常培教授家去躲藏。后来形势紧张了,陈伯达要离开北平,母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为他筹集路费。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局势日益恶化,父亲常常外出,有时深夜不归。父亲面临重大抉择:或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或离家赴抗日斗争第一线。那时候母亲临产,已有的四个孩子都很小,最大的不满六岁,还有祖父母要人赡养照顾,家里又没有积蓄和其他财产,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薪。父亲一走,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母亲深明大义,要父亲立即下决心离开北平,并且亲自拖着笨重的身子去给父亲买火车票,又交给他几件首饰,就匆匆送他上了车。母亲勇敢地独自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定地支持父亲离家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

勇敢斗争,携雏南下

不久,母亲生下小妹,一时无法外出工作,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搬到祖父母家去挤在一起住。我们的小叔叔齐振铎是清华大学学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北平民先队的负责人之一,兼任市民大队队长。为了在敌人铁蹄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没有随校南迁,在家经常与母亲谈论抗日斗争的形势,也常带给母亲一些宣传品、文件和苏联小说,并且把一些重要资料存在母亲处。他不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都由母亲接待,他认定母亲是自己的助手和最可信赖的人。

1938年初夏,日寇举行大搜捕,半夜翻墙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正巧那天母亲刚刚为小叔叔藏了一些文件和书刊,她急中生智连忙把这些东西塞在沙发扶手下面。敌人进屋搜查的时候,母亲十分镇定地从衣柜中拿出一包包小孩的衣被,待敌人查完一包就接过来搁在沙发上,东西越堆越高。敌人查了半天一无所获,再看看这一间小屋里挤着五个小孩,料想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好走了。当时小叔叔在北屋,而我们在东屋,相互隔离不许走动,敌人在我们屋搜查的时间最长,把叔叔急坏了。他不明情况,更担心文件被搜出。最后没有任何问题,小叔叔由此对母亲的机智勇敢十分感佩。

1938年11月,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敌特破

坏,小叔叔失去了组织关系。母亲劝他赶快离开,并且主动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天津找张致祥同志。小叔叔通过张致祥同志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后来就到冀东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去了。1940年7月26日,他在遵化同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葬于现在的唐山冀东烈士陵园。

小叔叔离开以后,母亲决定外出找工作做。1938年底,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和一个妹妹乘船去了上海,到位于法租界的爱国女中找到老校长季毅生。他告诉母亲,当时国民党CC组织正深入到各个学校抓权,给爱国女中派来了一个训导主任,现在学校正好缺一名副主任。母亲若去任职,难度会很大,既要管训导,又要管教务,还要任年级主任,每周得上几节语文课,更要对付那个顶头上司的种种刁难。母亲毫不犹豫地接了这份工作。

工作一有着落,母亲立刻匆匆返回北平,把可变卖的东西都卖了,将最小的妹妹托给祖父母和叔叔婶婶,带着我和大妹妹乘轮船到上海,直到全国解放我们再也没有回过北平的家。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她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都不多,而工作相当繁重,还要照顾四个年幼的子女。我们的生活十分清苦,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用煤油炉子煮了一锅稀饭,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抢着吃,母亲在

一旁悄悄落泪。

这个时期我们始终没有父亲的消息,母亲时时思念牵挂着父亲,心情很苦闷。但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从不向外人表露,昔日的同窗或朋友主动要接济她,她都一一婉言谢绝。

冲破险阻,投奔光明

1940年初,母亲得知父亲在重庆,就毫不犹豫地要带着我们离开敌占区去找父亲,这个行动要她付出怎样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因为当时内地已经被日寇占领,从上海到重庆要绕过半个中国,途经香港和越南的海防、河内、老街,再经过昆明、贵阳,然后才能到达重庆。母亲是个十分坚强的人,她想做什么事情,不管有多大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她先辞去工作,把稍稍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变卖了来筹集路费,还说服了大舅和大舅母让她把大表哥带走,免得大表哥在上海恶劣的环境里学坏了。大舅母不愿意,也不放心,竟至哭起来,可是母亲执意要这样做。于1940年5月不管兵荒马乱,不管前边有多少艰难险阻,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上路了,大表哥当时十三岁,我最小的弟弟才四岁。我们有时坐船,有时坐火车,有时搭乘国民党的运兵车,有时走路,晚上或住小店,或住车站。有一天下大雨,又找不到住处,我们只好在街边的棚子底下避雨。一路上风吹雨打,蚊虫叮咬,我们兄妹几个时常发烧、泻肚、打摆子,还要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到达香港的时候,由于语言不通,只得靠写字问路办事。有时我们的食品和日用品被大兵们夺走。越南的火车是人畜共用,加以天气酷热,车厢里又闷又臭。母亲为我们操够了心,吃尽了苦,但她始终精神抖擞,坚信前途光明。

经过几个月的跋涉我们才抵达重庆,然而我们不知道父亲的确切地址,日本飞机又天天轰炸,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有时看到隔岸大火在烧,人影在火光中跑,但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安顿在小旅店里,一有空隙就出去打听父亲的消息。一天,有个陌生人(事后才知道此人是徐冰同志)到小旅店来找我们,留下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母亲立刻按这个地址去寻找,终于找到了父亲。



1940年从上海去延安前的留影

几年不见,父亲的样子变了许多。他戴一顶礼帽,架一副墨镜,还蓄起了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吓人。他脱了帽子摘了墨镜以后,却又像从前一样和蔼可亲了。他把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父亲带母亲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决定由母亲带我们去延安,而父亲要到太行山去工作。从重庆到西安这一段路我们得自己走,好在父亲可以与我们同行,他到西安以后再转车去洛阳。到了西安,因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着的人太多,组织安排我们先在外边等候,直到去延安的车队出发时间确定以后,才让我们住进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这期间,父母亲听了董必武同志的时事报告,之后父亲就往洛阳去了,打算从洛阳过黄河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刚刚团圆的一家人又要离开,我们真是恋恋不舍。

几天以后,去延安的车队尚未出发,父亲突然回来了。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洛阳设置障碍,父亲从那里过不了黄河,只好返回。这时候董必武同志决定让父亲与家人一起去延安,然后从晋西北过黄河,我们全家自然十分高兴。母亲脱下旗袍,换上了军装,显得特别神气。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教我们在路上如何应答各种盘问。

我们的车队开到封锁线的关卡时被国民党特务扣住,搜查盘问了很久。几经交涉,他们仍不肯放行。幸好遇到路过的一位八路军总部负责人,他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最后才放我们走了。虽然此时天色已晚,大家被扣了一天又累又饿,可是都高兴得不得了,唱啊跳啊,庆祝曙光就在前头。当天晚上我们在甘泉宿夜,这一夜的情景印象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0年11月5日,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勇敢坚强地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走过半个中国奔赴延安,由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从此我们脱离了苦海,找到了光明。

艰苦磨砺,努力工作

到延安以后,组织又决定父亲先不去前方,留在马列学院工作。母亲则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大表哥冯西到自然科学学院学习,翔延、翔安和小慧进了安塞保育院小学,弟弟进了延安保育院,我们

一家人各得其所。

这个时期是母亲最愉快、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她走上了革命道路,融入革命大家庭之后,她不再为生计所苦,亦无家室之累,因此她工作学习都特别努力。在延安她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陕北公学的学员年龄都不小了,衣裳破烂,冬天也少有人穿袜子,甚至有人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但是学习都非常努力。谈起国际国内形势,人人都能说一套。母亲上课前,学员们还唱着歌欢迎她,使她深受感动,这样的学生她从未见过,更未教过。

1941年4月1日母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在各方面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小米饭,菜只有咸水煮萝卜,有时候一个人连一片菜也分不到,逢年过节才见得着一点肉或者豆腐。这样的苦日子母亲以前没有经历过,但是她毫不在意。她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参加纺棉花、纺毛线、织毛衣、种地等劳动。对于她来说,这些都是严峻的考验。由于她主观上有强烈的改造自我的要求,这些考验她都愉快而又顺利地通过了。

在延安的六年多时间里,母亲在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工作了两年,在中央党校工作了四年。她的主要任务是给老干部和青年同志上文化课,也曾一度兼任指导员。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母亲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随即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撤离延安,赴晋绥边区。父亲则随叶剑英同志赴西柏坡参加中央土地会议,会后前往晋冀鲁豫传达会议精神。后来经组织决定,母亲与其他四位高级知识分子也列席了土地会议,会后加入土地改革工作队,赴山东工作。以往母亲对劳动人民的认识主要来自文艺作品和理论书籍,她参加了土改以后,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纯朴和他们遭受的苦难,进一步增进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石家庄市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中等城市,中央极为重视,派了一批干部去接管,柯庆施任市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找母亲谈话,要母亲就任石家庄女中校长,母亲立即随队出发。这是她第一次独当一面担负学校领导工作,她处处关心干部和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大胆发展党的

组织,团结骨干力量,教育学校员工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傅作义部队妄图突袭石家庄,母亲迅速组织学校备战、迁校,各项工作都顺利地完成了。母亲通过大量的事实使师生员工受到深刻的教育,转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她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提高了。

天津解放以后,母亲于1949年春调任天津河北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这所学校规模比较大,设有高中、初中、幼儿园,师生员工共数千人。该校原先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据点,因为刚刚解放,校内政治情况复杂。母亲到校以后,首先设法增强干部力量,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统战工作,扩大教师队伍,清除反动分子,使学校比较快地走上正轨。

这段时期父母亲的工作都很忙。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父亲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母亲也是日夜操劳,吃住在学校。他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谁也照顾不了谁,常年难得见一面。

1951年暑假后,母亲调中央教育部工作,父母亲在周恩来总理住的西花厅前院有了一个两间平房的家,他们总算又可以在一起生活了。

50年代末,母亲调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监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她在农大工作了七年半,她爱学生,爱学校的一草一木。她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最大特点是爱惜人才,关心知识分子。她虽然对人要求严格,不讲情面,但是反对整人,反对极左路线。她对领导的错误敢于批评顶撞,不怕打击报复,而对师生总是善意地帮助引导,鼓励他们向上,师生们至今仍然怀念她。那几年母亲患上肝炎,农大在远郊,她每天要在市郊间奔波十分劳累,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上调她到电影学院工作。不料很快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只好永远告别了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信念坚定,爱憎分明

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文化系统历来是多灾多难之所,不断受到运动和批判的冲击。从50年代初即有批《武训传》电影,批俞平伯,批胡风等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使文化艺术界遭到沉重打击。加上“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令文化工作走入低谷。正在这时,组织调父亲到文化

部工作,1960年2月总理任命他为文化部副部长,3月中央任命他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年事已高,实际上是由父亲主持文化部工作。从思想感情上讲,母亲十分不情愿让父亲离开总理。因为从1945年周总理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同机抵渝)以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协助总理工作,配合默契,亲密无间,多年相处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父亲也舍不得离开。但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事,父亲只能临危受命,这时总理仍要他兼任国务院代秘书长的职务。

自从父亲到了文化部后,母亲如履薄冰,总是为他担惊受怕,那时文化部的工作十分困难,反右后许多人都三缄其口。父亲到任后,即广交朋友,与梅兰芳、马连良、红线女、曹禺、欧阳予倩等几十位文艺界知名人士促膝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呼声,广泛团结党内的文化工作者,为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他不辞辛劳地勤奋工作。父亲书房经常到深夜亮着灯,母亲常常多次催他去休息。1962年传来主席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母亲顿时感到紧张。到1963年后,一个又一个严厉的《批示》传来,母亲看到这些已经完全蒙了。父亲彻夜难眠,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但也不知如何才能深刻。母亲默默陪伴着他,为他着急又担心。以前吃饭时,一家人总是有说有笑,别的时间父亲总是很忙,只有吃饭时全家欢聚一堂。父亲喜欢讲些有意思的事,或让人增长见识,或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可是这些日子,父亲一言不发,随便扒几口饭就匆匆离开,母亲也吃不好饭,饭桌上的气氛十分压抑。接着又有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批示,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讲话和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1964年文化部进行整风之后,父亲被发配到济南,孤身一人去往山东,母亲职务在身也无法与他同去,只是为他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分别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为他送行。到底为什么要去济南?还会回来吗?这时父亲国务院代秘书长的职务已被免除,母亲陷入沉思。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边。这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只是它的前奏曲。即将来临的是父亲七年的炼狱、全家被扫地出门及种种从未经历的考验和磨难。

在“文革”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老革命干部

都给打成了“反革命”、“黑帮”，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而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干的。母亲自然也深深地陷入迷茫，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她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说过丧失原则的话。“文革”中，她头上身上常被泼了墨水和浆糊，背上到处都是被打的血印，逼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她总是大声说：“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承认执行反动路线，她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路线我都执行了，因为我不知道中央有两条路线。”1967年12月，《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批判父亲的大文章，从此造反派对母亲的批斗更加升级，更加凶狠。他们要母亲揭发父亲的罪行，母亲回答说：“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知道，揭发不了……他跟周总理几十年，勤勤恳恳工作，从不反党……你们说他是三反分子，中央没有作结论，报纸上登的不代表中央文件。”造反派自然十分生气，打她，骂她，逼她揭发和认罪。她说：“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他是他，我是我。夫债妻还是封建思想！”造反派指着报纸说：“这么多铁的事实摆着，你还不跟他划清界限？”她却异常平静地说：“我们结婚几十年了，划不清了。”造反派把砖头挂在母亲脖子上，狠压她的头要她跪下，她反抗说：“共产党员不能跪着！”造反派气急败坏打她，踢她，直到打断了她的腿。她刚做完手术，造反派就追到家里来批斗她，而她仍毫不屈服，经手术固定在她腿上的钉子松动，她不得不去做第二次手术。母亲的腿上打了石膏以后连翻身都不行，更无法起床，可是造反派还要她到学校去参加批斗会。母亲大声说：“我就去，你们来抬我！”来人看到实在是抬不动才作罢。好心的同志担心母亲这样硬顶会吃更大的亏，劝她说几句软话。可是母亲不肯，她还对一些同志说：“别怕他们，他们长不了的。我断了一条腿还有一条呢！”有一次造反派在批斗母亲的时候骂她是“齐燕铭的臭老婆”，母亲回答说：“我是齐燕铭的老婆不错，臭不臭还要由历史来作结论。”造反派大声训斥母亲说：“你别表演了！”母亲冷冷地回答说：“咱们大家都在表演。”对方无言以对。有的造反派说：“真没见过像她这样的黑帮，别人不敢说的话她都敢说。”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几乎天天有人来抄我

们的家，不仅大量毁坏珍贵的书画、相片、唱片，而且拿走存折、现金、被褥，弄得母亲甚至没有被子盖，这些母亲都不在意。父亲被卫戍区“监护”以后，多年音信全无。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难得相见。母亲心中十分痛苦，夜夜失眠，而在人前照样谈笑风生，批评这个人幼稚，那个人软弱，有时还不客气地指责别人“真糊涂！”

那些年，“四人帮”把几个艺术院校轰到河北省让给三十八军管。母亲当时已经60多岁了，腿上还带伤，仍作为重点监督对象下去劳动。她经常趴在地上或者坐在地上干活，直到高血压使她晕倒在地才被送回北京。这期间她的体重减轻了几十公斤。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做清理工作的同志来找母亲，要她揭发迫害她的人。母亲总是说：学生们懂得什么，这些事情不能怪他们，连我们问她是谁打断了她的腿她都不肯说。对于失去的财物，母亲更是淡然处之。父亲被监禁七年回来后，母亲还支持父亲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我们姐弟对“文革”中的一些事情想不通，发几句牢骚，也要挨母亲批评。谈到党和国家这些年遭受的严重损失，许多正直的人被打成反革命，一代青年人被害，特别是谈到周总理被迫害，母亲常常难过得落泪。

母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完全可以享享清福，可她还是抓紧时间学习，对许多问题认真反思，母亲认为绝对不能忘记“文革”这一段历史，要记住恩格斯的教导：“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母亲读了《忆周扬》和《陆定一传》曾经对我说：“过去我对周扬很有看法，觉得他是条棍子，批了多少人，也批过你爹爹，上纲上线，疾言厉色，让人害怕。看了这本书，知道他在‘文革’以后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向被他错误批判和整过的同志道歉，这样就好。再说有的事情多半也不是他能够作主的。”她看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后说：“耀邦的功劳真是不可磨灭，他解救了多少人啊！他死得真可惜！”

这些年母亲读了许许多多书，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做一些必需做的事情以外，她都是坐在沙发上读书看报。她每天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上午看书，9—10点钟后只要《人民日报》一来，她就认真阅



1977年冯慧德、齐燕铭摄于庐山

读每篇文章。若有事打乱了未来得及看完,下午或第二天一定要补上,否则她就认为是没完成任务。每当看到各地建设的好消息或在电视看到许多城市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她都喜出望外。有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执意要坐在轮椅上到街上或到天安门去看看。因此,90多岁的她思想仍能跟得上时代而不落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她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教子有方,注重品德

我们姐弟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品德教育。我们成年以后,在母亲身边的日子不多,可母亲对我们是身教重于言教。她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为人处事的原则性,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上。记得1946年中央代表团撤回延安的时候,父亲病重,从飞机上用担架抬下来,为了让父亲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母亲扶他躺在大卡车上直奔杨家岭。在母亲心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幕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对于我们姐弟的功课、日常穿着,母亲很

少过问。她对我们要求最严的是两点:一是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做错了事要老实承认,否则她决不原谅;二是要有事业心,工作必须认真负责,生活小事可以马虎一点。翔延14岁参军,随部队转战南北,几年无法与家人联系。部队到晋西北以后,母亲打听到部队的驻地,立刻走了几十里路来看望,见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工作好吗?”又问领导:“她表现得怎么样?工作能胜任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才放心了,然后还嘱咐:“不要过早谈恋爱,好好多干几年工作再考虑个人问题。”

母亲经常提醒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和小妹留学苏联期间,她常常给我们写信讲国内形势和国家经济建设情况,鼓舞我们积极向上,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我们回国以后,自然都希望在母亲身边工作,但是妹妹立即被分配到克拉玛依,母亲鼓励她说:“你是学石油专业的,到那边正好可以一显身手,学以致用,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于是妹妹高高兴兴地去了大西北,一走就是许多年。

母亲从不娇惯我们,从小要求我们自立自强,不怕吃苦,她相信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才能成才。我们姐弟从小过集体生活,母亲很注意培养我们的集体观念,要求我们与同学团结友爱,关心他人,切忌自私自利。后来我们长大成人了,住在家里,母亲要求我们交伙食费,让我们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树立凡事不依赖父母的观念。我们工作学习有成绩,母亲从不忘表扬我们,有时也给一点物质奖励,甚至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往我们嘴里塞一块糖。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她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她总是说:“你们是在延安长大的,是党培养的,对党对国家都要看主要方面,不能不负责任、不顾影响地瞎说一气。”

党员责任,终生不忘

母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离休以后,仍然密切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国家的建设事业,关心她为之献身的教育事业。她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一定会好起来,会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

母亲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深知培养人才的

重要。她想到教育经费短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看到一些地区的群众生活穷困,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交不出学费,她十分焦急。

1990年她把自己积蓄多年的35,000元捐献给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基金会,当时她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她对基金会的负责人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感教育的重要、教师的重要。我捐的这点钱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是表达我晚年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为在全社会发扬尊师重教的风气尽一点微薄的力量。”1998年5月她又将近年积攒的10万元捐献给了政协对口扶贫县——安徽枞阳县的石溪村小学。石溪村人回赠她:“慧眼观世纪风云,德心济贫困学子。”以表达他们对她的敬仰。

她一心想着国家和党的事业,想着如何能起党员的模范作用。有时我们在社会上听到一些牢骚话,在她面前说就会挨批评。她时常对我们说,要从大方面看问题,不要犯自由主义,道听途说,瞎传一气,不起好作用。一次在参加追悼会时见到邓拓的女儿、女婿,她对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要向前看,党也会犯错误,要看到现在党正在自己纠正错误。”母亲已经90多岁,但每次过组织生活,她都坚持要到会,而且对党的文件认真学习,对要讨论的问题进行准备。她一生养成的习惯,每到领工资时就立即去交党费。工资改由银行代发以后,交党费的事就由二妹代劳。一次妹妹因有事当天去不了,想晚一天再交,她就急了。结果是由三妹夫去代交的。她90岁过生日时说,我还有三个愿望:一是香港回归了,我想去看看,比较一下与1940年时我所见到的旧香港有何变化;二是再积累10万元捐给教育事业;三是希望能见到台湾解放。

她一生克勤克俭,从不贪图享受。近些年她的工资像其他老干部一样,也增加了许多,她完全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她不肯请保姆,坚持生活自理,一如既往地省吃俭用,不浪费一分钱,甚至有病也不爱去医院,常常自己买药吃。她屋里的家具大多是50年代的,子女们要给她换一套,她坚决不同意。她的衣服鞋帽也都很旧了,有些已经不合身了,她也不肯买新的,总是说:“还能穿,够穿了。”她认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追求奢华、炫耀财富是低级趣味。她去世后收拾遗物时我

们发现,她还有新的汗衫、毛巾等省着未用,但夏天有时常穿着有许多破洞的汗衫。她十分痛恨贪污腐败,认为这些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声誉。党的威信是几十年来无数党员前仆后继为国牺牲,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行为才建立起来的。现在要改变社会风气,也必须一点一滴付出力量才行。当她知道自己为教育事业捐献给安徽的10万元被挪用了,(后经过全国政协有关领导亲自过问,已追回送达被捐赠的小学。)十分生气,十分痛心。但她仍不改初衷,临终时再三嘱咐:要把她身后留下的10万元捐给教育事业。

1990年6月,母亲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7月,她被评为全国政协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9年9月,她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这是国家对她的奖励,人民对她的肯定。

母亲曾多次表示她要争取活到100岁,多看看国家的发展。她的身体也的确不错,生活很有规律,情绪总是特别好,特别乐观。在她身上真正体现出了“革命人永远年轻”这句话。

不料2001年冬天她偶感风寒,由此引发了其他疾病,住进了医院。她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七个多月,尽量与医务人员配合。每次大夫来查房,她都要双手抱拳表示感谢,对护士也一一表示谢意。有时护士劝她进食,她因为难受而拒绝了,或者说生气的話,事后都要向她们道歉,请她们原谅。有一天她拉着护士的手说:“我这次生病得了两个女儿,真好!”医护人员都感佩她的坚强、理智和能关心人。

母亲直到临终头脑都十分清醒,她多次嘱咐我们说:“人终有一死,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要想开一点,不要让组织为我多花钱治疗,丧事要从简。把我的角膜献给需要的人,遗体献给医学事业。我剩下的积蓄10万元捐献给我多年为之工作的农业大学,作为特困优秀学生的奖励基金。再从我的工资中拿出4000元给照顾我的护士,感谢她们为我做的一切。”

母亲走过的路是漫长的,她是一个普通人,她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们永远怀念她,尊敬她,以她为楷模!

(责任编辑 致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

● 刘 良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军队中的统治地位，毛泽东也结束了长达数年被排挤、打击的痛苦日子，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初期，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对贺子珍感叹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时，委“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毛泽东心情十分舒畅，他期待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但是，此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进入四川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湖南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除调动湘鄂两省敌军围攻红二、六军团和调动川陕两省敌军围攻川北红四方面军外，还调集贵州军队和他的嫡系薛岳部队以及四川、湖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各路敌军约150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包围遵义地区，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交界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红军原定在黔北

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中央红军决定放弃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计划在黔北一带调动敌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然后由川南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为此，中央红军决定从遵义出发，向黔北的桐梓、土城一带发起攻击，尔后由黔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根据前线红一军团林彪提供的情报，土城守敌只有4个团兵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经过认真商议，部署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分两路会攻土城。

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特派吴亮平到三军团协助做动员工作，命令林彪亲自指挥战斗力很强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担任主攻任务。

这场战斗于1月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千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又即将赶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危局已过去，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次危险的战斗，他说：“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

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土城战斗没有打好,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部队官兵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也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

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2月18、19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但是,没过几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气急之中提出了辞职。

遵义大胜之后,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苟坎。中央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苟坎。

前敌司令部和军委机关驻扎在苟坎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

3月10日1时,一封急件传到前敌司令部,交到朱德手里。

这是一份由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电文如下: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

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朱德看了电文后,转交给毛泽东看。朱德认为,林彪的意见可行。他说: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毛泽东则摇了摇头。自从进驻苟坎,“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特别的注意。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林



右起: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博古)

彪是他一手栽培的爱将,然而这位年轻的军团长,却往往缺乏对敌情准确的侦探和细致的分析,常突发一些怪想。土城战役决策的失误,皆因林彪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这一仗的开战失利和战斗过程中的被动以至所遭到的重大损伤,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于是,毛泽东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传看,尔后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近20个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发言说:“林彪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会上,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大家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时相处也很随便。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夜,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使毛泽东有了转机。3月11日一早重新开会,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

3月11日,电报发出,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这份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责任编辑 吴思)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孕育一代英豪

● 冷玉健

一、转向

1921年10月,中国北洋政府纠合法国反动势力,驱逐遣送了104名为争取正当入学权而进占“里大”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同时“以印刷物分送法国各学校,称学生大半是工人与过激共产党,请为注意等语,致使法国学校大起恐慌,立将勤工俭学生概行驱逐。”不少勤工俭学生被厂方无故辞退。在这特定背景下,有些勤工俭学生被迫回国,有些抗议中法反动派而毅然返国;但也有部分勤工俭学生含怒留法,或移师德国、比利时,有些开始筹备赴俄学习革命道理,实现了留法勤工俭学向旅欧勤工俭学和以学文化、学科学向学革命道理及斗争经验为主的转变。

1922年2、3月间,中共旅法党员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相继迁居德国柏林,与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会合,组建了中共旅德小组;6月3日,经中共旅法支部精心准备,由旅德的周恩来,旅比的刘伯坚,旅法的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萧三、萧朴生、傅钟、郑超麟、尹宽、任卓宣等18名代表,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空地,召开统一的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取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底,由旅法、旅德的中共党员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这些以拯救危难之祖国和人民的旅欧党团组织及共产主义者们,不仅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开展和参加了与无政府主义派斗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华工罢工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及实践;而且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出发,边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边利用欧洲的有利条件致力于干部的培养、提高和输送。

去苏联学习,是当时中国先进青年梦寐以求之事,也是当时中共旅欧支部培训干部的主要途径,而负责培训中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党校,始建于1921年5月。苏共中央规定的政治任务:一是培养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的苏共党员领导骨干,为苏联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是培养世界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属国的党员领导骨干,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服务。学校分苏联班和中国、印度、越南、日本、蒙古、阿拉伯等十几个外国班。中国班学员,一部分由旅欧支部派遣,另一部分由国内选派。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苏共党史、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职工运动、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俄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是当时苏共中央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和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革命干部,于1925年9月创建的。这是一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由国共两党各选送其学员进校学习。主要开设语言、历史(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

1922年秋,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从柏林到达莫斯科,成为中共

旅欧组织赴苏第一人。是年底,萧三受中共旅欧支部委托,由法国到达莫斯科,会见了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陈独秀、瞿秋白及在东大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等人,请示旅法党团员今后怎么办。经讨论决定,让萧三留在东大学习,并决定把西欧的一部分同志也叫来学习。次年初,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远东部决定,中共旅欧支部从旅法、德的党团员中选出第一批青年骨干,派往东大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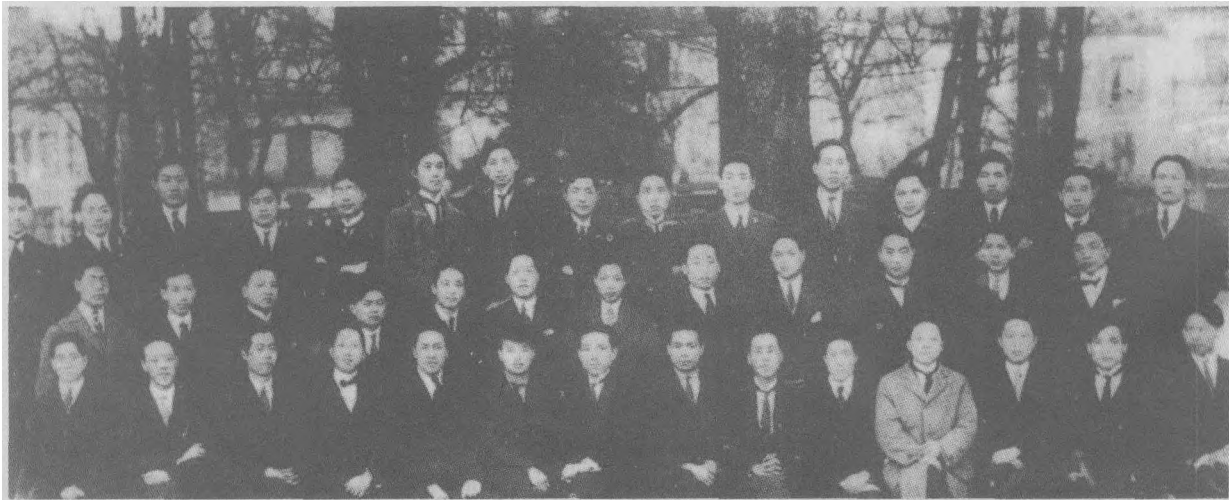
1923年3月18日,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王圭、熊雄及共青团员余立亚、高风、陈九鼎、郑超麟、袁庆云、王凌汉首批12人,由巴黎经柏林、立陶宛到达莫斯科,4月初住进紧靠普希金广场的特维尔斯卡雅街53号东大宿舍,就此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涯。首批赴俄学员,十分珍惜非常难得的机会,经常到共产国际远东部借阅英国、法国的报刊,阅读法、德、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经济与政治》、《人道报》等马克思主义书刊,钻研课堂上讲授的讲义及参考书籍。同时,还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研究苏联、中国以及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情况,撰写了水平较高的论文。其中,赵世炎撰写的《苏俄与美国》、《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世界第一名帝国主义者——英国》等文章,分别登载在1924年1月的《向导》周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

同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又选送刘伯坚、李

慰农、袁子贞、汤儒贤、萧复之、马玉夫、李合林、尹宽、汪泽楷第二批骨干赴东大。

1924年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顺利,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急需大批的领导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加紧了对干部的培训 and 输送工作,先后派出近10批约百余人赴俄学习: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李林、熊味根、胡伦、范易、傅烈、穆青等20多人;同年秋冬,李富春、蔡畅,还有郭隆真。1925年8月,朱德、孙炳文、李大章、房师亮;10月,施益生;冬,刘鼎;12月4日,王极知、许少灵、许祖熊、周文楷、江克明、杨士彬及王若飞、林蔚、林修杰。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傅钟、李卓然、萧鸣、周介琏、戴坤忠、何嗣昌、傅伦、覃仲霖、陈家齐、傅汝霖、宋法明、滕功成、邓绍圣、汪泽巍、季苏、孙发力、傅继英、欧阳泰、岳少文;8月,刘明俨、胡大才、朱增祥、汪庭贤、徐树屏、宗真甫、乔丕成;9月,谢泽源、方至刚、胡大志、杨品荪、覃运猷、汤振坤、海荆洲。次年春,陈微明等。

以上学员中,绝大部分是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优秀党团员。但也有因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等斗争被法、德、比等国反动政府驱逐出境,后经旅欧支部决定趁此机会有计划派遣赴俄学习的,如朱德、邓小平等。这些学员分别就读于东大和中大,其中部分人被转入军事院校学习。因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了中共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



1923年旅欧少共临时大会代表在巴黎合影。前排左起:1 高风,2 赵世炎,4 郑超麟,5 余立亚,6 陈乔年,7 袁庆云,8 陈延年,10 陈九鼎,11 王若飞,13 刘伯坚;中排:1 赵光宸,2 张增益,3 刘伯坚,4 蔡支华,5 李慰农,6 穆青,7 王人达,8 秦治谷,10 萧振汉,12 袁子贞;后排:1 王凌汉,2 张家俊,3 于履中,4 任卓宣,5 傅钟,6 吴琪,7 尹宽,9 薛世纶,10 周恩来,11 汪泽巍,12 萧朴生,13 林蔚,14 汪泽楷。

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中国革命不仅需要一般干部还需要军事斗争干部;加之孙中山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之建议在广州黄埔创建军官学校,1924年10月,聂荣臻、熊雄、范易、颜昌颐等被抽调与国内选派的叶挺等二三十人,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经过严格训练,中国学员军事知识增长很快。尔后,朱德、傅钟等也分别转学军事,有的还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巴黎合影。1排左起:1 聂荣臻,3 李林,4 周恩来,5 刘伯庄,6 李富春,8 傅烈;2排:1 柳溥青,2 林蔚,4 任卓宣,5 周维桢;3排:2 余增生,5 方至刚,6 李卓然;4排:1 穆青,5 邓小平。

二、多支合流

1922年到1923年,国共合

作促使工人阶级踔厉风发,“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响彻云霄,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迭起。国内迫切需要一大批有能力、有威信的领导骨干补给充实。中共旅欧支部听从祖国召唤,号召党团员“努力学习,从早回国”。

1924年夏,中共中央决定调周恩来回国。临行前,周恩来赶赴勤工俭学生及华工的集居点,揭露北洋政府一味屈从帝国主义,压迫国内人民,媚外辱国的事实;分析中国现状靠改良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实业救国”乃是幻想;提示大家只有学习苏联实行暴力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革命的事业才有光明前途。

1923年底,张申府、刘清扬由法国经莫斯科短暂停留后回国;陈延年、陈乔年、萧三等结束东大学习,于1924年6至7月经海参崴坐火车回国;赵世炎等几个学习成绩优秀、工作能力强的共产党员经征得共产国际远东部同意后,于7月8日回国;何长工于同年秋冬离开法国回国。

1925年,国内“五卅”运动爆发,群众运动和军事工作等亟待党派出更多的干部去加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蔡畅、林蔚等相继回国。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这正是李富春、蔡畅抵达广州从事革命工作的第一天,令其大为震惊,

决心继承先烈遗志,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同年,王若飞、熊雄、孙炳文、郭隆真等亦回国。

1926年,朱德结束在俄的军事训练,回到阔别四年多的祖国,在上海接受了党交给的新的战斗任务后,至汉口再赴四川;同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之请求,委派刘伯坚、邓小平等赴国民革命军作政治工作。

至1927年2月,旅欧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人数渐少,但仍在所在国的共产党支持下,为支援国内的大革命运动、争取中国革命的国际援助而努力工作。如“四一二”事变后,旅欧中共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柏林主持并参加了德共发起的“五一”群众示威游行,严正抗议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破坏和镇压;又如1927年春夏,在德共、法共和丹麦共产党的组织支持下,中共旅欧党员分赴德国、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士等国作支援中国革命的群众大会报告,宣传中国革命。1927年7月,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滞留在欧的少数党团员,分别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为其“中国语言组”。至此,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了原先独立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活动”。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后,广大的勤工俭学

生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从中国奔赴法国,从西欧到达东欧之苏联,转辗历经三种迥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紧张而艰苦的学习、战斗和生活中,对各种社会制度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找到了打开中国革命之“锁”的钥匙,对中国革命过去为什么失败、现在怎样挽救,有了更清楚更明确的共识。

三、一代英豪

旅欧支部培养、输送的共产党人回国后,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大显身手,一代英豪开始浮出水面。

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及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等职。1926年冬,周恩来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周恩来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同年4月12日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在疯狂屠杀革命者的腥风血雨中,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一起,为挽救中国革命,领导发起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赵世炎,回国后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我党负责北方工作李大钊的得力助手。1925年夏,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出任书记,赵世炎任宣传部长兼北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赵世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北方工作的有: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后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陈乔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萧三担任张家口地委书记、青年团北方区委书记,后调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在中共北方区委属下任职的有: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袁子贞任天津地委

宣传部长,并与马致远一起在北京、天津、沈阳等地领导开展工人运动;郭隆真在北京做党的妇女工作,主持北京缙云女校,编印《妇女钟》、《妇女之友》等刊物;高风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李慰农从事工人工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同期,参加南方工作的有:陈延年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张伯简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穆青任中共两广区委组织部长;林蔚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黄士韬任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部长;杨志华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林修杰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余立亚任上海市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傅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冉钧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同期,许多同志在军事部门工作,担任着重要职务。新创办的黄埔军校除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外,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熊雄任政治教官;熊锐、张伯简、孙炳文、饶竞群等曾担任教官和其它重要职务。李富春任北伐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朱德在南昌创办军官教导团,并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革命军事骨干;孙炳文、李合林等也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重要军政职务。在西北军中,刘伯坚任冯玉祥部队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任该部队政治工作部门的领导职务。这些共产党人“办事极有精神”,“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很快赢得各方面革命人士的首肯和普遍赞誉。

这些勤工俭学运动赴欧的共产党人回国后,迅速适应且胜任了国内革命工作,在声援“五卅”运动、促进国民会议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大规模群众斗争中,担任了第一线指挥和领导工作,为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贡献卓越,其中部分人很快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1927年5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都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他们与在国内坚持革命斗争的毛泽东等汇合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责任编辑 吴 思)

笔者曾任《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收藏了共青团初创时期的部分团刊。我时时揣摩这些经典，颇有心得。

《先驱》的版本和内容

1922年1月创刊的《先驱》是共青团（创建时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团刊，8开，合订本，一共出了25期。

《先驱》的《发刊词》表明：“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侵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的多了！”

《先驱》不但开宗明义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在第一期便用道林纸套红印制了著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当时译作“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纪念专号。它的内容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讨论中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主要。它的第五期为“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报纸的中缝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并从这一期开始，在报纸的“天头”处印有：“中国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本国武人（军阀）政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等等，清晰显示了当时团的对内对外目标。

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八号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本期刊登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大会作出的有关工人运动、宣传运动、教育运动、团与其他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从第九期起，《先驱》在刊名前明确标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

央执行委员会印行”的字样。

《先驱》的作者与编辑

《先驱》的编辑、作者队伍，犹如一份中共初创时期的人物名册。据“终刊号”总目录后的记载，《先驱》第一至第三期在北京出版，编辑者为仁静、仲懈，前者为中共一大参加者刘仁静，后者即团的二大当选的书记、1933年被反动派杀害的邓中夏烈士；《先驱》第四至第七期因为在北京受到禁止，转到上海团的临时中央局出版，编辑施存统。施又名方国昌、施复亮，是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小组的参加者，时任团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在团的一大上被选为首任团中央书记。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脱党，但一直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40年代参与建立民主建国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劳动部长，他有一个著名的儿子，是作曲家施光南。《先驱》第八至第十期，编辑为蔡和森，蔡是毛泽东的同乡，同年入湖南师范，一起发起“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中共旅欧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此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共《向导》周报主编，1931年被杀害。《先驱》第十一期编辑为高尚德，高又名高君宇，是团一大选出的五人书记之一，团北方局第一任书记，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1925年病逝。高君宇的爱人是当时北京女师的才女石评梅，石

的不少小说至今依然行市。从《先驱》第十二期至二十五期，均继续为施存统编辑。

在《先驱》的作者中，除了相当一部分笔名不好辨析的，陈独秀写过三篇，蔡和森（有时作H.S）写过四篇，贺昌（山西团负责人）写过两篇，李达（中共一大代表）、邓中夏、张维焕（河北团负责人）、恽代英（团二大宣传部长）等等均有文章发表。署名最多的当是最主要的编辑者施存统，还有一位笔名叫做“敬云”（笔者分析应为刘仁静）的也有不少文章。

我收藏的早期团刊

● 杨浪

《中国青年》的版本和内容

《先驱》停刊以后，1923年10月10日，团中央又创办了新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这份杂志小32开，每期15个页码，只有第十六期作为“列宁特号”有25个页码，一直出版到1927年。

《先驱》和《中国青年》同为团中央机关刊，同在上海编辑，甚至有许多相同的作者；但只要稍作观察就会发现，在编辑风格上，这确实是两份风格迥异的刊物。除开本明显有大小之分，简单地概括，则前者厚重，后者生动；前者偏重理论，后者文（艺）理（论）兼收。

《中国青年》十分注重结合青年特点,反映实际问题,而且形式丰富活泼。笔者收藏的这 13 份早期杂志中,除了第十六期的“纪念列宁特号”上,集中刊登了“列宁之思想”、“列宁政治主张”这样的纯理论介绍文章,其他的六七十篇文章中有时评、政论、小说、诗歌、随笔、寓言、童话、书评、读者来信,其话题既有“中国革命之前途”,“青年运动与革命运动”(敬云),也有“诗的方式与方程式的生活”(萧楚女);既有“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邓中夏),也有“青年与文艺运动”(毛泽民)、“学术与救国”(恽代英),更有文章关心到青年的“社会科学与择业问题”(文台)。尽管这本杂志只有薄薄的几页,但涉及话题的宽泛,与读者的接近,乃至话语文风的亲切,时隔 80 年,今天读来,其益友良师风范依然扑面而来。

《中国青年》上刊登的读者来稿来信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有直接从读者中来的问题，也有对编辑反映的不同意见。比如第五期刊登的署名“子乔”题为《青年们应当讲修养么？》的来信，上来就表示对杂志刊登的文章

“怀有许多相反的意见”，进而系统地表明了读者自己的观点。这个“子乔”在以后的第七期上又一次出现，在注明“来稿”的《青年的新道德》的标题下，进一步阐明作者对道德问题的观点。对来自读者的直接反馈给予突出处理，是《中国青年》编辑风格一个鲜明的特色。因为读者真诚地希望杂志“当为青年的思想引导着”，而这也正是编辑们“引为己任的事”。这样的杂志，能够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烈欢迎，应当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青年》的作者与编辑

作为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与《先驱》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两刊的作者队伍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先驱》读者已经十分熟悉的“代英”、“中夏”、“敬云”依然是这里的翘楚,每有“重大题材”(如十六期的列宁特号)则依然由泰斗级的“独秀”亲自出马。而作为一种承继,明显的变化在于,《先驱》的主要编辑者、撰稿人“存统”离任后,未见再到再在《中国青年》上出现;而作为《先驱》作者之一的“代英”成为新的杂志的主导人。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二大中央委员的瞿秋白(署名“秋白”)、罗章龙(署名“章龙”)和团中央领导萧楚女(署名“楚女”)、沈泽民(署名“泽民”,作家沈雁冰的弟弟),以及初出茅庐的沈雁冰(即茅盾)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中国青年》的目录中。

这里必须多说一句，即一大团中央书记、《先驱》的主要编辑者施存统退出的原因。1923年8月召开的团的二大上，施仍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但由于他当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候群”，在大家同意下，离开中央机关去学校教书。而此时的恽代英在团二大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因此，创办《中国青年》的任务就当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但是恽代英本



1923年10月出版的《中国青年》创刊号

人也是一个病人,他在第七期杂志上自述:“我害病三个多星期,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的很。我有许多要说的话,因为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可是又因为越想越觉得要说,所以今天托朋友代我写下这一篇来了。”恽代英这篇“越想越觉得要说”的话题为《学术与救国》,今天读来依然不失其现实意义。查《中国青年》各期,在第四期上还刊有恽代英文章两篇(《中国的分立运动》、《救自己》),作为周刊,到第七期只隔三周,而作者已觉“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的很”。其实,作为团刊的主编,1923年的施存统只有24岁,恽代英也不过28岁。中共的早期人物多为一时之才俊,他们的青春年少,自然由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因而他们是“先知”;处在时代剧烈动荡期间,这批青年才俊既充满了求知的渴望,又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因而激扬文字,以国家、江山、未来为己任,他们的“目标读者”和他们自身本来就是同一代声气相通的人,这一点,很值得今天的青年报刊深思。不过,这些“青年先知”们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也不是个例。团的一大中央委员高君宇病逝时年仅29岁;团的三大中央委员任弼时1950年去世时也才46岁;而28岁时的恽代英已经病得“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了。除了慢性疾病的原因,施存统在50年代时回忆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想来也是戕害身体的原因吧。

恽代英二、三事

写到这里,我必须稍微溢出一些了——介绍一段读者不多见的关于《中国青年》创办者恽代英的重要“轶闻”。

“轶闻”的作者名王凡西(又名双山),笔者撰写此文的20天前——2002年12月30日以96岁高龄在英国去世。王凡西与两年前去世的郑超麟同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中国托派的重要领导人和代表人物。

从1929年起,王凡西和恽代英一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据王的回忆,当时的组织部长为周恩来,副部长是省港罢工领袖罗登贤,组织部干事

为恽代英、陈潭秋、武扶经、王凡西。

据王凡西回忆,1929年,包括王在内的一批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中共干部在上海接受中央的培训,讲课的人有当时的中央书记向忠发,中宣部长、中共实际主要负责人李立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以及中宣部和中组部秘书长恽代英。这一年,恽代英34岁,王凡西23岁,在王看来,恽“是我读中学时就很敬仰的人物”,显然,王的中学时候,正是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的读者。在组织部里,王和恽“最接近”,在他的印象中,恽代英“患了肺病,体力很差,全靠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革命的无比热忱,才支持他去干这十分紧张与繁剧的工作。但每当休息下来,他便疲态毕露,有时会在会议进行中沉沉睡去。代英是出名与出色的实干家,他吃苦耐劳,不知困难;遇到任何难题,他脑子里总有现成的或随机触发的应付之道。因此他始终乐观;从不闹情绪。”王认为,恽代英最完备地代表出老干部们对“留学”的正面和反面态度。

当时,正是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占主导的时候,党的中心工作是“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在王凡西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恽代英“从不曾对我公开说过苦闷,更不曾表示过对党正式路线的怀疑,可是像拿了几根稻草想煮沸一大锅冷水的人的焦急心理,却是不断地吐露的。”王当时曾向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局势,究竟等于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呢,还是1917年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恽想了想说:“我对俄国革命历史没有详细研究,得找机会好好读一下。”

1930年,恽代英在沪东工厂分发传单时被捕,在狱中,富于斗争经验的他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反动派才知道狱中的那个“王作林”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系狱一年之后,恽代英英勇就义。就义前有狱中诗一首,诗云: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当代中国历史上生命力最旺盛的杂志——《中国青年》——的创办者留下了他此生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及他36岁的生命!

(责任编辑 致中)

怀念学术界 诤友郑惠

• 陈铁健



郑惠在我社座谈会上

(一)

2月23日凌晨4点,郑惠在昏迷中辞世远行,终年75岁。25日到近代史所,唐宝林告我噩耗,心头为之一震:他走得太早了。

去年7月16日,我与郑惠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会面,计划合作写一点“文革”方面的文章。他说先收集有用资料,从专题做起,写一些短小文章,力求深入,不落旧套。他很兴奋,精神十足,但我觉得他身体消瘦,脸色灰暗,似乎不如从前。8月下旬,我打电话到他家,郑夫人说他已于20天前入院。随即从别人口中知道他已被确诊为晚期肝癌。10月16日,我与黄修荣、章百家到北京医院看望已卧病近四年的李新师后,又与百家去看望住在同楼七层的郑惠。他面色红润,精神绝佳,与7月间所见判若两人。他说治疗效果很好,不久即可出院。床头摆着不少新书,看来治病期间仍未停止读书写作。谈及“文革”研究,他说过几天让家人把一些资料送给我。果然,几天后这些资料就送来了。清点后发现少了几件,我即写信说明。2003年元旦,他从医院打电话说那几件材料他看过另放,家人一时找不到,再找找看吧。春节前,唐宝林到医院看他,捎来他在病中整理编成的《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在一封打字长信后亲笔附言:“所缺资料可能在春节我回家时找到,届时再联系。”宝林说他健谈如初,两个小时谈话毫无倦意。我们都以为他会慢慢好起来,正如他信中所说“回春之日是一定会到来的”。春节过后,我期待着他出院回家静养的好消息,不想,传来的竟是他突然的去世。

日前,承白小麦告知,郑惠入院后饮食起居正常,治疗顺利,精神亦佳。春节前后,来访人多,电话不断,生活节奏快于平时。2月19日突然大吐血后,他安慰别人说

没有关系,很快会好的。22日陷入昏迷,终至心力衰竭不治。

(二)

1978年8月,因黎澍师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我得与郑惠相识,那时他任职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书组办公地址,初时选定于中央党校南院自得园湖畔84号楼。冬初,人员调齐,国史组与革命史组、毛传组一起迁至北院2号楼,每人一室。黎澍委托郑惠负责组内日常工作指导。他给我的感觉是和善平易,周到负责,身必躬亲,没有架子。

12月,黎澍要郑惠和我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为研究“文革”怎样开场做准备。郑惠以他灵活的办事能力,取得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和专案组的大力支持,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获秋、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派出记者,以特务手段,一一摸清京沪两地学术界著名学者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黎澍、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杨宽、刘大杰、束世徵、李俊民、谭其骧、陈守实、魏建猷、蒋星煜等人对姚文元的不同意见和批判态度,然后写成简报送呈最高决策人。

在上海,我们先后拜访王一平、夏征农、李庸夫、夏其言、唐海、唐振常等,获得了在文字资料中无法获知的有价值的情况。

白天我们到处联络调查,晚间带回大批材料,仔细阅抄。累了,便喝一口茶,谈谈调查体验。上海之行约半月,于1979年元旦前夕返回北京。此时,郑惠和我对于“文

革”开场的性质,对于“文革”的巨大祸害,对于“文革”当权者的鄙视和谴责,观点完全一致。

理论务虚会期间,郑惠几乎每天晚间都向我们讲述会中的精彩发言,同时带来会议简报。大家为思想解放、理论探索的空气所感染,一时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春天就要来到。然而,会议结束时,一篇不许这、不许那的讲话传出后,大家的热情顿时冷却,国史组也因而匆匆散伙。郑惠问我,愿不愿到正在筹建的某研究机关?我不乐意到政治性强且务求舆论一律的衙门里做事,还是退守书斋,钻故纸堆去了。

(三)

回到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李新师要我协助他编写《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李新此时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商得胡乔木批准,在自得园86号楼借房两间,作为现代史室的资料室会议室。李新每周召集一次例会,请参予写书的各方学者相聚于此,讨论学术问题,交流有关信息。不久,郑惠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又主编《中共党史研究》,在83号楼办公与我不时来往。那时,他家住沙滩旧北大宿舍。我家住弓弦胡同,相距甚近,互有访晤。20世纪80年代末,我由弓弦胡同迁往东直门胡家园后,他还两次到家中看我。我住在一套东北角处于风口上的冷房,他看到我身穿棉衣写字读书,着急地说:“这怎么行啊,应该请院里解决你的困难!”后来,他果然向胡绳院长专门谈到此事,胡绳以院长名义批示有关部门给予解决。以后,每次见面,郑惠总要问我:“房子解决了没有?”直到去年10月我到医院看他时,他还关切地问:“还住在那里吗?”

1990年秋,郑惠找我,说某公打算调你到新筹建的一个官方编史机关工作。我深畏此公的高超理论,也深知此机关之门庭深严去也不得。我请郑惠代我婉辞。郑惠说:“他已与此公约定了见面时间,不好推掉。我感到倘不赴约,有失郑惠好意,去了又说什么呢?”郑惠说,我陪你去,你就听他谈,主意你自己拿。我只好照他的安排,洗耳恭听某公的开导,最后婉然谢绝。几年后,郑惠说:看来你那时没有动心是对的,那个地方真是不能去。

90年代中,我去沙滩郑惠家。他拿出他的同学、朋友沈鹏所写字幅,问我沈字如何?我很喜欢沈字:潇洒、自然、蓄势、藏拙,布白奇特,别具匠心。他说你喜欢的话,我请沈鹏给你写一幅。我记住他的话,不时催询。沈字金贵难求,我只请他写三个字:静观居。取静观世事,不必忘情

之意。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众多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真实心态的反映,在下岂能免俗。

(四)

郑惠创办的《百年潮》深得广大读者欣赏,是由于他和他的同事在办刊中高扬的开放风格和求实精神。他用善意和热情打动作者,信守“文责自负”的承诺,绝不以政治教条强加于人。这是他主持《百年潮》成功的重要原因,对此我感受至深。

1996年秋,应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庆榴主任之邀,我到广州参加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学术讨论会。郑惠和我都应邀作学术报告。我就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卷加以介绍和评述。内中批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矫枉必须过正”论、游民“革命先锋”论等谬误,指出那是“左”的而非正确的路线。当时,一位据称是某大学副教授的先生起而叫喊毛泽东此文“好得很”,却说不出什么道理,依旧是老调重弹。郑惠赞许我的发言,鼓励我深入研究下去。回京后,他多次电话要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他原打算刊于《百年潮》,但杨天石以此文对其大作多有赞词,不愿在他担任主编的《百年潮》上发表,郑惠便将此文转交《中共党史研究》。承该刊大度容纳,竟照原稿一字不易予以刊出。

黎澍去世后,郑惠常常谈及对黎澍的怀念。他听说我手里还压着一篇记述黎澍往事的文稿,屡次表示他想看一看。那篇文稿,写于黎澍去世后一个月内。1989年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郝盛潮要去,准备编入一本记述与黎澍风骨相同、遭遇相类的一群著名学者文化人的纪实文集。集子编就,正待付梓,“六四”事件发生,文化学术界面临异常严酷的形势。于是,稿子被退回,一放就近十年。1996年夏,上海唐振常先生为纪念黎澍,与香港有识之士商定出版《黎澍之路》,来信索要拙文。与此同时,郑惠也在为黎澍纪念事奔波,从我处要去《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文稿,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刊出。

这两篇不容易发表的文字的顺利刊出,都得益于郑惠的热心支持,至今令我感动不已。在中国,这样的编辑家实在太少了。

郑惠以75岁不算太老的年龄,匆匆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使学术界少了一位为社会开风气的诤诤之士。痛惜之余,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呢?

(2003年3月3日写于水南斋)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 吴明明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历史前台的。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对北方敌国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确实很棒，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谏言，与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谋而合。什么是富国，就是国家的钱多；什么是变法，就是理财，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弄出最多的钱。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

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成天眉头紧锁。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驿站马递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据说，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谏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连消带打的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

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设置，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千年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廊庙相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信条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19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



王安石

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亶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箝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诋谤帝国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巡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但捂住了别人的嘴巴,就能让变法自此完美起来,一马平川了?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而已。再就历史流程的延展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箝制言论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有问题。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国家财富堆积如山,为此宋神宗作四言诗:“五季失图,猘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土;曾孙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为新增32座国家财库之名。还不够,又添20座,建库封桩。

国家一时间富了起来,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还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为例,本是为了免除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改由政府向他们贷款,每年两次,利息按二分计算,在夏、秋两季农作物收获时,再归还政府的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至

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谨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对于那52座财库的由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又如意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东明县(属开封府)试行免役法时,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上访”,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更要说明的是,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放松了对庶民的束缚,撇开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不谈,经济上的勇猛行进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飚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40多年后,北宋灭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绘制《流民图》,企图以生命一搏。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人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于是将臣子们的上奏中言及民间常苦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大不以为然。(下接75页)

德

治

法

治

古

今

谈

官伟勋

治理国家,究竟靠法治还是靠德治?这个问题少说也争论近三千年了。

是不是行法治就不能行德治?行德治就不能行法治?从儒法两家老祖宗的言论看,他们是这么看的。

认为法、德可以兼治的有没有?有,荀子就是一个。他既重“礼”又重“法”。他是“以礼为主,使法、礼统一的先行者。”汉宣帝则明确宣称需“王道、霸道、杂治”。王道即德治,霸道即法治,杂治即兼治。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实际上的“兼治”者多,公开承认“兼治”者少。

尽管任何朝代都离不开法,但贬法治标榜德治一直是统治者的“常态”。

兼治可行吗?若可行,是否其功能范畴应有所界定?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法治与德治,与法儒两家讲的法治与德治,是不是一回事?

另外,在我们的老祖宗中,还有个既反对法治又反对德治的派别,《老子》就是这派的代表。《老子》认为:法治德治都是社会病态的产物。不仅不能治天下,反而会乱天下。“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律定得越多,对付法律的犯罪办法越多:“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有了德就有不德,有了法就有不法。只有“无为”,一切顺其自然,天下才能治。“无为”派的观点,已超出本题范围,不谈它了。以下着重谈谈儒家的德治及其对法治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时代的法治与德治问题。

德治是儒家针对法家的法治提出来的

关于德治的最早最权威的论述,见于《论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法治来治理国家,老百姓会为了避免受刑而不敢触犯刑律,但不会有廉耻之心,内心还是想干坏事的。用德用礼治国,老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还会自觉做好人。

在孔子的心目中,德治与法治是对立的。法治会强化人的利害观念,使人趋利避害,成为无耻之徒。“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儒家把知不知道廉耻看得很重,认为不知廉耻的人不是人!

很显然,孔子提倡德治就是为了反对法治。

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对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基本上坚持了西周以来的“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因此而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原则;“尊尊”要求下级贵族服从上级贵族,不许犯上;奴隶平民必须敬畏奴隶主贵族,不得反抗。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恭、宽、信、敏、惠”。“德”的灵魂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无仁爱之心，就什么也谈不到了！所以孔子认为只有“仁者”才能“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从这一理念出发，自然也就引出儒家的另一政治主张，就是“人治”思想。儒家是“德治”论者，也是“人治”论者。

由于主张“人治”，所以儒家十分重视统治者的德，强调仁德是统治者必备品质。因为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实现“德治”。所以儒家强调“举贤才”。正如孔子在鲁哀公问政时说的：“为政在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强调“德治”与“人治”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从“仁爱之心”出发，则要求尊重人民，施恩惠于人民；同时反对严刑峻法。因此，在孔、孟的言论中，都很强调富民与教化。孟子主张“省刑法，薄税敛”，“制民之产”。孟子在见梁惠王时，连老百姓应有多少地，多少房，多少桑，养好“鸡、豚、狗、彘之畜”都谈到了。他认为“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老百姓有房产土地、有衣穿有肉吃，天下才能太平。

总的说来，德治就是要通过“庶、富、教”，让老百姓多子多孙，过上富裕生活，受到良好教育，以达到整个社会的“无讼”境界。达到这种境界，也就是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统治者才能像北极星那样，永远端坐在最高统治者的崇高位子上，受到普天天下的拥戴，天下也就长治久安了。

“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在回答季康子时说，治理国家用不着刑杀。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你好，老百姓就跟着你学好，用刑杀干什么？

这种“无讼”的理想，自然是美好的，极具诱惑力的。但在法家看来，是根本不实际的。

到汉代，董仲舒把儒家重德轻刑、德刑相济的观点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神秘化。从而他也就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创始者、奠基者。他知道完全没有法不行，便把法置于从属地位。他把“三纲五常”立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他

还多次亲自以儒家经义来审判疑难案件，树立样板。他主张“论心定罪”，首开“春秋决狱”之风，为“纳礼入律”——即把儒家法律思想法典化——开拓了道路。这是一条用德治统率法治的道路。

德治思想并不是孔子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既是对西周传统的继承，也是适应现实需要的再创造。当时新兴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很需要一种能巩固其生产关系的道德观念，来维持一种稳定和谐的家庭宗族与社会关系。而“亲亲”、“尊尊”、“三纲五常”、“父慈子孝”、“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就很符合这种需要。儒家的德治对于巩固小农经济是起了极大作用的。中国封建社会之能延续这么久，与儒家理论有关。费正清把它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保守思想”，不是“过誉”之词。

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儒家观念，一直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在整个封建时代，除了早期的法家，几乎没有一种思想体系能与之抗衡，更不要说取而代之了！

法家的主张及其对儒家德治的批判

在先期法家中著名的有：管仲、子产、邓析、李悝、吴起、商鞅等。他们为富国强兵，在“重赏罚”、“修旧法”、“铸刑书”、“著书定律”、“明法申令”等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建树，而且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管仲施行法制改革后，很快就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并多次打败北方狄族与戎族的侵扰，保卫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命财产。孔子曾感叹地说：“非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都沦为夷狄了！）；“民到于今受其赐”。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

韩非认为儒家的德治是不现实的。他从历史的进化谈起，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劳而供应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正因为没什么好争的，所以用不着“赏罚”“而民自治”。如今呢？“今人有五子不为多，

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加倍赏赐)累罚(严厉处罚)而不免于乱。”(《五蠹》)你要人民自觉向善行得通吗?

为什么那时不但没有杀父弑君篡位的,反而有“禅让”的?韩非说,这不仅因为那时草实兽皮够吃够穿,还因为那时生活太贫乏。尧做王时,“茅茨不翦(用不加修剪的茅草盖房子),采椽不斫(用不加修饰的栎木做椽子),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虽监门(看门的)之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耨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奴隶)之劳,不苦于此矣。”“禅让”是让掉“监门之苦”、“臣虏之劳”。当然是容易的事。如今,当个县官都富得流油,死后,子孙几代享受不尽,谁肯让位?

韩非还从人的本性说明法治的必要。

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想“化性起伪”是没用的。这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他用卖轿子与卖棺材的做例子:卖轿子的人希望人们发财,人们有钱才能买轿子、坐轿子;卖棺材的喜欢听到死人的消息,好卖棺材。这不是因为卖轿子的人仁爱,卖棺材的人恶毒,而是由利害决定的。一只兔子在街上跑,满街的人追。市场上挂满了兔子,没人抢。不是前面的人贪婪,后面的人无私,而是因为法的存在。追到野兔可得益,抢了市兔要受惩。

正是根据以上这些对社会对人性的基本看法,韩非提出了一系列的“以法治国”的主张。

他认为“上古”是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是夏禹治水的时代;“近古”是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战国时代)之民”,那是“守株待兔”。应该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法与时转则治,治与时宜则有功”;因之,必须适应时代需要:“不务德而务法。”

他以“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来说明“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强调“明法为本”。用列国的实例说明“明法者强,慢法者弱”。说“仁政”、“德治”都是儿戏,是“尘饭涂羹”,能看不能吃,只会起到“败法”、“乱世”的作用。“释法术而任心治(即人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能工巧匠)

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能工巧匠)不能半中(中,合格;连一半合格产品都造不出)。”

一个国家“法之不行”,是由于“自上犯之”(当官的不守法)。因此他特别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绝对不能搞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那一套。

德治;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的人治;血腥的怪圈

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古代文化那么灿烂辉煌,优秀法家人物又出现得那么早,为什么却迟迟没能建成所谓的法治社会呢?

终极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间,中国一直是一个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贵族地主对农奴、农民的产品占有是掠夺性的,根本谈不到什么等价交换。法家的“法不阿贵”已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含皇帝)之意。而要使“人类平等概念”“成为国民的牢固成见”,正如马克思说的:只有在“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一卷上75页)时才可能。在中国,形成这种“平等概念”与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很薄弱的,

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儒家德治观的影响。

本来法治与德治都是不可缺的。问题在于,法治也好,德治也好,要有个正确定位。遗憾的是,在整个封建时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始终都没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儒家片面强调德治,否定法治;法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全面否定德治。由于儒家在整个封建时代的至高无上地位,德治也就成了龙头老大。尤为严重的是,德治观还一直渗透到司法审判领域中。“春秋决狱”、“引经断案”等等就是其渗透的典型表现,从而也就更直接更全面地妨碍甚至破坏了法治社会的形成。

以下就是以德断案的两个“范例”。

《世说新语·政事三》记有这样一件事:后汉陈仲弓在任太丘长官时,他手下一个小吏想请假办点私事。由于没有正当理由,就撒了个谎,说母

亲病了。陈仲弓准了他的假。后来发现,这个小吏的母亲没病,陈仲弓下令将该小吏处死。主簿(地方长官助理,主管文书簿籍)觉得处理太重,不好直接反驳,便建议再审一审?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罪行一并处理?陈仲弓说:“对皇帝的官员说假话是不忠;母亲没病说母亲病了是不孝。不忠不孝,罪过大极了!再审出多少问题,还有比不忠不孝更大的罪吗?”“三纲五常”的大帽子一扣,主簿无言可对,该小吏便一命呜呼了!

还有一件事,见于明人李乐的《见闻杂记》:

一人因私自杀牛犯法畏罪潜逃。地方长官张咏出告示,允许杀牛人自首,自首可从轻发落,同时拘留了逃犯的母亲。

逃犯的母亲被拘留了10天,逃犯没来自首。张咏下令把逃犯的母亲放了,又把逃犯的老婆拘留起来,刚拘留一个晚上,逃犯自首了。张咏判案时说:“拘留母亲10天,不自首。拘留老婆一个晚上,就自首!对慈母何以如此无情!对妻子何以如此情深!”以不孝罪名而斩首。

以上就是德治,也就是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法治的典型案列。应当指出的是,这是两个在封建时代被传为美谈,认为可作典范的案例。

德是抽象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伸缩性很大。对父母不敬,没“昏定晨省”是不孝,顶撞吵闹是不孝,不赡养甚至打骂虐待也是不孝。母亲没病说母亲病了,说不孝也可以。批评一下,或者最多打几板子也就可以了。把他杀了,说不定他母亲还靠他养活呢!母亲被拘留了十天不着急,老婆被拘一晚就自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如若真是只疼老婆不疼娘,当然可恶。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违背自首从轻的许诺把人杀掉呢?这些道理在德治的大原则下是没法说了。

儒家的德治与人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德治离不开人治,为保证人治才强调德治。也就是使作为镇压机器的国家机构,既有刽子手的职能,也有“牧师”的职能。强调道德感化,使统治手段柔和些,就是为了起到“牧师”的职能。然而,人治的结果,却必然导致人大于法,权大于法,权的滥用。

封建时代的德治、法治都是治老百姓的,是极少数治极大多数。在这一点上,儒家与法家的阶级性都十分鲜明。儒家说“刑不上大夫”,法家说“刑过不避大臣”。虽说比儒家进了一步,但毕竟也没说“刑过不避皇上”。从秦汉到明清,什么时候听说有皇上犯法被依法追究的?没有。皇上,这个最高的统治者,再暴虐,再淫乱,再胡作非为,给国家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再大,也从来没人“依法追究”过。这就是人治顺理成章的特点。

何止对皇上。由于德治加人治,大臣贪污不叫贪污,叫“簠簋不飭”;大臣淫乱不叫淫乱,叫“帷薄不修”。用这套婉转的词汇为大臣遮羞开脱,成了历代朝廷不成文的规矩。称呼上都如此体贴照顾,执法上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大臣反皇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德治与人治的另一特点,是易于为“治人”、“整人”提供方便。依法整人是比较麻烦的。得找法律条文,得有事实做证据,没证据得造假证据,而造假是有风险的。依德整人就方便多了。德的含义空泛,没罪可以说成有罪,有罪可以说成没罪;直言忠谏可以说成心怀叵测,为人民可以说成反人民。捅了大漏子,造成大损失,说一句“动机是好的,交了一笔学费”,立马就“摆平”了。“德”的“学问”大着呢!能“四两拨万斤”!

由德治到人治,由人治到人大于法、权大于法、权的滥用,一直到统治者的腐败,是必然归宿。当矛盾越积越多,积到极点时,宫廷阴谋、政变之类就来了;最后,人民忍无可忍了,起义了,血流漂杵了,又一出血淋淋的改朝换代悲喜剧上演了。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血腥怪圈,是儒家的德治与人治统治几千年无法摆脱的怪圈。

法治与德治混淆则相害,“各司其职”则相成

社会主义的法治与德治与封建时代的德治与法治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主义法治、德治,“治”的主体是人民,政权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为人民服务的。封建时代“治”的主体是少数统治者。

社会主义的法是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的宪法和

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封建统治者则是凌驾法律之上的。法家能推行法治于天下,能富国强兵,却不能推行法治于皇上。对皇上来说,仍是“天下奉一人,一人治天下”的人治。所以法家同样不能解决“血腥怪圈”问题。

法治与德治有不同的功能与范畴。社会主义的法是根据国家和人民意志制定的,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而德是思想意识问题,不能也不应该动用国家机器强制力执行。法是刚性的,是可做具体规定并加以量化的;德则复杂得多。一个人有德无德,德好德坏,往往众说纷纭,看法各异。

封建时代的儒家与法家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德治的本质都是反映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所以两者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必需的。

但是,对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功能必须给以正确定位,不能混同。混同则相害,界定则相成。

法治就是依法治国,在任何已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問題上,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或者依法,或者依德。例如: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年一届”,到了五年就必须换届。满了五年不换而又没经过法定程序批准,就不是依法治国。又如宪法规定某些职务只能连任两届,是不是可

(上接70页)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

安石是固执的,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民众的苦痛与主题宏大的变法相比,算不了什么。

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居然如此无视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称政治强人,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思想缜密。对他“大言震神宗”启动变法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

以因为这一届干得不错,德高望重,再连任一届?不可以。又如法律规定某种选举必须“无记名投票”、“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是不是可以以“大家觉悟都很高”为由,变差额为等额,变无记名投票为举手表决?不可以。宪法规定的东西,都是综合了国内国外历史的现实的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违反了就会引发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这绝对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

“以德治国”不是“依德治国”。一字之差,大相径庭。我们可以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却不宜说“有德必依,执德必严”。德无法用法律条文裁量规范。我们应理解“以德治国”为以德育人,是指把以德育人的工作提高到治国的高度,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认真抓紧抓好。全民的道德素质越高,“依法治国”的理想就越易实现。

建设依法治国的法治社会,是时代的呼唤,是我国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建成法治社会的主客观条件已大体具备。汲取历史教训,学习他国经验,牢记自己的国情。不因循,以免错失时机;不照搬,以免“食古不化”、“水土不服”。停滞不前易生变,操之过急易生乱。生变生乱,都会使国受难,民遭殃。近看远望,殷鉴多多。坚定不移地、积极而又稳妥地走自己的路。苏轼说得:“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责任编辑 致中)

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不能不算是公论。

但是,人格的公论与民心的向背无关。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绝不是几篇立论高扬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赎的。(责任编辑 吴思)

在海外,过哪个年都觉得不对劲:过洋年,人家是真热闹,我们是凑热闹;过自己的年,人家是不热闹,我们是找热闹。洋年在西方,从圣诞节一直到新年,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星期。人家布置圣诞树、吃火鸡、送卡送礼物、阖家团聚,我们却不知该干什么。在西方生活久了才知道,圣诞树不光是装饰。西方人送圣诞礼物,与中国人过年给孩子买新衣服、送压岁钱不同:不仅家人之间要互相送,亲戚朋友、甚至每位来赴宴的客人都要送到,哪怕是一听水果罐头、一瓶洗澡液。圣诞树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供人们在树下摆礼物。这些礼物用五颜六色、金光闪闪的纸包着,专等圣诞节的第二天“节礼日”拆开。我们没这个习惯,光买棵树在那儿摆着,兴味索然。至于圣诞火鸡,说起来是一道过洋年的大菜,西方人的做法却很简单:用锡纸把整个火鸡包起来,放进烤箱烤五、六个小时,吃的时候切开撒点盐和胡椒粉,再配上黄油拌小圆白菜、炸咸肉等。头一次吃充满好奇,至少是品尝到一种异国风味。以后再吃,便觉得淡乎寡味,不如四喜丸子、米粉肉、猪肉水饺、炸带鱼吃得带劲。至于送圣诞卡,刚来英国时对商店里设计精美、琳琅满目的贺卡爱不释手。送了很多卡,也收到很多卡。按照英国人的习惯,把这些卡摆在壁炉台、桌子、书架上,觉得满屋生辉。后来,在图书馆里看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圣诞卡,才知道那时的卡多半是自制的,以送卡人自己或与家人合拍的相片为主。送卡的目的是传达一份问候,同时也是补偿彼此不能相见的遗憾。明白了这一点,送卡的热情大减。当然,过年热闹的核心是阖家团聚。虽说现代西方人的家庭关系比中国人松散,但圣诞节那天,家人一定要团聚。我导师家在美国,每年提前半年就订机票。圣诞节前,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就像我们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运。对于每一个与家人

团聚的人来说,过年意味着圆一个梦:一个尽享人间至亲至爱、天伦之乐的梦想。

这些乐趣我们都享受不到,过洋年便只能凑个热闹。烧一桌中国菜,邀几个要好的朋友,借一台OK机,乐上一个通宵。之后,却依然是几许寂寞、一缕乡愁,说不清道不明。有一天,竟想起北京春节厂甸卖的卤煮火烧。一家老小围在小摊前,看那新出锅的椒盐火烧,切成一块块的,放进那炖得香香的肥肠杂碎汤,上面飘着一层亮晶晶的红油和碧绿的香菜。吃一口,又香又辣又烫……想着还是过自己的年好。不管吃什么玩儿什么做什么,都有过年的味道。

哪知真到自己的年到来时,周围刚刚过完洋年的人都在紧张工作。商店不再张灯结彩,街上也不再热闹非凡。说句实在话,要确知哪天是春节,还得专门打听一下,或是查一下中国日历。想趁家人吃年夜饭时打电话回去,时差还赶不好。等下班回家,国内的年三十已经过去。华人社区组织晚会,只能等到周末,要赶上春节正好是当地的假日,千载难逢。不过,对大家来说,这仍然是享受过年气氛的好机会。记得有一年,使馆带来一台电影放映机,大家就像当年农村的生产队员,争相等候在大楼外面。那日气温骤降,寒冷异常;而且单机放映,每看完一本,还要停下来倒片子,可大家全耐着性子慢慢等,直看到后半夜。

尽管这样热闹了一下,心里还是若有所失。不知不觉,洋年和春节都已经过去,却好像还在盼着什么,没着没落。想着以往过年的乐融融,如陈年老酒的醇香,带着岁月的积淀,带着醉人的惬意,令人乡愁难解、幽思绵绵……

(责任编辑 吴 思)

过

洋

年

洋

过

年

● 李 岚

桃花潭畔寻汪伦

● 程竞明



李 白

在皖南青弋江畔的泾县翟村，悬崖陡壁之下有个清澈见底的深潭。潭东岸白沙细石成滩，芦苇簇立，芦叶萧萧。潭西岸怪石列耸，老树古藤，山鸟喧闹。有副对联写道：

山云笼树色，
鸟语和溪音。

水潭取名“桃花潭”，有一段诗坛趣事。据古书记载，唐代泾川人士汪伦写信邀请大诗人李白来此漫游，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赴约，可是到了

这里既不见桃花，又没有看到酒店。汪伦告知：“十里桃花者，十里之外有桃花渡口；万家酒店是指潭西有个酒店，主人姓万。”李白听后大笑不已。汪伦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为答谢主人的盛情接待，诗人临行作《赠汪伦》一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传世之作

使桃花潭名扬四方，成了旅游胜地。潭旁建起了“踏歌古岸”楼阁，还有酌海楼和纪念李白的文昌阁。文昌阁建于清代乾隆年间，阁形仿照北京的天坛，阁内有“文光射斗”的巨匾和碑记。

汪伦，是何等人物？不料竟成为当今的一大疑案。李白在《过汪氏别业》中写道：“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大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垒。我行值木落，月

苦清猿哀。永夜达五更，吴歙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诗中透露汪伦乃名人豪士，与李白是诗文知交。但是，由于《辞源》、《辞海》之内仅简略写为“汪伦（唐）泾县人”，令人莫知底细，而造成了一些误会。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文中，误称汪伦是个农民，《中国文学史略稿》一书的作者也这样说。接着，《唐宋绝句选注析》、《唐宋诗词探胜》等书也都写道：“据说是泾县桃花潭的农民”、“是一位善酿酒的村民”。真是以讹传讹，不知所以。近年黄拂塵在《汪伦何许人也》一文中，揭出了真相。他曾带着疑问到安徽泾县走访，沿着桃花潭寻觅当年李白、汪伦的行踪。终于在《泾县志》与《汪氏宗谱》中发现了具有史料价值的记载：“汪伦，又名凤林，为唐时名士，与李青莲（即李白）相友善，数以诗文往来赠答，为莫逆之交。开元天宝年间，公为泾县令。”由此可知，汪伦曾任泾县七品县令，并不是“桃花潭的农民”，更扯不上什么“一个善酿酒的村民”了。（责任编辑 吴 思）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

● 肖又新

编者按：本刊收到读者纪岳武同志的来信，信中说：我有个问题总想弄清，日本帝国主义到1945年“8·15”以前侵略中国的国土，如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达到什么地方？找了材料还弄不清楚。这个侵略史应让中国人民清楚，让后代也清楚。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约肖又新同志写了此文。

1937年前，日本已侵占了我国的台湾省、东北三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大部 and 冀东地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在八年中，它侵占了半个中国（参见《日军历年侵占中国领土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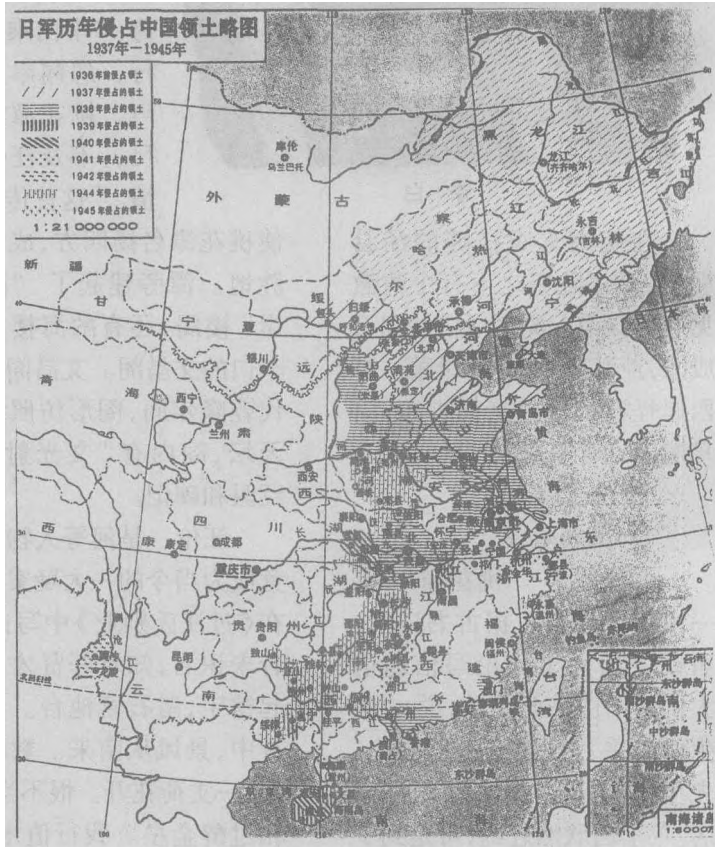
一、“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侵略者气焰嚣张，大举进犯，是其战略进攻阶段。在16个月中，攻占了一大批县城、9个省会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直到首都南京。日军铁蹄踏遍了平汉、津浦、平绥铁路沿线和长江下游沿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控制了华北、华中、华东广大富庶地区。其侵略魔爪向

西已深入到绥远省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山西省的原平、阳曲、太原等地。

二、侵略军由于占地太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1938年10月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直至1942年。其间，日军实施有限目标进攻，又侵占了南昌、随县、枣阳、金华、奉化等城市和地区。向西进占到湖北省的宜昌市，向南深入到福建省的闽侯（今福州）、厦门，广

西省的邕宁、绥淦，广东省的汕头、雷州半岛直至海南岛全岛。还侵占了香港。我国西南大后方云南省西部的腾冲、龙陵也被侵占。

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国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优势尽失，于1943年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它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并确保本土安全，1944年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八个月中，攻陷



城市 146 座（重要城市有郑州、许昌、洛阳、株洲、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空军基地 7 个，飞机场 36 个，打通了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平汉线、粤汉线）、湘桂线和中越交通线，侵占了豫、湘、桂、粤四省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大溃败，蒋介石不得

不承认：这是中国战场最艰难的时期。通过这次战役，日军向西侵占了河南省的陕县、卢氏县、灵宝市（后收复），湖南省的邵阳市，广西省的宜山，贵州省的独山，逼近贵阳，致使重庆陷于混乱。

四、到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日军处境更加孤立，但它垂死挣

扎，在中国战场又发动了一些攻势，侵占了江西省的遂川、赣州，广东省的南雄、新城、海丰及老河口、芷江等飞机场。还侵占了河南省西部的淅川、西峡口，并于 4 月 4 日攻占了豫、陕交界的河南省的重阳店，这是日军 1945 年“在中国大陆向西前进得最远的地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全价	88.60	10.00
之一 “传说”的传说		28.80	4.00
之二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20.00	4.00
之三 在历史的天平上		19.50	4.00
之四 思想的永生		20.30	4.00
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朱永红（全四卷）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	方 实 杨兆麟	25.00	4.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 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			
——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凌志军 马立诚	22.80	4.00
变化——1990 年—2002 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老三届朝歌——尘劫	丁小禾	22.8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旨在将从“文化大革命”前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多年间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据翔实可靠的材料，以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交锋》一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三次思想解放的过程，把 20 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复杂的交锋呈现在你面前，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改革开放史。它贯穿了一条防“左”反“左”的主线，《交锋》中描述的许多事实，是首次在国内披露。

你想知道轰动一时的“皇甫平事件”吗？你想知道令京师震惊的四份“万言书”吗？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常态与变态

——精神现象拾零之一——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编者按：

陈四益先生和丁聪先生是当代文坛上的著名搭档。陈先生的文笔与丁先生的画笔联合作战，堪称天配。从本期起，我们将设置专栏，为读者奉上二位先生的新作。

尊敬权威是常态，迷信权威是变态（网络语言叫做BT）。尊敬与迷信的分界，在于前者保持独立的判断而后者丧失独立的判断。

周扬曾是理论权威。读大学的时候，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当作“经典性结论”要我们“认真学习”多少天的。谁要表示怀疑——哪怕是对个别结论的怀疑——都会被当作思想不纯。于是，常态被迫趋于变态。周文一出，群起响应，再听不到一点不同的声音。“文革”中他忽然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害得相信他观点的、引用他文章的、传达他讲话的，统统倒了霉。这是对变态的惩罚，又是以变态对付变态。

“文革”后，周扬复出，虽照旧还是权威，但没有了权势，不再有当年的迷信。对他的观点，有赞成的、有商榷的、有批评的。我想，这是从变态复归于常态。

1983年，马克思百岁诞辰，他在中央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讲了“异化”。次年的“春王正月”，便有XXX也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长篇讲话，题目叫《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内容是批驳周扬的。某文之出，如果是正常的讨论，应当视为常态。正如他在文章之前所说，他的文章“也献给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何况在文章后面某氏还大度地说，“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

但是，这种人们希望的常态并没有出现。由于某氏当时的地位，“指正”的文章即或有，也没有报刊敢



无一字无出处的“权威”

登——因此，常态仍旧复归于变态。权威一出，万马齐喑，再没有别的声音。

直到近年，变态才回归于常态。譬如，XXX为了论证“异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划了一条时间线，说从《共产党宣言》之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没有使用“异化”这个概念。而吴江先生——一位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却在《异化思想述评》一文（收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一书）中，证明异化是一个马克思反复讨论的重要概念，即使在《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不但没有放弃异化理论，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与应用。吴江先生说：“一个概念，一个范畴，或者一种思想，如果它所反映的现实状况存在或确实存在过或并未最终消失，那么，概念本身自然也会存在。”吴江先生的文章能够刊出，是因为胡氏已经作古，失去了一言九鼎的条件。

常态与变态的这种反复，尚不能看作学术讨论已经有了良好的环境，因为它并非因为理论的权威而是系于作者的权势。而变态的出现，常常因为权威者利用了权势或非权威者慑于权势。学术讨论中不能排除权势的介入，常态总是不能持久的。诗曰：

玉叶雪芽莫漫夸，还须慢火煮新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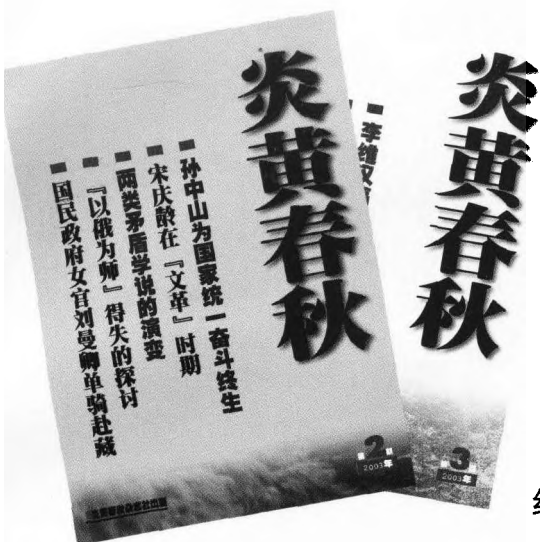
欲知色味亲口品，只拜招牌是傻瓜。

本期：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吴 思

审校 赵友慈

炎黄春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

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您若错过了邮局2003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杂志，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季度、半年、全年订阅手续或订阅单刊。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4日出版，大16开本，内文80页，60克双胶纸；彩封，157克铜版纸。每期售价4.80元人民币。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欢迎订购《炎黄春秋》1996年至2002年合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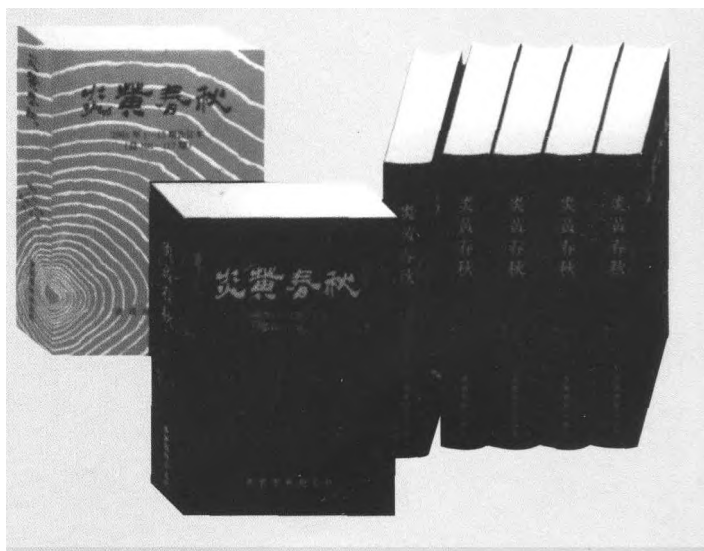
1996年	简装49元	精装52元
1997年	简装无	精装52元
1998年	简装无	精装56元
1999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2000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2001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2002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以上均免费邮寄。(不含港澳台地区及国外)

发行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3/4 总第133期

- **重新审视 《联共党史》**
- **抢救东巴经书的遭遇**
- **陈独秀最后的生活和政见**
- **母亲冯慧德的政治生涯**
- **北大荒开垦史**

ISSN 1003-1170



04 >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